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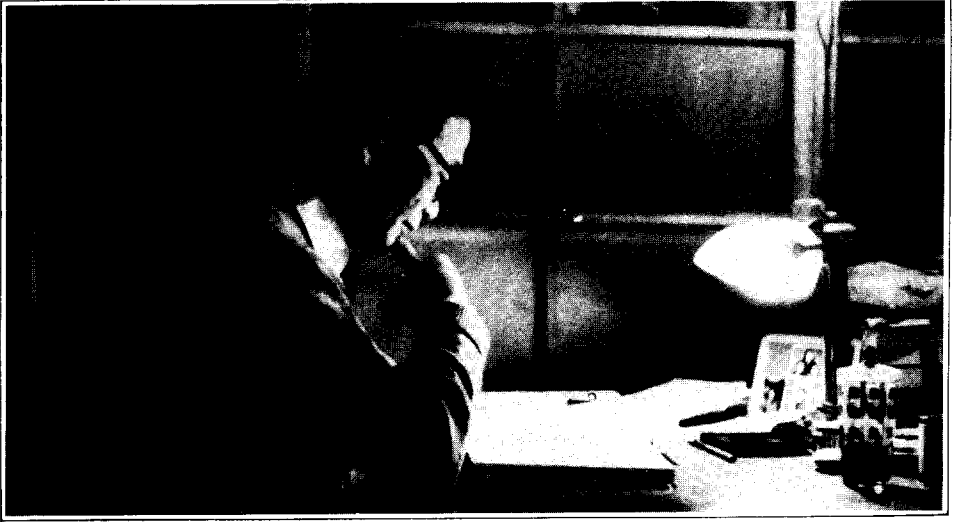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出版

● 第 1 期 ●





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晚年攝於書房



韋慕庭教授於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訪問近代史研究所，與所長張玉法先生(左)及研究員王聿均先生(右)合影於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一期·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出版

發刊詞	3
學術會議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楊明哲 4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呂芳上 7
	記「臺灣開發史研究會」……………許雪姬 10
	會議消息——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112
學術演講	蔣廷黻先生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倡導……………王聿均 16
學人簡介	郭廷以……………呂實強·張瑞德 26
	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張玉法·張朋園 38
	吳相湘……………陶英惠 44
研究概況	「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第二期研究計劃……………15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Ursula Richter 54
	近年來大陸對臺灣史的研究——介紹與評估……………許雪姬 68
	「抗戰前大學教育研究」計劃……………100
史料介紹	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收藏有關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朱浚源 76
書評	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評析……………蔣永敬 101
	評介胡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趙中孚 109
	柯著：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張朋園 113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1953~1986)……………117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135
大事紀要	一九八五年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40

封面設計：黃憲鐘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主任委員 張玉法
編輯委員 張玉法 張存武 張朋園 陳三井 黃福慶
陳永發 熊秉真 楊翠華 林滿紅
執行編輯 陳三井
助理編輯 張力 黃克武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一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1034172-5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150 元 美金 4 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R.O.C.

發 刊 詞

在講求資訊的時代，訊息的獲得與研析是擬訂工作計畫、修訂工作方針、檢討工作成果的重要依據。學術研究工作，像許多其他工作一樣，合全世界為一體；彼此互通訊息，絕對有其必要。這是本刊創刊的主要旨趣所在。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在歐美各國是承襲漢學的傳統而來，由對傳統中國經典、文學、文字、語言等的研究，推廣到對近代中國或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不僅是基於通商、傳教的需要，也是基於國家勢力擴張，以及世界安全的需要，特別當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日增之際。中國對近代史的研究，部分起於革命派和改革派對中國現況謀求了解，部分起於社會科學學者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情狀加以研究，部分是基於教學的需要，而二次大戰後興起於美歐等國的中國研究熱潮，也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不少刺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歷史的研究乃逐漸突破「後朝為前朝修史」的傳統，隨時對近代或當代的中國歷史加以研究。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已變為世界性的興趣。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學者，對近代中國歷史都在進行研究。或從事資料的整編，或推動研究計畫，或出版專書和論文，或舉辦學術討論會或講演會，或進行其他方面的學術交流。種種有關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活動，宜有一專業性的刊物加以報導，俾能互通訊息、交換心得，以促進有關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迄今已三十一年，數十位同仁孜孜以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為職志。為促進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工作，並對國內外各地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者提供資訊服務，特創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每半年出刊一期，定期報導國內外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狀況。希望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同道，能隨時各就所知，將有關這方面的資訊示知本刊，俾便刊載，使各地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者，能互相了解、互相觀摩。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

• 楊明哲 •

由中研院近史所主辦的「抗戰建國史研討會」，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至八月四日在臺北南港舉行。與會學者共宣讀論文二十九篇，內容包涵範圍甚廣，舉凡軍事、外交、內政、經濟、交通、教育、行政、文學、新聞、思想等，無不觸及。本文為求精簡起見，參考朱宏源「抗戰建國史研討會」（漢學研究通訊四卷四期）和陳存恭「『抗戰建國史研討會』簡介」（近代中國雙月刊第四十八、四十九兩期）兩文，將論文概分為六大類：（一）戰爭本身，論文五篇；（二）戰時內政，論文六篇；（三）戰時外交，論文六篇；（四）戰時文教思想，論文五篇；（五）戰時農政交通，論文三篇；（六）區域研究，論文四篇。以下按照此分類，簡介各篇論文如後：

一、戰爭本身：

（一）許介麟「從盧溝橋事變論近衛內閣的戰爭責任」一文，認為日本的政治家（包括天皇）和武人都應負中日戰爭的戰爭責任，因此以近衛內閣為個案加以探討批判。

（二）蔣永敬「日本南進與中國抗戰之危機及轉機」，除探討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日本之南進政策外，並分析當年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內外逆境，而在國民政府有效的應變和國際有利條件之下，中國抗戰乃見轉機。

（三）李雲漢「有關『南京大屠殺』中外史料的評述」一文，就有關之中、英、日文資料加以評述，並在結論指出，一九八四年七月三種日文新資料的出現更加確定日軍的屠殺罪行。

（四）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一文，除詳細地敘述中日雙方為期五月餘（一九三八、六～一九三八、十一）的武漢大會戰外，並指出此次會戰使日軍攻勢受挫，且無任何中共部隊加入戰場。

(五)張明凱「抗戰時期的地面防空」一文，敘述抗戰前後我方的地面防空努力，並引用多種調查統計數字，以顯示空襲的破壞性和各地防空部署。

二、戰時內政

(一)李守孔「抗戰初期中共之輸誠與攘奪政權之陰謀」一文，根據國共雙方資料研討中共於抗戰初起時對國民政府「輸誠」的真相，其真實目的乃在陰圖擴張，以謀攘奪政權。

(二)曹伯一「中共『抗日』原則的求存與發展功能」，探討中共求存原則在於運用民族主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

(三)陳永發「延安的整風、審幹與肅反」，討論一九四〇年代中共整風運動，並強調①個人檔案制度在黨一元化極權體制之下對權力鬥爭的意義；②中共發動「羣眾」的政治觀念，離不開「鬥爭」觀念。

(四)嚴錦「皖南新四軍叛變事件之經過」一文，探討抗戰初期新四軍之收編及擴張外，並討論新四軍在皖南擴張叛變之經過。

(五)陸寶千「論汪兆銘之叛國事件」則指出，汪氏離渝、組偽政府之原因乃汪具領袖慾、識力不足，因而有此叛國行爲。

(六)孫子和「抗戰時期西藏阻築康印公路事件」一文，除指出西藏阻築公路係因西藏內部派系之爭外，亦可看出邊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及中央政府在處理此一問題的政策。

三、戰時外交

(一)Chi Jen Feng (馮啟人)，"The Impact of Wartime Soviet-American Collaboration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除探討美蘇兩國在戰前和戰時的關係外，特別著重雅爾達協定對中國和對遠東的影響。

(二)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討論戰時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動機及調停的經過，從調停的醞釀、進行到失敗，均有詳盡敘述。

(三)陳三井「抗戰初期中法交涉初探」一文，探討①假道越南運輸；②中法軍事合作；③法國與汪偽政權等三問題，並指出當時法國外交政策乃「順應時勢，見風轉舵的政策」。

(四)林泉「中美、中英新約之研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討論戰時美、英兩國與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重訂新約的經過。文末並附相關文件多頁。

(五)吳圳義「中英對收復緬甸問題的歧見」指出，中、英兩國因本身利害關係，對於早日收復緬甸存在歧見。吳文並指出英方對中國充滿偏見和猜

忌，因而不樂意和中國合作。

(六)宋晞「中國參加聯合國糧農會議的經過」，本文敘述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季我國參加在美國舉行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會議」的經過。

四、戰時文教思想

(一)王聿均「抗戰時期文學之演變」一文，除探討抗戰前後期的文學興衰和抗戰對文壇的衝擊外，也探討文壇的空間分布、文藝團體的離合、文學和政治結合的特殊性等問題。

(二)莊焜明「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興革」，討論戰時大專院校的整頓、師範與五專制度的確立、課程標準的釐訂、師資審查制度的樹立和導師制度的創行。

(三)John Israel, "Chungking and Kunming: Hsinan Lienta's Response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arty Control" 一文，藉西南聯大對中央政府教育政策的種種反應，來闡明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與中央教育政策間的衝突與緊張關係。

(四)賴光臨「抗戰時期我國戰地記者的角色與地位」，本文在介紹戰前的報業、戰地記者的任務外，並討論戰地記者所須面對的軍事保密、新聞檢查等問題。最後，作者肯定這些戰地記者在抗戰中的貢獻。

(五)鄧元忠「抗戰初期蔣中正先生所用『精神』一詞的意義」，探討抗戰初起，蔣中正先生特別提倡「民族精神」的意義，並指出此係出於建國的意願，亦係「民族復興運動」的延伸。

五、戰時農政交通

(一)謝國興「一九四〇年代中國農政機構之專技人員」，探討對象為當時中國中央和省級各農政機構中的專技人員，內容為農政機關與官僚系統、農業教育與農技官僚的養成及此等官僚的人事運作。

(二)侯家駒「抗戰期間我國交通建設」一文，所討論的交通建設包括：鐵路、公路、水運、電信、航空及郵政等項。

(三)簡笙簧「抗戰時期東南交通幹道——浙贛鐵路」一文，敘述抗戰初期對浙贛鐵路的整理，戰時該路在軍運、商運上的功能及路局員工的表現，並剖析是路在結合浙贛兩省和取代長江成為東南交通幹道的重要性。

六、區域研究

(一)王樹槐「抗戰時期雲南的蠶桑業」，本文探討戰時政府謀求發展雲南蠶桑業的原因；並著重研究雲南蠶桑改進所的事業，且進一步分析雲南蠶桑事業不振的原因。

(二)張玉法「抗戰時期山東省的行政督察專員」，本文討論抗戰時期山東省的十七個行政督察專員區，並分析行政督察專員的出身、經歷等背景，在文中側重各專員所領導的抗日抗共戰爭，並導出專員區在戰時的軍事性增強的結論。

(三)李國禎「福建對外海關貿易分析（一九一二～一九三九）」一文探討民國元年至抗戰前期福建經濟的演變，分貿易總額的消長、輸出及輸入貿易的分析等三項討論，並討論各港貿易貨值的分配。

(四)張力「江西農村服務事業（一九三四～一九四五）」一文，討論戰前江西農村服務區的創建，抗戰時期的農村服務事業，以及抗戰末期農村服務區改組後的蘇作改良事業。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上下兩冊已出版，厚1148頁，每套定價（精）1400元、（平）1200元，直接購買照定價七折，請利用郵政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劃撥。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呂芳上

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二十歲誕辰、同盟會成立八十週年暨抗戰勝利四十週年，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聯合主辦國際性「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會期自七十四年十一月二日至五日，在高雄國立中山大學舉行。計應邀出席之學者國內九十人，國外五十人，另有觀察員廿三人，旁聽研究生廿八人。

此項會議，國內外學者共提出論文五十九篇，分四組四十場進行宣讀及討論，其分組及論文名稱如次：

一、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組

秦孝儀：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中正先生「力行哲學」會通

一貫之體認

- 呂實強：從民初思潮看孫中山先生講演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
 王曾才：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
 賀凌虛：儒家思想對孫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的影響
 陳裕清：中山先生政治哲學與現代思潮
 史扶鄰 (Harold Z. Schiffrin)：孫逸仙之世界政治家角色
 馬起華：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與近代民主政治
 李又寧：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元的婦女運動
 陳明鈺：孫中山先生與華南勞工運動之發展
 馬若孟 (Ramon H. Myers)：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
 魏 蕻：孫中山先生經濟思想的理論基礎與實證經驗
 趙金祁：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論芻釋——中國近代電氣事業之發展
 孫英善：從國父科學管理思想論現代企業管理
 林邁可 (Michael Lindsay)：認識孫中山
 葛立格 (Kenneth N. Grigg)：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與喬治學說的關聯

二、中華民國開國史組

- 王爾敏：興中會同盟會與中華民國國號之創生
 李國祁：民族主義與辛亥革命
 王壽南：辛亥武昌起義後清廷之反應
 陸培湧：蔣介石先生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一九〇六～一九一六）
 程光裕：黃乃裳的革命志業
 陳鵬仁：孫逸仙與南方熊楠
 于子橋、施樂伯 (George T. Yu and Robert A. Scalapino)：外力與中華民國之創建
 呂士朋：民國二年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經緯
 楊日旭：美國國務院外交關係文書中關於中山先生的記載（一九一二～一九二五）
 李本京：孫中山先生海外經費之籌集（一九〇九～一九一一）
 張玉法：二次革命的根源

- 李雲漢：中華革命黨的組黨過程及其組織精神
伊原澤周：中山先生與袁世凱死後的北京政局
杜維運：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
吳相湘：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問題

三、國民革命對外關係史組

- 金德曼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孫逸仙與德國
魯珍晰 (Jessie G. Lutz)：西方對現代中國的歷史研究——以「五四」爲例
白吉爾 (Marie Claire Bergere)：五四運動後中國政治中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一九一九～一九二三)
鄧勤臣 (Dennis Duncanson)：廣州時期英國人對孫中山先生的態度 (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王聿均：加拉罕與廣州革命政府
竹內實：黃埔軍官學校的歷史地位
札奇斯欽：二十年代的內蒙古國民黨
劉家駒：從剛恒毅回憶錄看羅馬教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一九二二～一九三三)
畢仰高 (Lucien André Bianco)：自發性農民騷動與農民對中共動員的回應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至一九四〇年代末期)
衛藤瀋吉：南京事變的一個分析——根據日美外交史料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日本
林徵祁：華萊士訪華之行
丁懋時：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經過

四、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史組

- 徐乃力：好男應當兵：對日抗戰時期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中國的軍事人力動員
李恩涵：抗日戰爭前期 (一九三七～一九四一) 星、馬華人的抗日救亡運動

- 李守孔：中共攘奪抗日戰果之史實——論所謂「平型關之役」與「百團大戰」
- 何家驊：八年抗戰是誰打的
- 黎東方：中國抗戰時之財政
- 蔣永敬：孔祥熙與戰時財政——法幣政策與田賦徵實
- 柯偉林 (William. G. Kirby)：中國戰後計劃——中國、美國與戰後經濟策略 (一九四一～一九四八)
- 洪桂己：從開羅會議到臺灣光復
- 陳三井：臺灣光復的序曲：復臺準備與接收
- 遲景德：抗戰損失調查經緯初探
- 吳圳義：抗戰後期中中國軍隊入緬參戰問題
- 李慶華：對中共當前政策的剖析
- 葛雷高 (A. James Gregor)：孫逸仙、依存理論與臺灣經濟史
- 牟宗燦：民生主義之經濟觀念與政策之研究
- 侯繼明、殷乃平：孫中山先生與臺灣的經濟發展
- 侯家駒：臺灣經濟發展階段——民生史觀經濟發展階段論的實證

此一研討會之全部論文及討論紀錄，定名為「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中英文本，已於七十四年底，由負責主要籌備工作的黨史會編印出版。

記「臺灣開發史研究會」

許雪姬

一、前 言

「臺灣開發史研究會」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主辦，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下，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四、十五兩天在東海大學召開。參加者除中央研究院，各大學研究臺灣史的教授外，還包括省市文獻會及東海、中興歷史系的學生，共五十餘人。研討會於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幕，由東海大學校長

梅可望先生主持，臺灣省民政廳副廳長吳堯峯先生亦在會中致詞。二時三十分起開始進行討論，在一天半的時間內，共發表了十篇論文，全部議程於十五日下午四時二十分結束，最後由東海大學歷史所所長呂士朋先生致閉幕詞而順利地完成此次的研討會。

二、議 程 表

以下將各場次主持人、主講人、評論人及時間表臚列於下：

主持人	時 間	主講人	主評人	題 目
陳 三 井	十四日下午			
	二：五〇~三：四〇	石萬壽	陳運棟	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
	四：〇〇~四：五〇	張守貞	謝 浩	明末的打狗史事探討
	四：五〇~五：四〇	黃秀政	曹永和	陳瓚與臺灣——清代臺灣循吏的個案研究
林 明 德	十五日上午			
	八：二〇~九：一〇	翁佳音	張炎憲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二年臺灣武裝抗日勢力之分析
	九：一〇~十：〇〇	吳文星	梁華璜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
任 育 才	十：二〇~十一：一〇	林衡道	莊英章	臺灣閩粵移民的歲時節俗
	十一：一〇~十二：〇〇	陳炎正	王世慶	清代之新廣莊
黃 耀 能	十五日下午			
	一：三〇~二：二〇	張家銘	尹章義	農產品外貿與城鎮繁興——以清末臺灣北部地區的發展為例
	二：二〇~三：一〇	洪麗完	黃富三	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
	三：三〇~四：二〇	蔡淵毅	許雪姬	清代臺灣行郊發展與地方權力之變遷

三、內容介紹

(一)石萬壽：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

本篇是石教授在四五年前從事南部客家田野工作的一篇成果。文中將乾隆以前客家人在南部墾殖分成朱一貴之役以前；朱一貴之役以後至吳福生之役；吳福生之役以後三個部分來探討。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將客家人大量移民來臺的時間保守地估計為康熙四十年左右，（以往有明鄭時期說及康熙二十五、六年說）；並費了心力將朱一貴事件發生前客家人所形成的大小七十七庄（大庄十三小庄六十四）逐一考訂出來。其次對客家在朱一貴事件時豎大清旗號的時日訂在六月十九日也甚具客觀性。

(二)張守真：明末打狗史事探討

本文共分成五部分，除前言、結語外，依序為早期的對外交觸，荷據時期，明鄭時期，將二百四十多年的史事濃縮成六千個字，屬於大題小作的論文；且荷據時期的敘述幾占全文之半，有畸輕畸重的現象。打狗即今日旗津，在荷人未入臺前已被列入東洋針路之一站；荷人入據後，打狗由原來的魚寮發展成小漁村。荷據末期該地居民漸多，荷人在此設官治理。迨明鄭時期，由於打狗地位重要；不僅有軍屯，且已發展為熱鬧的市街。

(三)黃秀政：陳瓚與臺灣——清代臺灣循吏的個案研究

本文係作者企圖以循吏陳瓚為一個案例，來看儒家的領導哲學、行政哲學經由陳瓚的採行下有何成果與限制。由於陳瓚的文稿只能片斷見於「陳清端公文集」、「清聖祖實錄」及各地方志中，因此作者沒有具體的資料來印證陳瓚在臺的得失；且本文疏於探討陳瓚來臺任官所處的背景，因此對陳瓚在臺的改革無法論其成效。

(四)翁佳音：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二年臺灣武裝抗日勢力之分析

作者企圖由一八九五～一九〇二年臺灣武裝抗日的武力加以分析，藉以瞭解：何以這時期臺灣住民對日本的入侵有些採取冷漠投降的態度；有些則毀家輸財與敵人相抗？而這些抗日分子究竟出身背景如何？誠如評論人張炎憲所論，本文的優點在其採擇豐富的史料，並能對以前有關的研究加以評

估，且有突破性的看法。缺點則在抗日分區，前期分成五區，後期分成三區，較難比較；而對抗日領導分子的分析，也很難有一定的標準，也許會影響所得到的結果。

(五)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

本文透過日人「國語普及」教育政策之確立，「國語普及」運動之展開，「國語運動」之勃興，「國語普及」運動之強化，推廣日語成效之檢討來說明日據時期，日人推行「國語普及」運動的成效及其成果。作者此文乃繼「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後另一篇檢討臺灣總督府實行同化主義的文章。經由吳文探討的結果，知日人雖然努力推行了五十年日語，但臺胞仍視之為外來語，因而學習的意願不高。然而不可諱言的是，日據時期懂日文的知識分子，也透過日語來吸收世界的各種思潮，使臺灣成為「近代化殖民地的臺灣」。

(六)林銜道：臺灣閩粵移民的歲時節俗

此文將臺灣的歲時節令（一年之中的日程表）自元旦起一直談到歲末。全文沒有註解，雖不甚符合論文的格式，然而卻是作者凝聚了四十多年來研究臺灣民俗的結晶。

(七)陳炎正：清代之新廣莊

作者為神岡人，運用岸裏社，各姓族譜及採訪所得的資料，透過自然景觀與歷史淵源，早期開拓及社會組織之發展，宗族的形成和姓氏分布，土地的開發，水利設施，寺廟與信仰形成等六大項目來探討清代的新廣莊。陳文所指的「新廣莊」究竟是指今日的臺中盆地、神岡鄉還是豐原，有些學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八)張家銘：農產品外貿與城鎮繁興——以清末臺灣北部地區的發展為例。

本文乃利用現有的歷史文獻及既有的研究為基礎，企圖在一概念架構引導下，針對歷史事實提出具有理論意念的解釋，是這次研討會中惟一非歷史學者而由社會學者提出來的論文。這篇文章分析的重點在一八六〇～一八九〇年間，臺灣北部外貿結構的改變與區域發展間的關係，特別是城鎮與運輸

系統的發展，其間以茶、樟腦等農產品的商業化為中介因素。因此作者首先檢視了當時臺灣外貿結構的改變情形，其次探討國際貿易與農產品商業化間的關係，最後分析農產品商業化與城鎮及運輸系統發展間的關係。

(九)洪麗完：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

今日臺中地區的開發始於康熙四十年，以閩粵兩籍人士入墾為多。或由今鹿港、龍井、大安登陸；或由南部地區經彰化平原越大肚溪而進入今臺中地區。由於本區的開發係大規模且有計劃，因此在開墾中顯示出特色：

1. 岸裏社番在開發過程中與官方合作，助官軍平亂，與其他地區官番相對立不同。
2. 臺中地區水利設施和墾殖齊頭並進，顯見開墾者之有組織，有計劃。
3. 此區開發中，漢番合作，故有割地換水這一開拓方式的產生。
4. 先住民或漢化或遷往宜蘭、埔里，故中區的開發，也促成當地土著遷移。

(十)蔡淵聚：清代臺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

所謂郊即商人所組成的社團。郊戶、郊舖則指商人本身或其所經營之行舖。本文首先闡明清代臺灣商業發達地區，城市或市街的商人如何透過「行郊」此一商業性社團來參與地方公務；其次探討某些大城市中部分有力的「郊」如何聯合起來取得城市中優勢的領導地位；然後再分析「行郊」所參與公務之內涵，並以之和傳統紳士加以比較；最後綜論上述各種現象在我國社會政治變遷歷程中所具之意義。

四、後 記

此次發表的九篇論文（林衡道文不計），就研究的時間來看，有六篇屬於清代（石、黃、陳、張、洪、蔡等文）；二篇日據時期（翁、吳文），一篇明代以前（張守真文）可見清代的臺灣史仍是日前研究臺灣史者的重心所在。就研究的性質來看，開發史、移墾史占四篇（石、陳、洪、張守真），社會經濟的有兩篇（張、蔡），政治有二篇（翁、吳），人物一篇（黃），可知目前臺灣史較重視開發史、社會經濟史研究，而個人認為此一取向和文化人類學者由研究山胞轉而研究漢人社會移墾的情況有相當大的關係。就作

者而言，石、張、黃、吳、蔡均在大學任教，隱然執臺灣史界的牛耳自不待言；陳炎正先生對鄉土廣泛研究所寫出來的文章值得借鏡；而張（家銘）、翁、洪均係臺灣史界的後起之秀，論文容或不甚周密，但仍有其貢獻。另外值得一提的，本次大會所邀請的評論人都能針對論文的優缺點做客觀就事論事的評論，自由討論時也都能做到充分交換意見，這都是本次會議成功之處。然而臺灣開發史研究會不可能盡善盡美，也有需要改進之處，如論文無法及時完稿，使大會不得不再三變更議程，也使評論人感到力不從心；若能在大會一開幕即發齊，相信在與會者細心閱讀之下，可以發現更多值得再深入探討的問題。又如論文有短到六七千字，有長達六七萬字，其中也有舊作，使論文的品質未達一定的標準。其次論文在時間上偏重清代，若能先在年代上設定篇數，也許論文分布會略見平均。

「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第二期研究計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於民國六十二年及六十六年，在國科會補助下，由張朋園、李國祁兩位先生共同策劃主持一項大規模之「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集體研究計劃。該計劃共有十人參與，探討對象包括廣東、閩浙台、上海、江蘇、山東、直隸、東三省、湖北、湖南、四川等十個地區自十九世紀中期以迄二十世紀初期之變遷過程，並已整理出版專著五種，頗受國內外學界重視。

民國七十四年，該所鑒於前項計劃僅以沿海沿江地區為主，未能廣包中國之全部地區，特由張朋園先生再度發起「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第二期集體研究計劃，擬賡續第一期計劃未竟之業，從事雲貴、陝甘、山西、江西、安徽、廣西、河南等內陸地區現代化過程之研究，俾為近代中國各地區之現代化提供一全盤性之了解。

該第二期計劃大體沿襲第一期計劃之規模，惟因內陸地區接觸外力較遲，變遷較晚，非涵蓋較長之時期，不足以窺其演化之全貌，故擬將研究之時間下限由第一期計劃原定之一九一六年延展至一九三七年。此項計劃獲得國科會補助，已自七十五年二月一日起正式展開，預計四年完成。

茲將參與此項工作者及負責區域開列於後：張朋園：雲南、貴州，陳存恭：山西，熊秉真：江西，朱泐源：廣西，謝國興：安徽，張力：陝西、甘肅，沈松僑：河南。



蔣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

王聿均

主席、各位前輩、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是史學前輩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信研究員的蔣廷黻先生逝世二十週年，清華同學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中研院近史所聯合舉辦這個紀念會，來紀念這位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有卓越貢獻的學者；承蒙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李亦園先生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先生盛意相邀，使我有此機會對蔣先生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倡導和貢獻，作一次簡單的報告，略表內心的欽佩之忱，實在深感榮幸，也深為惶恐。我學識謙陋，深恐難以狀摹蔣先生的學問和志業於萬一，盼望在座的諸位前輩，尤其蔣先生生前的友朋知交，多賜指教。

一、蔣先生的學識修養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

廷黻先生湖南邵陽（寶慶）人，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七日生，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卒於紐約。享年七十歲，實足年齡則為六十九歲又十個月。童年時期，初入長沙明德小學，其愛國思想和民族思想開始孕育。旋入湘潭益智學堂（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辦），開始習英文和西洋史，採用麥爾斯（Myers）所著「通史」的中譯本，獲知希臘、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和美國革命等重要大事，開拓了他的視野與胸襟。民元赴美讀書，年僅十七歲。先入密蘇里派克維爾「派克學堂」（Park Academy, Parkville, Missouri），奠立英文基礎；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轉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 Ohio），主

* 此為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九日清華同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聯合主辦「蔣廷黻先生逝世廿周年紀念演講會」講稿。

修歷史，四年後獲得文學士學位^①。民國八年至十二年（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從沙費爾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習「歐洲發展史」（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歐人向外擴張史），從海斯（Carlton J. H. Hayes）教授習「歐洲近代政治社會史」（西元一八一五以後），研究主題為「族國主義」（Nationalism），使其明瞭工業革命的發生，引起社會巨大的變化。又讀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及穆爾斯（H. B. Morse）「中國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這些課程和書，使其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極為注意。回國以後，即將海斯所著「*Essays on Nationalism*」譯成中文，名為「族國主義論叢」。在哥大時，他與羅家倫先生締交，互相討論有關中國史學及其研究方法問題。羅轉借顧亭林的「日知錄」、黃黎洲的「明夷待訪錄」、趙甌北的「廿二史劄記」供其閱讀。蔣先生親自講過：「最早賞識我，勸我做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羅志希^②」。民國十二年，他得到博士學位，論文為「勞工與帝國」（其子題是「關於英國勞工黨，特別是勞工黨國會議員，對於一八八〇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之研究」），即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廷黻先生獲得學位後，即返國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六年，授「西洋史」，偶而也教過「帝國主義的擴張史」（三學分）一類的課程^③，但研究的重心卻放置在「中國外交史」上。他自己說，一面「學習」中文，重讀四書五經，研究文章和詩詞，並閱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增強其運用中國文字的能力；一面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國際關係，並往東北、西安、京、滬、杭各地及平、津的鄉村進行調查研究^④。他蒐集中國外交史第一手資料，將其選擇整理，編成「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冊，他此項編纂工作，得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支持，和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當事者，以及清華

①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蔣廷黻小傳，頁二五〇～二五三，傳記文學出版社，七十年九月再版。蔣廷黻英文口述稿，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第四、五兩章，頁二七～四四，傳記文學社叢書，六十八年三月初版。按此書第十四章，頁一六〇，「一九〇〇年，蘇軍佔領瀋陽時」，應為「俄軍」之誤；又「加拉罕一九二〇年任駐華大使時」，應為「一九二四年」之誤。想係譯者之誤也。陳之邁著：「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頁一五～一六，傳記文學社叢書，五十六年一月初版。

② 羅家倫，「壇坫風塵——憑弔蔣廷黻先生」，傳記文學第八卷第一期，五十五年元月號。見羅著「逝者如斯集」，頁一九七～二〇一。

③ 張茲闓，「師生之間」，見傳記文學第二九卷第五期，六十五年十一月號，頁二七。

④ 「蔣廷黻回憶錄」第十章「革命仍須努力」，頁九四～一〇一，及第十一章「國內遊歷」（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一〇三～一一九，又張茲闓前文稱其在南開任教時，曾偕學生往學校附近八里臺調查。

大學圖書館主任洪範五等的協助，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且特委蔣先生研究中國外交史，凡此都促成了這部史料輯要的早日問世^⑤，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北伐成功，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大學校長。民國十八年，羅校長延聘蔣先生為清華歷史教授兼歷史系主任，至二十四年離職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為止，在校前後七年。除了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夏到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九月這一年之間，曾赴德、英、蘇聯各國考察並參閱檔案蒐集資料外，其餘五年多的時間都在清華。他一面繼續整理清宮檔案，蒐購私家函札，從事研究，在「清華學報」等期刊上發表「琦善與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等論文多篇，這些論著多根據新史料作史實的重述和重估。一面則倡導歷史的科學研究方法，不再限於版本、訓詁的研究及章句的解釋，而尋求對整個中國歷史的了解，冀使清華歷史系成為全國充實的歷史教學中心之一。換言之，過去的史學家，是「治史書而不是治歷史」，當代的史學家，則要在治史書之外，尤以「治歷史」為重心。經其數年的努力，清華歷史系教授的陣容，在全國首屈一指。如雷海宗、陳寅恪、姚從吾、蕭一山諸先生及在座的劉壽民老師，皆一時之選。另外尚有較年輕的教授如張蔭麟、張貴永、邵循正、吳晗、王信忠等多人。蔣先生自己開「近代史」與「近代外交史」兩門課程^⑥。他的學生如王信忠（治中日、中法關係）、邵循正（治元史）、梁嘉彬（著十三洋行考）、朱謙雲（治蘇聯歷史）等對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都有深湛的造詣，日後皆為國內著名的學者^⑦。他鼓勵學生讀研究院，能够從事日本、蘇俄、蒙古、西藏及越南歷史的研究，並學習相關的語言，如研究成績好，即推薦其到國外去深造，以培養治鄰邦和邊疆史的專才，這的確是一種高瞻遠矚的做法^⑧。廷獻先生從政之後，他的學術研究尚未及告一段落；但仍能於民國二十七年烽火遍地之時，寫成其「中國近代史大綱」，雖僅有四章二十三節，六萬三千餘字，但極為簡單扼要，繪出了中國近代史嶄新的架構和段落。

民國四十六年，蔣先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這時他正為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四十七年十一月，應聘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通信研究

⑤ 蔣廷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編者自序」，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二～三。

⑥ 陳之邁，「蔣廷獻的志事與平生」第三節「求學與治學」，頁一七～二四。

⑦ 「蔣廷獻回憶錄」，頁一三〇～一三一。劉崇鉉「我所認識的廷獻兄」，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頁三〇～三一。

⑧ 「蔣廷獻回憶錄」，頁一三〇～一三一。

員，迄五十四年十月九日逝世爲止，共計七年之久^⑨。蔣先生主持清華歷史系的初期（約在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間），近史所首任所長郭廷以教授適在該系中擔任「教員」，與蔣先生誼爲同事。兩人皆治近代史，在觀點和方法上，頗有相同之處^⑩。近史所成立後，蔣先生極爲贊許和支持。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蔣先生藉返國述職之便，首次來近史所參觀訪問^⑪。這時近史所成立甫及一載，設備不足，一切尚在草創時期，但已經受到他的重視。民國五十年五月七日，蔣院士二度訪南港，由近史所與史語所聯合舉行茶會，在蔡元培館歡迎蔣院士伉儷（夫人沈恩欽女士），蔣先生在談話中表示「晚近我國人文科學研究成就，不如自然科學」^⑫。言下頗爲慨嘆。蓋其弦外之音，認爲培養具有全面通識之人才，誠非易事；專家與通才，各有其重要性，不可偏廢。五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上午，蔣院士伉儷第三次訪問近史所，郭所長以茶點接待，並在會議室舉行座談會，參加座談者尚有耶魯大學李田意教授，史丹福大學劉子健教授，及本所全體研究人員，誠爲一盛會。蔣先生的講題爲「研究近代史中的幾個問題」。討論主題則偏重於民初歷史及檔案管理^⑬。蔣先生提出幾點極有興趣而又甚爲重要的意見：一是袁世凱手批「二十一條」的問題。他懷疑袁之手批可能是假的，因爲手批的字跡過於工整，反容易啟人疑竇。討論結果，大家比較接近的看法是原批或爲真跡，根據史實判斷，很可能在簽訂二十一條以後，袁爲了替自己洗刷，而加以補批的。二是袁世凱在朝鮮的政策問題。他懷疑一八八四年以前，袁和李鴻章在朝鮮的積極政策，背後很可能有英國的鼓勵和支持。建議詳查英國公檔局(Public Record Office)的檔案，以資印證。三是他認爲保定軍官學校，對中國近代歷史影響甚大。建議研究這一軍事學校的性質、水準、課程，進一步探討其與近代政治的關係。四是提出檔案室和原始史料的重要性，盼望近史所對所藏史料，妥加保管；並主張必須有一個較能防火、防溼、防蟲的完善建築，以保存外交檔案。（近史所現正規劃建築一座設備完善，合乎現代標準的檔案室，蔣先生的提議，在他逝世二十年後的今天，已即將實現了）。座談會之後，大家一起在蔡元培館聚餐，他看到近史所有這麼多年青

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病故同仁」表。近史所出版，七十四年二月，頁二五。

⑩ 郭所長生前曾談及在清華任教員事，據云教員之職位，約在講師和助教之間。

⑪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近史所出版，七十四年二月，頁七。

⑫ 同前。「近史所大事紀要」，頁二八。

⑬ 「近史所三十年史稿」，頁一九四。「近史所大事紀要」，頁四三。

的同道，而對今後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抱著很大的希望^⑭。這是本所一部分老同仁與蔣先生最後一次的見面，此後以迄他的逝世，未曾再來過南港。

在蔣先生的晚年，他曾屢次向朋友們表示，將於七十歲退休，回到中研院近史所作關於現代史的研究撰寫工作。五十四年五月間，他離開華府的雙橡園，仍擬於九月間即到臺北，在南港居住，繼續從事近代史的研究^⑮。可惜十月即行去世，素志未竟，這不僅是近史所無可彌補的損失，也是全國史學界莫大的損失。

此外，他有一個編纂中國通史或全史的構想，主張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China Foundation)的款項，資助學者，完成一部義法謹嚴符合國際學術水準的中國全史，可以媲美英國的劍橋全史(上古、中古及近代)。他促成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中國上古史編纂計畫」，但近代史的部分，卻因其逝世，無法實現^⑯，殊為可惜！

二、蔣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

蔣先生有關中國近代史方面的著述，並非十分豐富；但他是開風氣的人（與羅家倫先生並稱為「南羅北蔣」，兩人的看法，相同之點甚多，而在清華短暫的共事，又是兩人合作最愉快的時期），對近代史研究開拓嶄新道路的人，提出了新的架構和觀念的人，影響於後來的學者甚大。李濟之先生說：「他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緊要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有了這些觀念的運用，他才能把這一大堆原始資料點活了」^⑰。郭廷以先生說：「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一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在這一方面，他最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特別是給我們新的方法與新的觀念。蔣先生的影響力，不只限於清華，而普及於整個中國史學界，而且及於海外」^⑱。這些都是實話，並非過譽之詞。

自道光年間夏燮（江上蹇叟）的「中西紀事」起，一直到民初劉彥的「

^⑭ 劉鳳翰，「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傳記文學第七卷第六期，五十四年十二月號，頁二七～二八。

^⑮ 王世杰，「悼蔣廷黻先生」，傳記文學第七卷第六期，頁一二。

^⑯ 劉崇鉉，「我所認識的廷黻兄」，傳記文學第二九卷第五期，六十五年十一月號，頁三〇～三一。

^⑰ 李濟，「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臺到美京雙橡園」，傳記文學第八卷第一期，五十五年元月號，頁二八～三〇。

^⑱ 同註^⑭，劉鳳翰前文，傳記文學七卷六期。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關於中國外交史或近代史的著作，在資料方面，蒐集不全，舛誤亦多；而在態度方面，對外力壓迫，作者多具有「蒿目增傷，裂眦懷憤」強烈的主觀意識，而難求其客觀^①。蔣先生則無論在資料、方法和觀念各方面，都有新的創獲和新的突破，逐漸建立起客觀的近代史研究，而從外交史開始。他認為「外交史仍然是歷史。不是做宣傳，也不是辦外交，是研究歷史。歷史學自有其紀律。這紀律的初步就是注重歷史的資料。資料分為原料（primary source）和次料（secondary source）兩種，研究歷史者，必須從原料下手」^②。他又說：「外交史的特別，在於它的國際性質。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研究外交史者必須搜集凡有關係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訴訟。……我編這書的動機不在說明外國如何欺壓中國，不平等條約如何應該廢除，我的動機全在要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③。從這兩段「自序」中，已可清楚的看出蔣先生處理資料的態度，運用資料的方法，及治中國近代史的新觀念。他編此書選擇材料的標準有三，一為擇其信，二為擇其要，三為擇其新^④。惟「信」始可達成歷史的真確和客觀，惟「要」始能把握歷史的綱領和脈絡，惟「新」始有歷史新義之發明。

從此種理論和觀點出發，他在南開和清華任教時期，也躬行實踐。他認為研究中國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戰前，中國的材料，很為重要；甲午之後，則非參考外國相關的材料不可。他一面在平、津辛勤的蒐集中國資料，對清代歷史文獻極有興趣；故宮博物院影印「三朝籌辦夷務始末」，便是由他建議的。一面又到莫斯科、柏林、倫敦、巴黎等都城，參閱各國有關檔案，對英國公檔局的檔案，最感興趣（當時該局僅允閱覽一八八四年以前之檔案）。他認為研究實際的外交文書，為歷史家最基礎的工作，尤以近代史為然。他對檔案的重視和倡導研究檔案，發生了很深遠的影響。直到今日，從事近代史研究的朋友、同道，很少人不接受他的這種看法的。其次，他訓

^①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第二分冊，頁一〇一五～一〇一六，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一年十一月初版。書中轉引夏燮「中西紀事原鈔」（道光三十年十二月）稱：「於是蒿目增傷，裂眦懷憤，爰蒐輯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錄而存之。……藉備異日史家之采擇。雖然支離瑣屑，神人以為大祥，尸祝代庖，君子譏其出位。居閒散而抱先憂之隱者，無乃類是」。按夏燮自號江上蹇叟、樹山居士，安徽當塗人。道光元年（一八一）舉人。所論雖非無見，但對西洋史地所知甚疏。

^②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作者「自序」，商務版，二十年十一月初版，頁一。

^③ 同註^②，「資料輯要」上卷，作者自序，頁一～二。

^④ 同註^②。

練學生，凡研究近代史、尤其外交史者，都必須研究了解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的歷史。如研究中日關係，必須懂日文，懂日本歷史，能夠利用日本資料；研究中英關係、中德關係或中蘇關係者亦然²³。否則仍是隔靴搔癢的或片面的研究。

蔣先生有志完成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國近代史，可惜宦途匆忙，無暇執筆；退休後天不假年，使他也沒有撰寫的機會，十分可惜。前面所說的那本「中國近代史大綱」，只不過是他心目中全部鉅著的一個小小「模型」而已。此一僅六萬餘字的「大綱」，初看起來，似乎像袖珍本 (pocket-book)，又像一個簡明的通俗版或普及版 (popular edition)，專門供一般人閱讀用的。實則，這部小書，包含了蔣先生對近代中國全盤的看法，及其治史的不易的原則。茲分數方面，略加解釋如下：

其一、這本「中國近代史大綱」，實際上也就是「外交史大綱」，在蔣先生的那個時代（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外交史」和「近代史」是二而一的。內政上的興革，只不過是外交的「反應」(response)，這與十九世紀以還，中國遭受一連串外力的壓迫有關。所以早期治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多以外交史為重心，蔣先生亦不例外；但他既能高瞻遠矚，又能冷靜客觀，故他的研究，自成系統，發前人所未發。這種優點，在「大綱」的立論中，清楚地顯現出來。

其二、從「大綱」中，見出蔣先生所立的中國近代史嶄新的架構。從開始的時間來說，他大膽的斷自十九世紀初葉，劈頭便敘述英國因鴉片買賣，而導致了中英鴉片戰爭，英國人稱之為「通商戰爭」。有些學者並不同意此種時間的劃分法，但蔣先生的用意，乃以十九世紀初葉為近代中國大變局之開始，中國人只有改弦更張，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情勢與前代迥不相同。所以他這種劃分法，是以時代特徵為依據的。從史實演變的段落來說，外交與內政相表裏，從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從太平天國至自強運動，從甲午戰爭至庚子拳亂，從變法維新到革命運動。前後銜接，相互關聯，十分清晰的看出近代中國演變的輪廓。以後撰寫近代史的學者，多未逾越蔣先生所建立的架構²⁴。

其三、蔣先生的基本觀念，認為近代中國的悲劇，是肇因於嘉、道間的

²³ 李濟，「廷獻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與關切」，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六十五年十一月號，頁六～一〇。

²⁴ 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立達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四月港一版。（初版於抗戰時期在重慶發行）。

中國人不認識西方世界；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近代化，利用科學和機械，發揚民族主義，以求復興和富強。「大綱」中縱橫交織著此種觀點，有清晰的脈絡可循。對主張「撫夷」的琦善，頗表同情，認為他深知中外強弱之勢，想用外交的方法解決問題，其失敗是因士大夫階級不信任他，他也無自信心^②。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長文中，分析尤為詳盡，蔣先生論琦善稱：「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③。又稱：「外交的元素不外『理』與『勢』。鴉片戰爭的時候，中英各執其理，各是其是。故中英的問題，論審勢，論知己知彼的工夫，琦善無疑的遠在時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時人簡直是無知無解^④」。這種論調，被時人譏為「做翻案文章，以驚世駭俗」，「攻擊林文忠公而袒護琦善」^⑤。平心而論，琦善固然不算媚外，也稱不上為一審勢明理的外交家；然蔣先生特別加以揄揚，蓋亦有故。此時（一九三一年）日人已佔領東北，步步進逼，國人要求抗日之呼聲，響徹雲霄，學生的愛國運動，風起雲湧。戰爭氣氛，瀰漫全國。但中日強弱懸殊，外援又不可恃，倉促作戰，損夫必鉅。有識者難免恍然心憂。所以蔣先生與丁文江等，在「獨立評論」撰文，皆主張爭取和平，充實國力^⑥。故對琦善過高的評價，當係有所感而發，或是一種影射作用。

其四、他對十九世紀中國人物的評論，力求持平，不輕易責備前人。對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等，皆甚稱許，謂他們「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⑦。他尤其推崇曾氏辦理天津教案，擇善固執的精神。稱其不顧時人誹議和外人威脅，抱定宗旨，為國家，為正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譽之為「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結晶」^⑧。對郭嵩燾、曾紀澤、張之洞等之膽識，與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也表示由衷的敬佩。他的書中無一句憤激之語，武斷之詞，此乃「學術化外交史」的特色。

從以上四點來看，「大綱」這本小冊子，深入淺出，實為爐火純青的上

② 同前書。第一章「剿夷與撫夷」，頁一九～二一。

③ 蔣廷黻著，「琦善與鴉片戰爭」，見「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三期，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北平。

④ 同前文。

⑤ 張忠絳著，「迷惘集」，田風印刷廠承印，香港版（無出版年月），頁二二四～二二五。

⑥ 「蔣廷黻回憶錄」，第十三章「九一八事變與獨立評論」，頁一三五～一五〇。

⑦ 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第三章「自強及其失敗」，立達，港一版，頁六二。

⑧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自序」，商務版，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頁二～三。

乘著作。

此外，蔣先生在近代史方面的另一卓越貢獻為對俄國的研究。清季最早注意到來自北方的邊患者，為林則徐。他說：「中國之患，其俄羅斯乎！」其後何秋濤（道光進士，一八二四～一八六二）之「朔方備乘」（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版本）為研究俄事最早之書，惜乎非純粹史書^②。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俄國革命後，對蘇俄的認識較為真切者為梁任公，但他並未作有系統的研究。廷黻先生任教南開大學時，約在民國十六年前後，他曾說過：「東北問題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之下，而其困難反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該早為預備^③」。嗣後他的研究工作，以「東北問題」佔主要位置，成為其致力的重點。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他在「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發表長文「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同時運用了中國和西方的資料，旁徵博引，考證精詳。文中指出俄人向遠東發展的背景和路線，及咸豐年間，乘人之危，由「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兩個條約，掠奪了我國土地共有四十萬零九百一十三方公里，比現在的東三省還要大。從此我們的「大東北」，變成「半東北」，「殘東北」，這便是俄國「友誼」的代價^④！他又寫過「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一文，包括西元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一〇（宣統二年）、一九一二（民國元年）三個密約，內容不外劃分南北滿的日俄勢力範圍，及劃分兩國在蒙古的勢力範圍^⑤。這個殘酷的現實，無異對主張聯俄者，予以當頭棒喝！其後蔣先生對蘇聯的歷史亦極有研究，在出任駐蘇大使之前，曾往訪莫斯科，留住數月，研究俄國外交檔案，據說發現不少珍貴資料^⑥。關於蘇俄問題，他發表過的文章很多，有「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二十一年六月，獨立評論第六號）、「中俄復交」（二十一年十二月，獨立評論三二號）、「蘇俄出售中東路」（二十二年七月，獨立評論五八號）等篇^⑦，指出蘇俄之狡詐權變，與帝俄如出一轍。蔣先生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雖僅短短數年，而他

②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第二分冊，近史所編，頁一〇五四～一〇八四。

③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小引」（民國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於紐約），見蔣氏所著「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九思出版社，六十七年十一月，頁七七。

④ 蔣廷黻著，「蔣廷黻選集」，第二冊，頁一七七～二四九，文星叢刊一二七，文星書店出版，五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⑤ 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研究」，九思版，頁五七～六二。

⑥ 劉錯，「我對廷黻先生的觀感」，傳記文學第二九卷第五期，頁一一。

⑦ 「蔣廷黻選集」第一冊，頁八七～九三，頁一七一～一七五；第二冊，頁三五～三四，文星叢刊一二七，文星書店版。

對俄國瞭解的程度，已相當深入，迄今國內尚難找出一位能像蔣先生這樣研究中俄外交的學者。

以上謹就蔣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的倡導和貢獻，拉雜的加以敘述。曾記得李濟之先生在一篇紀念蔣先生的文中稱，他曾問蔣先生：「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反問道：「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②？這段對話，真是膾炙人口，其機智和風趣，可以媲美於晉人的世說新語。李先生認為這話是蔣先生的「外交詞令」，後來也有些人對這段話作另外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我想，蔣先生這話應當是真心話，是非常誠懇的。本來知識份子有他學術的生命和政治的生命，創造歷史（立功）和寫歷史（立言）同樣的都是「創造」。除非少數的槩槩大才，是難以得兼的。蔣先生從事政治和外交的工作後，自然也影響到他的學術研究。但我想蔣先生這段話的意思或許是另有所指。他批評曾國藩說：「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洋社會裏，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並不忽略作事。這是他的特點^③」。從這段話中來引申其義，他或許認為司馬遷的寫史和張騫的鑿空是並不衝突的；同樣的可以感受到「創造」的快樂。由此可以看出蔣先生雖飽受西方學術文化的洗禮和浸潤，卻仍不失其儒家的精神、懷抱，從他對其鄉先賢曾文正公的推崇，就可以得到證明。

今天是廷黻先生逝世的廿週年，二十年恰恰够上一個世代。前驅者的腳步，漸漸的遠了。這些年來，近代史的範圍，已比從前廣得多，由外交史和政治史，逐漸擴及到制度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思想史、區域史、科技史等各方面的研究。在時間上來說，亦上溯到明末清初，下延至民國時代，不再限於十九世紀。近代史的研究，可說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拓荒者付出的心血，與其卓越的貢獻，仍將永遠令人懷念不忘。我所講的僅係蔣先生對學術方面的倡導，關於他在事功方面的建樹，黃俊傑教授必定會有詳盡的論述。我的報告就此結束，並請各位先生不吝賜正。謝謝。

七十四年十月九日報告
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訂

^② 李濟，「廷黻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與關切」，傳記文學第二九卷第五號，頁一〇。

^③ 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立達，港一版，頁四八。



學人簡介

郭 廷 以

呂 實 強
張 瑞 德

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先生逝世已屆滿十週年。近代史研究所除將其遺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出版，並委託聯經出版公司將其論文集出版外，囑為郭先生寫一傳略，以為紀念。

郭廷以先生(一九〇四~一九七五)，字量宇，河南舞陽人，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早歲入本鄉初等小等，民國四年轉乙種蠶桑學堂，七年入開封省立第二中學，九年轉學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十二年保送東南大學歷史系，十五年冬畢業。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編史委員會秘書，繼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編譯部編譯。十七年秋，任清華大學歷史教員。嗣後除應朱家驊先生之邀，短期出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長外，始終堅守學術崗位，四十餘年如一日。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並曾於中央大學兼任歷史系主任及訓導長。三十六、七年一度來臺任臺灣大學教授，三十八年起任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四十四年一月應聘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繼任所長。五十七年七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五十八年八月應邀前往夏威夷大學講學。六十年辭去所長職務。六十一年退休後，相繼應邀赴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夏威夷大學講學與研究。

郭氏為學，柳詒徵、徐則陵二人首啟導之，而專力於中國近代歷史，則實受羅家倫、蔣廷黻諸先生之影響。先生治學範圍甚廣，歷年於各校擔任課程，除中國近代、現代史外，舉凡西洋史、中國通史、中西交通史、西域史、古代史、元史、明史、清史，均曾講授，著述中亦涉及之，並曾出版教材多種。先生於中國近代史用力最勤，畢生著述不下數百萬言，其中尤以「近代中國史」（民國二十九~三十年出版）、「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民國

三十五年出版)、「臺灣史事概說」(民國四十三年出版)、「近代中國史綱」(民國六十四年出版)諸書最負盛名。郭氏治史於基本史實之考訂及工具書刊之編纂極為重視,除上述「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外,並先後編纂「太平天國曆法考訂」(民國二十六年出版)、「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民國五十二年出版)、「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民國六十八~七十四年出版)等書,給予學者極大之裨助。

郭氏除本身研究著述之外,一項極大的貢獻,為受命擘劃開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民國四十四年籌備伊始,迄民國六十年卸任,十七年間,無論房舍之建立、人員之培育、圖書檔案之置備、珍貴資料之蒐集,各項史料之編纂與刊行,國際學界之連繫與交流,以至專題研究之推動與發展,無不在其主持之下,蒸蒸日上,使一所原來幾一無所有的草創機構,竟迅速成為一個深受國際尊重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術中心。

先生於退休之後,仍然孜孜於研究著述,「近代中國史綱」即於此一時期完成;「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直迄其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病逝之前,仍在增訂刪補。故先生於學術之研究開拓,可謂已至鞠躬盡瘁。

附錄：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

一、專 書

1. 太平天國大事日誌,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民國二十三年。
2. 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
3. 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長沙: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九年。
4. 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長沙: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年。
5. 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五年,二冊。
6. 中華民族發展簡史,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民國四十二年。
7. 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四十三年。
8. 俄帝侵略中國簡史,臺北:臺灣書店,民國四十三年。
9. 中國近代史概要,臺北:青年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
10. (合著)中越文化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五年,二冊。

11. 中國通史，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民國四十九年。
12.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二年，二冊。
13. (comp.) *Sino-Japanese Relation, 1862-1927: A Checklist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14. (編) 郭嵩燾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九年，二冊。（按：本書由尹仲容創稿，陸寶千補輯，郭氏編定）
15. 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民國六十四年。
16.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八年。
17.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
18.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
19.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四年。
20. 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
21. 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中。
22. 中國通史，稿本，五冊，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按：本書原稿未著書名）
23. 張公權先生大事記，稿本，郭廷以夫人（郭李心顏女士）私人收藏。

二、論 文

1. 八十年來中國大事簡誌，說文月刊，第四卷（民國三十三年五月），頁九九九～一〇五八。
2. 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新中華，復刊第六卷第六期（民國三十七年三月），頁六～三二。
3. 中國近代化的延悞——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民國三十九年七月），頁七～一〇；第一卷第三期（民國三十九年八月），頁一六～二〇。
4. 歷史的臺灣——歷史上的臺灣與中國，自由中國，第三卷第一期（

- 民國三十九年七月)，頁二五～二九；第三卷第二期（民國三十九年七月），頁二一～二五；第三卷第三期（民國三十九年八月），頁一九～二一；第三卷第四期（民國三十九年八月），頁一六～一七；第三卷第五期（民國三十九年九月），頁一七～一八；第三卷第六期（民國三十九年九月），頁一七～一九；第三卷第七期（民國三十九年十月），頁一八～二〇；第三卷第八期（民國三十九年十月），頁一九～二一；第三卷第九期（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頁一六～一八；第三卷第十期（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頁二五～二六；第三卷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頁二一～二五；第三卷第十二期（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頁二〇～二五。
5. 中日交涉中的歷史教訓，大陸雜誌，第二卷第四期（民國四十年二月），頁一～五。
 6. 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七期（民國四十年十月），頁二一～三二。
 7. 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大陸雜誌，第四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一年一月），頁一～五；第四卷第二期（民國四十一年一月），頁二〇～二四。
 8. 六十年來的中國——大事誌略，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民國四十一年十月），頁四七一～五二四。
 9. 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大陸雜誌，第五卷第九期（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頁一～四；第五卷第十期（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頁一六～一九；第五卷第十一期（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頁二一～二四。
 10. 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二千年的經營，大陸雜誌，第七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二年七月），頁三～七；第七卷第二期（民國四十二年七月），頁八～十一。
 11. 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幼獅，第二卷第三期（民國四十三年三月），頁四～九。
 12. 中英鴉片問題與林則徐的措置，幼獅，第二卷第五期（民國四十三年五月），頁一一～一五。
 13. 六十年前中日的戰與和，幼獅，第二卷第七期（民國四十三年七月），頁二三～二四；第二卷第八期（民國四十三年七月），頁二

- 三~二四。
14. 東北的開拓——明清的東北經營，收於：凌純聲等著，邊疆文化論集（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頁三八~五六。
 15. 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大陸雜誌，第十卷第二期（民國四十四年一月），頁二五~三二。
 16. The Totalitarian Rul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 No.2, Part I (1955), pp.209-230.
 17. 評「捻亂」，大陸雜誌，第十卷第八期（民國四十四年四月），頁一二~一四。（按；所評之書為 Siang-tseh Chiang, *The Nien Rebellion*, Seattle, 1954.）
 18. 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受阻，收於：董作賓等著，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四年，頁二〇九~二二六。
 19. 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收於：郭廷以等著，中越文化論集（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五年，頁一~三五。
 20. 太平天國戰史，收於：張其昀等著，中國戰史論集（下），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五年，頁一~二五。
 21. 中國與第一次美韓條約，收於：黃正銘等著，中國外交史論集，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民國四十六年，頁一~二八。
 22. 袁同禮譯，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五年，序。
 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臺北：編者印行，民國五十五年，序。
 24. China's Modernization As Seen from Her Foreign Contact. 1969. 18p. Manuscript.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25. 郭廷以編，郭嵩燾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年，序。
 26. Early Stage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Taiwan, 230-1683. In Paul K. T. Sih, ed. *Taiwan in Modern Time*. N.Y.: St. John's

-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1-29.
27.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1863-1891*. In Sih, *op. cit.*, pp. 171-240.
 28. 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八卷第四期（民國六十四年四月），頁一六～一九。
 29. 臺灣早期的經營（二三〇年～一六八三年），收於：薛光前、朱建民主編，近代的臺灣，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六年，頁一五～一九。
 30. 臺灣的開發和現代化（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收於：薛光前、朱建民，前引書，頁一三一～一六四。
 31. (Co-authored with Kwang-ching Liu)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91-542.
 32. *Kuo Sung-t'ao and His Concept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West: Discussion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a Chinese 100 Years Ago*. n.d. 23p. Manuscript.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三、編纂與校訂

1. 海防檔（咸豐十一年至宣統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四十六年，十七冊。（按：郭氏與張貴永、陶振譽、楊紹震、胡秋原等人共為編輯委員）
2. 礦務檔（同治四年至宣統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四十九年，八冊。（按：郭氏與張貴永、陶振譽、楊紹震、胡秋原等人共為編輯委員）
3. 中俄關係史料（民國六年至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九冊。（按：郭氏與胡秋原共任外蒙古部分主編，及其餘部分之校訂工作）
4. 中法越南交涉檔（光緒元年至宣統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七冊。（郭氏與王聿均共任主編）
5. 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 所，民國五十五年。（按：郭氏任主編）
6. 四國新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五年，四冊。（按：郭氏任主編）
 7. 中美關係史料（嘉慶十年至同治十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七年，三冊。（按：郭氏與陶振譽共任同治朝部分主編）
 8. 中國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七年，十冊，打字油印本。（按：郭氏與李毓澍共任主編）
 9. 中俄關係史料（民國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三冊。（按：郭氏與王聿均共任主編）
 10. 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一年，十一冊。（按：郭氏與李毓澍共任主編）
 11. 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二年。（按：郭氏與張朋園共任校閱工作）
 12. 徐啟明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二年。（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3. 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二冊。（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4. 周雍能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5. 戟翼翹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四年。（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6. 王奉瑞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四年。（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7. 于潤生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五年。（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8. 傅秉常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19. 張維翰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0. 石敬亭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1. 張知本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2. 秦德純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3. 熊斌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4. 鍾伯毅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5. 鄧家彥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6. 陳肇英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7. 汪崇屏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8. 莫紀彭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29. 何成濬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0. 田培林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1. 孫連仲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2. 趙恒惕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3. 馬超俊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4. 萬耀煌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5. 李品仙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6. 沈鴻烈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7. 劉航琛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8. 賀國光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39. 劉景健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與沈雲龍共任主訪人，並任校閱工作）
40. 張其煌夫人（聶其德）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與沈雲龍共任主訪人，並任校閱工作）
41. 龔浩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2. 胡宗鐸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3. 李文彬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4. 劉茂恩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主訪人及校閱工作）
45. 白瑜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6. 袁同疇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7. 劉士毅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8. 齊壽山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49. 向構父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0. 黃膺白夫人（沈亦雲）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主訪及校閱工作）
51. 張廷諤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2. 李鴻文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3. 雷殷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4. 楊森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5. 李毓萬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6. 蔣鼎文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7. 吳開先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8. 余漢謀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59. 劉景山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0. 董彥平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1. 黃恒浩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2. 張喬齡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3. 吳思珩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4. 於達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5. 劉承漢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6. 王微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7. 盛文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8. 黃季陸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69. 邵百昌先生訪問記錄，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按：郭氏任校閱工作）
70. 臺灣史參考書目，稿本，四十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四、其 他

1.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9, No. 14 (August, 1960), pp. 495-497.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的工作，收於：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編，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中日韓第一次會際會議報告，臺北：編者印行，民國三十年，頁一三一～一三九。
3.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Newslet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 9, No. 1 (October, 1963), pp. 20-23. （按：本文發表時未署作者姓名，疑為郭氏所撰）
4.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ewslet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 11, No. 3 (February, 1966), pp. 20-22. （按：本文發表時未署作者姓名，疑為郭氏所撰）
5. 良規的志行，收於：江良規博士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江良規博士紀念集，臺北：編者印行，民國五十七年，頁五六～六一。
6. 緣起小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期（民國五十八年八月），頁一～二。
7. 中國近代史研究計畫綱要，稿本，七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報告（民國四十七年四月至民國四十八年二月），打字油印本，三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報告（民國四十八年三月至民國四十八年六月），打字油印本，一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過去與前瞻，稿本，七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1.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ts Past and Prospect. n.d. 4p. Mimeographed.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年計畫，稿本，十二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年計畫補正 —— 提交福利基金會，稿本，六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4.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Taiwan on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n.d. 17p. Manuscript.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5. 臺灣的近代中國史研究機會，稿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6. Opportunities for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aiwan. n.d. 16p. Manuscript.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7.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aiwan: A Short Report on the Efforts Made in Taiwan Concerning the Studi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s. 1963. 10p. Mimeographed.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8. 近史所五年計畫，稿本，一頁，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19.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d. 10p. Mimeographed. 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紀念室。

「學人簡介」欄徵稿

傳略以二、三千字為宜，應包括出生時地、學經歷、學術貢獻等方面，並請附著作目錄。

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張玉法 張朋園

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先生，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邀，來臺灣訪問十天。訪問期間，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講演「關於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一書的增補工作」、在聯合報社講演“Modern America's Cultural Debts to China”，並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有關學者座談中美文化交流問題。韋教授以七七高齡，偕夫人同來臺灣，致力於中美學術文化交流工作，其精神至為可佩。

韋慕庭教授，原籍美國俄亥俄州德敦城 (Dayton)，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生，父親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任中國青年會秘書。韋教授一九三一年在奧柏林大學 (Oberlin College) 畢業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肄業一年後，與韋夫人結婚。一九三二年偕夫人同去北平，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一九三三年獲碩士學位，一九三四年返國，續在哥大深造，一九四一年獲博士學位。韋教授在讀研究院期間，專攻西漢史，其博士論文「西漢奴隸制度」(*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206 B.C.-25 A.D.*)，一九四三年由芝加哥的 Field Museum Press 出版，厚達四九〇頁。

韋教授的「西漢奴隸制度」得以在 Field Museum 的出版部出版，部分得力於他與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一段關係。原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的第三年，即一九三六年，曾到該博物館任職。一九四三年他的「西漢奴隸制度」出版，其時二次世界大戰方酣，美國正在亞洲與中國併肩作戰，身為「中國通」的韋教授有機會到美國國務院服務，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轉到哥倫比亞大學任副教授，一九五七年升為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達三十年，於一九七六年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

韋教授原來的研究興趣是中國古代史，但他在美國國務院服務期間，尤

其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後，使他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發生興趣。他在哥倫比亞大學開的是中國現代史方面的課程，個人的研究興趣則集中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國共關係。一九五六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出版了韋教授與夏蓮蔭 (Julie How) 女士合編的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一書，該書是利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蘇俄大使館所搜查得到的蘇俄陰謀赤化中國的文件編譯而成，全書達六一七頁。其後，韋教授從事孫中山傳記的撰寫，先後費時二十年，到一九七六年，他的「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孫中山的經典之作，在國內外均獲好評。

韋教授的孫中山傳記出版以後，又參與劍橋中國史的編寫工作。編寫的成果，發表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第十二卷劍橋中國史中，全文長一九八頁，題名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1928”。次年，劍橋大學出版部又單獨把韋教授的這篇長文出版成一本書，題名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韋教授的學術論著目錄，詳見本文附錄，此處不多介紹。韋教授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貢獻，尚有兩點，值得特別介紹：其一、創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計畫：此一計畫開始於一九五七年，係韋教授與何廉教授共同主持，有計畫地對旅居紐約、香港等地的中國軍、政、財、經及外交、教育、學術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作口述歷史訪問，先後從事此一訪問計畫工作的有夏蓮蔭、唐德剛等七位，被訪問的著名人物有蔣廷黻、胡適、李漢魂、李璜、李書華、左舜生、顧維鈞、李宗仁、陳光甫、孔祥熙、沈亦雲、何廉、張發奎、陳立夫等。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訪問計畫開始進行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與哥大合作，在臺灣進行口述歷史訪問。哥大的口述歷史計畫早已停止，而近史所的口述歷史計畫尚不斷加強進行。推源其始，當要感謝韋教授的倡導。

其二、推動中美學術合作：一九六二年，在戴德華 (George Taylor)、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等人的協助下，美國福特基金會開始資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後十年，共用美金四十二萬一千元，資助項目包括研究補助、圖書購置、出國進修、圖書出版、口述歷史、檔案編纂等方面。韋慕庭對福特基金會資助近代史研究所的成果曾作評估說：「福特基金會補助近代史研究所，恢復了中國歷史學術研

究的品質，近代史研究所近年來能夠成爲一個國際上受到尊敬而在學術上有影響力的機構，福特的補助是部分原因。有此十年補助，該所的潛力得以高度發發揮。」

除福特基金會對近史所的資助外，韋慕庭對其他方面的中美學術合作的推動也不遺餘力。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於一九六四年成立，最先注意的是自然及應用科學方面的事宜。經韋教授等的建議，於一九六六年成立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推動人文研究、經濟研究、臺灣社會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等，成績斐然。一九七〇年初，美國與中共接觸改善關係，美國學界多有主張與中共合作，放棄臺灣關係者，而韋教授力主維持繼續合作。是年十二月廿九日韋氏致函美國學術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主席巴哈德(Frederick Berhardt)，強調「雙方合作關係不可中斷」(Keep this joint venture alive)，使近十餘年來之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得以繼續發展。

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五年的三十年間，韋教授先後來臺灣九次，其中較長的一次是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是在近代史所做研究工作，也因此結識了近史所的同仁，並奠定了與近史所同仁的友誼。尤值一提的，韋教授雖然退休，研究工作從未停止。近年所從事的主要研究工作爲對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一書之增補，因爲韋教授又發現了許多這方面前此未出版的文件。韋教授希望增補工作早日完成，新書早日出版。

附錄：韋慕庭教授著述目錄

一、專 書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206 B.C.-25 A.D. (Chicago: Field Museum Press, 1943), 490 pp.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mpany, 1968), 490 pp.

Chines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Materials...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 56 pp.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With Julie Lien-ying How)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617 pp. (New York: Reprint Octagon Books, 1966), 617 pp.
-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410 pp. (Taipei: Caves Books, Ltd., reprint in 1981) 410 pp.
-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2 pp.
- Ch'en Kung-p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60), 148pp.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6), 138 pp.

二、論文和書評

* 章慕庭教授發表之論文和書評甚多，以下目錄為章教授選錄之代表作。

- "Contribution to 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Metallic Mirrors," *China Journal*. No. 20 (1934), 6 pp.
- "Japan and the Korean Farmer." *Asia*, No. 35 (1935), 4 pp.
- "The History of the Crossbow Illustrated from Specimens in the U.S. National Museum," *Smithsonian Report for 1936*, No. 3438 (1937), 12 pp.
- Many short articles in *Field Museum News* about Chinese antiquities. (1937-43)
- "Industrial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3 (1943), 14 pp.
- "Mao's Paradise as Seen from India." *The Reporter* (May 1955), 3 pp.
- "Chinese Doves Flutter over Jap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9, 1956), 4 pp.
- "Japa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Japan Between East & West*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7), 40 pp.
- "The Ashes of Defeat: Accounts of the Nanchang Revolt and Southern Expedition, 1927..." *China Quarterly*, No. 81 (1964), 50pp.
- "Sun Yat-sen and Soviet Russia, 1922-1924," Columbia University

- Seminar on Modern China (1965), 59 pp.
- “Forging the Weapons: Sun Yat-sen and the Kuomintang in Canton, 1924.” Columbia 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China (1966), 155 pp.
-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China in Crisis*,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 61 pp.
-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How the Early Years Helped to Shap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Quarterly* 36 (1968), 22pp. Also in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3 pp.
- “China’s Transitional Century, 1850–1950.” *China in Change: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Friendship Press, 1969), 30pp.
-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China and the Skeptical Ey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1972), 7 pp.
- “Further Reflections on Sun Yat-sen,” Columbia Seminar on Modern China (1973), 8 pp.
- “Statement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Hearing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3rd Congress (1973), 8 pp.
- “China, History of: XI The Republican Perio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1974), 13 pp.
- “Problems of Starting a Revolutionary Base: Sun Yat-sen and Canton, 1923,”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4. pt. 2 (1974), 62 pp.
- “Sun Yat-sen and Soviet Russia—a Brief Second Look,”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16pp.
- “The Human Dimension,” *Two Chinese States*, ed. by Raymon Myers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78), 22 pp.
-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1928.”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pt. 1 (1983), 198 pp.
- “Columbia University’s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 V, No.2. (February 1980), 11 pp.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Oral History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hung-yang Yen-chiu Yuan Kuo-chi Han-hsueh Hui-i Lun-wen Chi* (1981), 30 pp.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81), 23 pp.

“John K. Fairbank: A Fifty Year Memoir,” *China Quarterly*, 92 (1982), 7 pp.

“Sun Yat-sen’s Motives, Methods, and Precautions in Cooperating with Soviet Russia,” *Sun Yat-sen: Founder and Symbo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Nation-Building*, ed. by G-K, Kindermann (1982), 21 pp.

Five items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China* (1982).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Scholarship as View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R. O. C. Relations*, ed. by Cecilia S. T. Chang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59 pp.

“Modern America’s Cultural Debts to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January 1986).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稿，中、英文不拘。

(二)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用有格稿紙騰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七)來稿請寄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吳 相 湘

陶 英 惠

在從事中國近代史料的蒐集、著述、和編纂工作的學人中，鏗而不舍、成績卓著者，不乏其人，吳相湘教授則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抱著敬慎、忠實、負責的態度，秉持「有批評才能進步」的觀念，憑一個人的力量，默默地為推動中國近代、現代史的研究而努力，著作等身，貢獻良多。

吳教授，字良善，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元月二十日生於湖南常德。十一年遷長沙，入楚怡小學就讀；十五年考入極負盛名的明德中學，二十二年考取國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二十六年畢業。

自幼多病的吳教授，在父親漢聲公的指導與鼓勵下，向文史方面發展，自小學中學時代即培養起對歷史的興趣，並受武漢大學李劍農教授之提示，遂決定其終身研究史學的志向。

吳教授在北大求學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空前國難來臨，反日運動如火如荼的在進行，他認定專心研習中國近代歷史，了解近百餘年內政外交的演變，較遊行吶喊及虛矯高調要切實際且更重要。因在名師雲集的北大，專心向學，充實自己。畢業後，適抗戰發生，至長沙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代歷朝實錄的工作。及中研院西遷，因家庭事故未隨同前往。三十年冬，至第九戰區司令部參謀處編譯部擔任編纂戰史工作。及抗戰勝利，先後應聘至國立蘭州大學及國立河南大學任教。三十八年元月，自滬渡海來臺。四十一年八月，應聘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於五十四年五月辭職。翌年七月，被聘為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教授，並兼系主任。嗣因為左派報紙攻擊，於五十八年三月辭職返臺。旋應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之聘，擔任史學研究所教授並兼歷史系主任。於六十四年八月赴美定居。雖不再擔任公私有給職務，但仍著述不輟。

吳教授在北大就讀時，深受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影響，並有祖父和父親「旅行」嗜好的遺傳，所以一直在追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目標。其足跡遍及國內外，更一再遠赴日本、韓國及歐美等地作訪問研究。因為自幼養成善加利用圖書館的習慣，所到之處，均注意蒐求珍貴史料，每次遠行，都是滿載而歸，然後利用這些史料，從事研究撰寫工作。其著述內容之豐，所涉範圍之廣，非一般史學家所能比。

抗戰期間，吳教授執筆從戎，在薛岳上將第九戰區司令部參謀處編譯股擔任編纂戰史工作，曾親履最前線，身歷數次重要會戰，對抗日戰爭作直接的觀察，體認到許多珍奇的經驗，與十餘同仁所編「抗戰紀實」四冊，就是這時的成績。四十九年八月，親至日本防衛廳編修所戰史室閱讀日本軍方檔案，為我國進入日本軍部閱讀其侵略紀錄的第一人。以後便根據他在戰場上的直接觀察和實際經驗，以及多年所蒐集的原始文獻，完成了一部巨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吳教授的研究興趣及範圍，最初為清朝宮闈秘辛，他在北大的畢業論文，由孟森先生指導，題目即為「咸豐辛酉政變」。其後更在故宮文獻館蒐集到許多珍貴史料，因將「咸豐辛酉政變」擴充成為「晚清宮庭實紀」一書，又撰寫「清宮秘譚」，引起中外學術界之注意，並因此而於四十七年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國現代革命史的關係，其研究興趣才開始轉移。「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一書，就是與華大合作研究的成果，也是他研究中華民國史實撰述成冊刊印問世的第一本書。又根據多年來在海內外所蒐集的資料，於退休後完成另一部巨著：「孫逸仙先生傳」，將國父生平的志業傳播於世人。

吳教授對民國人物傳記的撰述，有極為濃厚的興趣。自四十九年起，即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學院主持「中國現代人物與政治研究計畫」的包華德(Howard L. Boorman)之邀請，陸續為該計畫撰稿，在刊行之「民國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全四卷中，吳教授與張公權、王伊同是執筆撰稿最多者，其中文稿曾陸續在傳記文學等雜誌發表。吳教授旋應傳記文學劉紹唐社長之請，就為該辭典所撰之中文原稿，稍加修訂，再增加若干篇，彙集一百人，定名為「民國百人傳」(分四冊)，於六十年元旦由傳記文學社刊行，藉以祝賀中華民國建立花甲之慶。其後陸續所撰者，又彙集成「民國人物列傳」，仍由傳記文學社出版。此外，尚撰有「為全球鄉村改革奮鬥六十年晏陽初傳」一部，全書分為十五章，共約八

十餘萬字，是有關晏陽初生平事業各種文字傳記中內容最爲翔實完備者。其工作之辛勤，和湖南人堅毅之性格，由上述豐碩的成績中，表露無遺。

吳教授另一項重要貢獻，就是編印珍貴史料，景印流傳。他在遍訪世界各大圖書館之餘，深切體認到圖書館給予學人的諸多便利，因在研究著述之餘，聯想到如何將自己涉獵所及提供給更多人應用，遂產生編輯各種史料的意念，「中國近代史論叢」、「中國現代史叢刊」、「中國現代史料叢書」、「民國史料叢刊」相繼刊布，而「中國史學叢書」之編印，更使擔任出版的臺灣學生書局，擺脫了以內銷爲主的小出版社形態，將眼光轉向廣大的國際市場。在史料缺乏和不能完全公開的情形下，其嘉惠學人之大，自不待言。

附錄：吳相湘教授著述目錄

一、專 書

(一)專著部份

- 咸豐辛酉政變紀要 民國三十二年 長沙
清史研究 長沙
八一三——全面抗戰 大成出版公司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 上海
晚清宮庭實紀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四十二年十月修訂版 臺北 二五八頁
紫禁城秘譚（再版時改名「清宮秘譚」） 遠東圖書公司 民國四十二年六月 臺北 一一六頁
孫中山傳（中國偉人小傳之一） 華國出版社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臺北
俄帝侵略中國史（部定大學用書）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 臺北 六七一頁
俄帝侵華史話 青年出版社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 臺北
俄寇侵華策略之剖析 華國出版社 民國四十五年 臺北 一三一頁
南京（史地叢書）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六年七月 臺北
長城（史地叢書）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六年七月 臺北
宋教仁——中國民主政治的先驅（文星叢刊五十三）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 臺北 三〇一頁 現改由傳記文學社發行 列爲傳記

- 文學叢刊八八 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出版
- 近代史事論叢第一、二冊（文星叢刊七十三）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三年八月·臺北 二三九頁，四八一頁（後改由傳記文學社發行）
- 增編第三冊（文史新刊一二八） 傳記文學社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
臺北二二四頁
- 民國政治人物（文星叢刊十三）第一冊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臺北 一七六頁 第二冊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 臺北二一四頁 現改由傳記文學社發行 列為傳記文學叢書一〇〇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出版（分上下冊）
- 晚清宮庭與人物（文星叢刊八十二，後改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列為文史新刊八十五發行）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再版 臺北
- 中國現代人物（自由太平洋叢書八） 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五十四年 臺北 一九四頁
- 近代史料舉隅（自由太平洋叢書十七） 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 臺北 二一五頁
- 中華民國國父：孫逸仙先生（文星叢刊一二七）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 臺北
- 民國百人傳（四冊） 傳記文學社 民國六十年一月 臺北 一五三〇頁
- 近代人和事（三民文庫一三三） 三民書局 民國六十年 臺北
- 民國人和事（三民文庫一四二） 三民書局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 臺北二〇一頁
- 三生有幸（增訂本，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民六十年初版） 臺北 四八二頁
- 愛國憂時文存 傳記文學社 民國六十二年 臺北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下冊） 綜合月刊社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上册）
六十三年二月（下册） 臺北 一二四五頁
- 歷史的鏡子（莘莘叢書二十八）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 臺北 二三二頁
- 歷史與人物（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 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臺北五五一頁
- 民國史縱橫談（時報書系二五〇）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 臺北 三八五頁

晏陽初傳——爲全球鄉村改革奮鬥六十年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年八月 臺北 八五九頁 民國七十四年改版

孫逸仙先生傳(二冊) 遠東圖書公司 民國七十一年初版,七十三年
三月增編版 臺北 一七八三頁

陳果夫的一生(傳記文書叢書四十九) 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國七十三年
十月 臺北

民國人物列傳(即「民國百人傳」第五冊) 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國七十
五年四月 臺北

(二)編印部份

抗戰紀實(四冊,與趙曾德等合編) 商務印書館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
月初版 上海

中國近代史論叢(與包遵彭、李定一合編,共二十冊) 正中書局 民
國四十五年十一月 臺北

中國現代史叢刊 第一冊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 臺北

第二冊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 臺北

第三冊 正中書局 民國五十年八月 臺北

第四冊 正中書局 民國五十一年三月 臺北

第五冊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 臺北

第六冊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 臺北

中國現代史料叢書(共三十八冊) 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臺北

中國史學叢書(已印行五十二種計四二〇冊) 學生書局 民國五十三年
十一月起陸續印行 臺北

民國史料叢刊(與劉紹唐合編,共二十二種三十八冊) 傳記文學出版
社 民國六十年 臺北

二、論文與書評

清世祖實錄三種不同的節本 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二十六日

「律呂纂要」跋 廣州大光報文史周刊 第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七日

曾紀澤有關朝鮮問題的主張 禹貢半月刊 民國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西洋音樂東傳記略 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讀王湘綺錄錄祺祥故事後記 南京中央日報文史周刊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十六日

- 香妃考實證補 大陸雜誌 一卷九期 民國三十九年
故宮藏拳亂史料註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三本上
冊 民國四十年
梁啟超徐志摩論蘇俄——記二十五年前故都學界一大論爭 自由中國
五卷七期 民國四十年十月一日
胡適之的「苦撐待變」主張與反共抗俄必勝信念 自由中國 五卷十一
期 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一日
清德宗實錄本紀的正本 大陸雜誌 二卷十二期
清內務府檔案中的乾隆衣飾 大陸雜誌 三卷九期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
十五日
清宮檔案中所見曹雪芹先世事蹟 暢流半月刊 四卷十一、十二及五卷
一期 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四十一年二月一日、四十一年二月
十六日
第一部中文西洋樂理書 大陸雜誌 七卷一期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五
清季園苑建築與海軍經費 學術季刊 三卷二期 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翁同龢康有為關係考實——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訂（上） 學術季
刊 四卷二期 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戊戌政變與政變之國際背景——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訂（下） 學
術季刊 四卷三期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評譚春霖著「庚子拳禍」 清華學報 新一卷一期 民國四十五年六月
評包維理著「清末中國的新軍」 清華學報 新一卷三期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史料價值 學術季刊 六卷二期 民國四十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傅蘭雅與中國近代譯學 書評書目 五十六期
評「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 新時代 一卷二期 民國五十年二月
陳獨秀與「兩個中國」 新生報 民國五十年十月九日
「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關係文件」書後 聯合報 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十
四日
我的業師：孟心史先生 傳記文學 一卷一期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
「護國軍神」蔡松坡 傳記文學 四卷五期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

- 磨血老人：胡子靖先生 傳記文學 五卷二期 民國五十三年八月
 中國報人典型張季鸞先生 傳記文學 五卷三期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
 許世英的一生 傳記文學 五卷五期 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
 從牧羊兒到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傳略 傳記文學 五卷六期 民國
 五十三年十二月
 首任駐日大使蔣作賓 傳記文學 六卷一期 民國五十四年一月
 疏財仗義的張人傑 傳記文學 六卷二期 民國五十四年二月
 陳辭修先生生平大事紀要 傳記文學 六卷四期 民國五十四年四月
 曾惠敏公手寫日記影印本跋 傳記文學 六卷五期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
 石瑛——民國以來第一清官 傳記文學 六卷五期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
 朱執信知行合一 傳記文學 六卷六期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
 吳忠信安定邊疆 傳記文學 七卷一期 民國五十四年七月
 奉行以德報怨國策的湯恩伯 傳記文學 七卷二期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
 東京灣受降的徐永昌 傳記文學 七卷三期 民國五十四年九月
 居正革新司法 傳記文學 七卷四期 民國五十四年十月
 國父生平研究的學術化 傳記文學 七卷五期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
 國父初次蒞臨臺灣時日新證 自立晚報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蔣廷黻的志業 傳記文學 七卷六期 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
 最有擔當的政治家黃郛 傳記文學 八卷一期 民國五十五年一月
 抗日殉職的武士敏 傳記文學 八卷二期 民國五十五年二月
 如來佛與唐生智 傳記文學 八卷三期 民國五十五年三月
 西山會議二健將：謝持與覃振 傳記文學 八卷四期 民國五十五年四
 月
 「日本通」王芃生 傳記文學 八卷五期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
 楊杰與國防新論 傳記文學 八卷六期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
 何成濬善作調人 傳記文學 九卷一期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
 古應芬其人其事 傳記文學 九卷二期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
 南洋大學的創立與發展 南洋大學創校十週年紀念特刊 民國五十五年
 九月十六日
 甲骨學權威董作賓 傳記文學 九卷五期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
 國父生平研究的一二心得 傳記文學 十卷四期 民國五十六年四月
 首任駐義大使劉文島 傳記文學 十一卷二期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

- 國父傳記新資料 傳記文學 十一卷五期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
- 杜南先生 傳記文學 十三卷五期 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
- 慈禧太后替罪羔羊？ 聯合報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大眾傳播與歷史 臺北 中國電視週刊 第十二期 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十一日
- 包遵彭壯志未酬 傳記文學 十六卷三期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
- 程潛晚節不堅 傳記文學 十六卷四期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
- 姚從吾師盡瘁史學 傳記文學 十六卷五期 民國五十九年五月
- 容闈最有意義的一生 傳記文學 十六卷六期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 辜鴻銘比較中西文化 傳記文學 十七卷一期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 「天演宗哲學家」嚴復 傳記文學 十七卷二期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
- 抗戰期間兩「過河卒子」——胡適之與陳光甫 傳記文學 十七卷五期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
- 蔣夢麟「西潮」考釋舉例 傳記文學 十七卷六期 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
- 還我本來面目（慈禧太后傳緒言） 傳記文學 十八卷三期 民國六十年三月
- 生於憂患（慈禧太后傳之一） 傳記文學 十八卷四期 民國六十年四月
- 奕訢與肅順（慈禧太后傳之二） 傳記文學 十八卷五期 民國六十年五月
- 城下之盟（慈禧太后傳之三） 傳記文學 十八卷六期 民國六十年六月
- 辛酉政變（慈禧太后傳之四） 傳記文學 十九卷一期 民國六十年七月
- 垂簾聽政（慈禧太后傳之五） 傳記文學 十九卷二期 民國六十年八月
- 胡子靖先生的磨血精神 傳記文學 十九卷三期 民國六十年九月
- 易君左創現代新體詩 傳記文學 二十二卷一期 民國六十二年一月
- 劉國運與臺灣空防 傳記文學 二十二卷五期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
- 黃龍紀念冊的史料價值——蕭同茲前半生的旁證 傳記文學 二十五卷一期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
- 中國對日的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 (Total Strategy Used by China and Some Major Engagem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中國對日的總體戰略 香港明報月刊 第一二七期 一九七六年七月

- 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三本書 綜合月刊 六十五年十一月號
 從史迪威的生平談知人論世 綜合月刊 六十五年十二月號
 從蘇俄課本談歷史是非爭奪戰 綜合月刊 六十六年二月號
 抗戰八年的重要會戰 香港明報月刊 第一九三期 一九七七年七月
 晚清宮廷權力鬭爭史料舉隅 傳記文學 三十二卷二期 民國六十七年
 二月
 國父言行有關的蘇俄論述 傳記文學 三十二卷三期 民國六十七年三
 月
 孟祿博士與張作霖、閻錫山的談話 傳記文學 三十四卷二期 民國六
 十八年二月
 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 傳記文學 三十六卷二期 民國六十九年二月
 張公權先生的清廉典範 傳記文學 三十六卷四期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
 國父與鄭藻如關係初探 傳記文學 三十七卷一期 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附錄：國父年譜要認真改編——由大陸近刊「孫中山年譜」說起 傳
 記文學 三十七卷一期 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沈宗瀚獻身農業（上） 傳記文學 三十八卷一期 民國七十年一月
 沈宗瀚獻身農業（下） 傳記文學 三十八卷二期 民國七十年二月
 大江會與國家主義 傳記文學 三十八卷二期 民國七十年二月
 陳公博甘願為汪精衛死 傳記文學 四十一卷六期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
 月
 章炳麟自認「瘋顛」 傳記文學 四十二卷四期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
 「五四」親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 傳記文學 四十
 二卷五期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
 吳佩孚保全晚節 傳記文學 四十二卷六期 民國七十二年六月
 楊宇霆之死是否「端納告密」 傳記文學 四十二卷六期 民國七十二
 年六月
 關於中山先生與李鴻章見面問題 傳記文學 四十三卷一期 民國七十
 二年七月
 廖仲愷是國民黨人 傳記文學 四十三卷二期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
 張發奎以「山大王」為榮 傳記文學 四十三卷四期 民國七十二年十月
 詹天佑是國人自築鐵路的先導 傳記文學 四十三卷五期 民國七十二
 年十一月

- 凌鴻勛趕築抗戰需要的鐵路 傳記文學 四十三卷六期 民國七十二
年十二月
- 王寵惠是蜚聲國際法學家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一期 民國七十三年一月
- 伍廷芳倡導新政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二期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
- 國父聯繫北洋皖奉各系的一些史料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三期 民國七
十三年三月
- 「五路財神」與「二總統」梁士詒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四期 民國七
十三年四月
- 盡瘁史學的梁和老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四期 民國七十三年四月
- 中國現代兵學開山祖蔣方震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五期 民國七十三年
五月
- 張作霖與日本關係微妙 傳記文學 四十四卷六期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 名畫家齊白石是木匠出身 傳記文學 四十五卷一期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
- 伍連德是中國近代醫學的先驅 傳記文學 四十五卷二期 民國七十
三年八月
- 梁敬錚治史如斷獄(上) 傳記文學 四十五卷三期 民國七十三年九月
- 梁敬錚治史如斷獄(下) 傳記文學 四十五卷四期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
- 開國詩人吳芳吉 傳記文學 四十五卷六期 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
- 孔祥熙任勞任怨(上) 傳記文學 四十六卷一期 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 孔祥熙任勞任怨(下) 傳記文學 四十六卷二期 民國七十四年二月
- 錢玄同與國語運動 傳記文學 四十六卷五期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
- 陳受頤精研中西文化交流史實 傳記文學 四十六卷六期 民國七十四
年六月
- 陳介是社會賢達參與外交 傳記文學 四十七卷二期 民國七十四年八
月
- 熊希齡創辦慈幼事業 傳記文學 四十七卷三期 民國七十四年九月
-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問題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民國七
十四年十二月
- 八十年前國人對西醫的觀感 傳記文學 四十七卷六期 民國七十四年
十二月
- 北伐誓師六十週年 傳記文學 四十八卷一期 民國七十五年一月
- 顏惠慶力倡主動外交 傳記文學 四十八卷三期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

Ursula Richter

I. Introduction

See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sinology in West Europ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area. Today, the field comprises various interrelated as well as independent activitie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universities. The short time available to prepare these pages did therefore not suffice to draugh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 apologize for any omissions and hope for colleagues in the field to contribute missing data. Since some recent material is still under preparation, or on its way from Europe to Taiwan, I divide this essay, giving in this first part a brief historical glance at European sinology, followed by a chapter on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Subsequently, the situation of single countries or groups (Scandinavia, Benelux) shall be examined.

Given the truly cosmopolitan nature of western Chinese studies, such a sub-division must seem inappropriate. Today, China specialists are fac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range of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y arrangement, therefore, rests simply and solely upon considerations of perspicuity.

For colleagues resident in Taiwan who wish to contact any of the institutions or scholars mentioned here, an address index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scholars from all over West Europe have kindly and generously responded to my inquiries, and I wish to extend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f them.

2. European sin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lthough ancient Greeks travelled into what is now Sinkiang as early as the 5th century B.C.¹, while *Sera* ("silk-country") was known to ancient Romans through their trade with the Arabs, first-hand knowledge of China (Khitai, Cathay) did not reach Europe before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when travellers like Marco Polo and Franciscan friars such as G. da Monte Corvino (1247-1328), Willem Rubruk, Odoric of Porderone (who returned from Peking in 1330), and Giovannini Marignolli (fl. 1338-57) gave preliminary and as yet anything but precise accounts. Portuguese and Spanish explorers who landed at Canton in the 16th century provided more reliable data, prompted, however, by mundane concerns.

It is the Jesuit fathers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who must be credited with the beginnings of an academic approach towards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based o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system which gave them access to indigenous sources. Matteo Ricci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true European sinologue.²

While European scholar-missionaries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science (mathematics, astronomy, calendar science et al.), the reports they sent to Europe and the books they published became "best-sellers". Works that were widely circulated included a "History ... of the Great Realm of China" written in Spanish by the Austin

1. cf. H.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I (1970), p. 10.

2. cf. H.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iesbaden 1958), p. 5.

friar J. Gonzales de Mendoza³; Ricci's journals, edited and published in Latin by his coworker, the Belgian Jesuit N. Trigault⁴; a description of the adventurous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in China" by the Portuguese Jesuit A. Semedo⁵; the "New Atlas of China" by Italian Jesuit M. Martini⁶; "China Illustrata", relating the travels of the Jesuits H. Grueber (Austria) and A. D'Orville (Belgium), by their German confrater A. Kircher⁷. They were avidly read, although they satisfied the craving after exotic novelties then in fashion – and still shared much later by Goethe – rather than a more academic appetite. In fact, illustrated works such as Kircher's and the two monumental books on the Dutch embassies to Peking in 1656, 1662, and 1666 by the diplomats J. Nieuhof⁸ and O. Dapper⁹ with their copious engravings showing scenes of daily life in China induced the wave of "chinoiserie" that dominated European fashion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 new chapter of scholarly interest in China was opened by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hsüeh*, *Chung-yung* and *Lun-yü* by the Belgian cleric P. Couplet¹⁰ – with the help of a Chinese

3. 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O.E.S.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History of the most noteworthy events, rites and costumes of the great Realm of China) (Rome 1585), in the 16th century transl. into Italian, French, English, German, Dutch.
4. Nichola Trigault, S.J., *De propagatione Christiana apud Sinas*, (On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Chinese) (Augsburg 1615), transl. into French, German, Spanish, Italian.
5. Alvaro Semedo, S.J., *Relacao da Propagacao da Fe no Reyno da China...*, (Lisbon 1642).
6. Martinus Martini, S.J.,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62).
7. Athanasius Kircher, S.J.,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
8. Jan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Keizer van China...* (Amsterdam 1670), transl. into French, Latin, German, English by John Ogilby a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669).
9. Olfert Dapper, *Gedenkwe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Noteworthy events of the Netherlandish-East-Indian Embassy... in the Taising Empire of China) (Amsterdam 1670).
10. Philippe Couplet, S.J.,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e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or the Chinese Learning rendered into Latin) (Paris 1687).

scholar who came to Europe with Couplet in 1681 and later assisted the British orientalist Thomas Hyde at Oxford. In the Confucian ideas, European rationalist philosophers of the Enlightenment saw corroborated "their own belief in rational revelation and autonomous ethics and their ideal of a 'philosophers'-state', of rule by sages."¹¹ This idealized percep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the German philosopher and mathematician G.W. Leibniz who, through excessive correspondence with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other sources, became acquainted with Confucianism (which he understood as "Chinese natural theology"), hoped to establish Chinese as a universal language, held that Chinese wisdom was complementary to European learning, drafted the plan for an Academy of Sciences based in Peking, which by way of universal scholarly exchange would enhance world-wide harmony, and derived his concept of binary arithmetics (that in our own century led to computer science) from his studies of the *I-ching*. Many of his ideas were laid down in his "Novissima Sinica".¹² Also, the publication of a long series of "Edifying and curious letters by Jesuit missionaries abroad"¹³ was partly prompted by Leibniz and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philosophers and orientalists of the period. It did not only expound neo-confucian ideas such as the Jesuits were taught by their Chinese friends, but gave insight into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and may be seen, with a grain of salt, as a forerunner of the publications of modern "China watchers". More academically sound were the "Treatises on the History, Sciences, Arts, Manners, Customs & cetera of the Chinese" by the Peking Jesuits¹⁴. The "Description

11. cf. H. Franke, *op.cit.*, p. 6.

12.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 (News from China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Hannover 1697). For Leibniz' percep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cf. David E. Mungello,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Honolulu 1977).

13.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27 vols. (Paris 1717-1749).

14.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 cetera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6 vols. (Paris 1776-1814).

of China" by French Jesuit J. B. du Halde¹⁵ was a "must" in every cultivated library. These and numerous other similar works led to a broadened knowledge of China which incited a debate to last throughout the 18th century on whether Chinese philosophy,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griculture and manners could and should serve as a model for Europe. Enlightened princes like Frederic the Great of Prussia, thinkers like Voltaire and Montesquieu, Christian Wolff, Herder and Hegel and, on the side of the opposition, Rousseau and G. Ch. Lichtenberg took part in these discussions. The idealized perception of the harmonized (if stagnant) Chinese society ruled by a sage emperor who occasionally took to the plough, a society stabilized by application of enlightened neo-confucian principles, was in fact an unqualified reflection of the self-assessment of those Chinese scholar-gentlemen who had discoursed with the European missionaries. The image was to prevail well into the 19th century, informing Karl Marx and F. Engels, and even left its traces in certain 20th century notions (e.g. Max Weber). Quite frequently, however, writers of the 18th century used the image less out of academic concern with China herself but rather as a tool for their polemics against social and political grievances at home in Europe.

After 1800, the influence of catholics in China waned in favour of protestants. Along with more worldly-minded representatives of grow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lonial interests such as merchants or civil servants, some of these missionaries subsumed their Chinese

15. Jean Baptiste du Halde, S.J.,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nrichi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enriched by general maps and adorned with a great number of tables and vignettes...), 4 vols. (Paris 1735 ff.). Since 1707 du Halde had also served as one of the editors of the *Lettres édifiantes* (cf. note 13). For notes 3-10 and 12-15, cf. *China und Europa. Chinaverständnis und Chinamod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China and Europe.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Chinese fashio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Berlin 1973).

experience in works of great value for budding European sinology as it still struggled to become a fully accepted academic discipline. Text- and grammar books, dictionaries and other reference material were all too scarce, while the few collections of Chinese books in European libraries more often than not reflected the taste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R. Morrison (1782-1834), the British "father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was among the first to compile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 and a 3-volumes Dictionary (1815-23); another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1892, and biographical reference material¹⁶ were prepared by Cambridge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British consul in China, H. A. Giles (1845-1935);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893-95, reprinted 1960) by the Scot and British missionary J. Legge (1815-1904) — assisted by Wang T'ao (1828-1897)¹⁷—are still classroom reading for sinology students today. A Classical Chinese-French dictionary (1898) and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were compiled by Seraphin Couvreur. Arthur Waley (1889-1966) translated Chinese poetry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which influenced poets like Yeats and Ezra Pound.

Yet, in Europe, the subject of sinology was slow in being fully accepte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chair was established in Paris at the *Collège Royal (Collège de France)* in 1814, followed in 1843 by a chair of vernacular Chinese at the *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Russia set up a chair in 1837. In most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log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as preceded by institutions for practical training of missionaries, merchants and civil servants. In many places, Chinese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classical orientalistics. A number of eminent sinologues never found employment at any university. Also, sinology focused around palaeography, ancient history, classical philology etc.,

16. 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eiden 1898).

17. cf.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4), where various other British missionary-sinologues are mentioned.

and research was often carried out like other classical disciplines without regard for, or interest in, the living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Works on folk religion and ethnology like those by J.J.M. de Groot (1854-1921), a Dutch scholar who had lived in Asia, were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French sinologues were pre-eminent. To name only a few: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Paul Pelliot (1878-1945), Henri Maspero (1883-1945), Marcel Granet (1884-1940). While still engaging mostly in ancient Chinese matters, they introduced categories of modern sociology, ethn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into the field. The Swedish linguist B. Karlgren (1889-1978) and the German W. Simon (b. 1893) contributed remarkabl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 Franke (1863-1946), holder of the first German chair (established at Hamburg university in 1909), compiled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ased on crit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professionalism had b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nch-Dutch journal *T'oung Pao* in 1890. New centres of academic sinology emerged in Britain, Germany and Holland, while direct contact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bear fruit.

In the 1930s, the USA began to develop the field 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owing to military interest, brough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studies to the fore.

After the war, Chinese studies and particularl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SA were far ahead of those in Europe where many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had been destroyed in the war. The necessity to found new centres and restore or enlarge existing ones, however, led European sinologues to "modernize" their field and break free from the traditional ivory tower.

The "identity crisis" European universities underwent during the 1960s, culminating in the tumultuous student unrests of 1968 and

expanding into a leftist "movement", brought along "a keen interest in various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 interest which was often backed more by political faith and enthusiasm than by scholarly competence and respect for an objective approach to scholarship."¹⁸ Once aga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at home prompted a biased perception of an idealized China. This was all the more flagrant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virtually broken off any access to primary sources or immediate observ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 flood of literature on Communist China as a "concrete utopia" where permanent revolution was about to create the "new man" testifies a naive faith in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prevalent in those years. However, it was partly due to this movement that European sinology was ultimately drawn out of its esoteric outsider-existence and saw a general shift from classical research to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ttracting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other non-sinologues into its ranks, thus gaining in scope and actuality, while certainly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scholars continued, and continue, to engage in classical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e subject has s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student enrollment. Contacts with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being re-established, and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studying there or in Taiwan are likewise rising. Although research facil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re still in a deplorably disordered state, and research is constantly hampered by an inflexible administration, frequent visits and scholarly exchange may, over the years to come, help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which must be hoped in the interest of academic research. Like other disciplines, Chinese Studies are subject to increasing specialisation. Significantly, many institutes are changing their names from "sinology" to classifications such as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iterature" etc. At the same time, "sections" concerning

18. N.G.D. Malmquist, "Preface" i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Stockholm 1982), p. 3.

China are included in departments of Law,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Geology, Medicine, Linguistics etc.¹⁹

3.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The devastations of the war called for a new beginning after 1945. Long-term projects for handbooks, bibliographies and other reference material of similar scope require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Iron Curtain threatened to sever contacts with East European sinologues.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western research centres such as the America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ranco-chinois d'études sinologiques* (French-Chinese centre for sinological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had to close down. Contacts between European and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grew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lthough it was not yet to be anticipated that they would come to an end altogether in 1966.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and tasks, a group of young sinologues from all over Europe gathered at an informal meeting at Cambridge in 1948.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shake off the overwhelming dominance of the senior scholars in the field and find new ways for open-minded exchange. Thus, the "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 was born. Subsequently, it held annual meetings at various European centres of Chinese research. "Apart from engaging in discussions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the young scholars gratefully availed themselves of the opportunity to rub shoulders with such renowned scholars as Etienne Balasz, Paul Demiéville, Jaroslav Prušek, Walter Simon and Arthur Waley."²⁰ The year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saw an increase of amateur attendance at these conferences, "a trend which was viewed with alarm by many members dedicated to serious re-

19.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used in this paragraph, cf. H. Franke, *op. cit.*, and the same, "Sinologie in westlichen Staaten" (Sinology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W. Franke (ed.), under assistance by B. Staiger, *China Handbuch* (China Handbook) (Düsseldorf 1974), pp. 1230-1235.

20. N.G.D. Malmquist, *op. cit.*, p. 3.

search".²¹ The last meeting was held in Noordwijk (Holland) in 1972.

When in 1973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was re-organised, excluding sinology, this led to the wish for a new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and, after a preparatory meeting of former Junior Sinologues in Paris,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 in 1975 by scholars from 12 European countries. Conferences were scheduled bi-annually, the first one meeting at Paris in 1976.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ACS was adopted and a Board of 24 members elected. The Danish sinologue Søren Egerod was elected president.

Out of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proposed at the 1975 conference, three were initiated in 1978 and 1979,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Strasbourg):

1. An Analytical and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Tao-tsang*;
2.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3. The State in China: Concepts and Realities.

Until now, EACS conferences were held in Ortisei, Italy (1978), Zürich, Switzerland (1980), Cambridge, UK (1982) and Tübingen, W. Germany (1984). This year's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for 31 August - 6 September at Turin; correspondence may be addressed to Professor L. Lanciotti, Via Giacomo Boni 1, 10162 Roma, Italy.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EACS is Dr. Michael Loewe of Cambridge.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Association is located at 22, avenue du Président Wilson, 75116 Paris, France; correspondence is to be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EACS, W.L. Idema, Sinologisch Instituut, P.O. Box 9515,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At the Zürich conference the EACS decided to officially sponsor the journal *T'oung Pao* mentioned earlier.

The last two conferences were attended by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other non-European guests.

The three projects are now well on their way. While the *Tao-*

21. *ibid.*

tsang project has been carried into its third and final stage, the *Handbook o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 - 1949* (3 volumes) is going to be published in the near future. Since the third project may, at least in part, be of greater interest here than the other two, I proceed by quoting excerpts from Stuart R. Schram's introduction.

"The project on the state grew out of discussions on this theme which took place at the EACS conference in Paris in September 1976 among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interested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a preliminary meeting took place in Paris in April 1978... The Steering Committee... was composed of Marianne Bastid-Bruguère, Karl Bünger, Piero Corradini, Jacques Gernet, Stuart Schram, and... in early 1979,... Brian Hook. From April 1978 until 31 March 1980, the Chairman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was Professor Piero Corradini, and the project secretariat was located... in Rome. From 1 April 1980, (he) was succeeded as Chairman by Stuart Schram, and the secretariat was moved to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in China has, from early times, encompassed and penetrated so many domains of the life of society that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is project narrowly would have excluded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ose who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On the other hand,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which the Steering Committee has set itself is to promote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ian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d social scientists concerned with current problems. And while it is possible to have fruitful exchanges of views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se two groups,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devise an integrated programme in which they could all participate."

"In his concluding remarks to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is project, ...Professor J. Gernet of the Collège de France expressed his conviction that on this occasion "modernists" and "classicists"

had spontaneously found a common ground for discussion, and had derived great mutual benefit from these contacts... Of the 15 papers presented..., eight were selected for publication... The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Preface	Stuart R. Schram
Introduction	Karl Büniger
Chapter 1 An Enquiry into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Law	Léon Vandermeersch
Chapter 2 Notes on the <i>Shang-shu</i> Departments in Chines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Piero Corradini
Chapter 3 The sponsorship of Virtue: Rewards for Fidelity and Fili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Mark Elvin
Chapter 4 Despots, Eunuchs, Secretaries and Guard Officers in Mid-Ming China—State and Power in Juxtaposition	Tilemann Grimm
Chapter 5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Chapter 6 Decentralization in a Unitary State: Theory and Practice, 1941–1981	Stuart R. Schram
Chapter 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Party Nor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rro von Senger
Chapter 8 The System of "Class Status"	Jean-Francois Billeter
Concluding Remarks	Jacques Gernet

"The second conference, dealing with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took place (in) 1981 in Schloss Reisenburg near Ulm (W. Germany)... This time, there was also a Chinese representative, Prof. Zhang Zhong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presented a most instructive paper regarding research currently in progress in (Mainland) China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at various periods."

"In the case of this conference, it has been decided to include in

a published volume only articles dealing with the period prior to 1949, in order to insure a greater degree of cohesion... The first chapter in the book will be Prof. Anthony Hulsewé's study entitled "The Influence of the 'Legalist' Government of Qin on the Economy as Reflected in the Texts Discovered in the Yunmeng Prefecture". Other articles will deal with various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from the Han to the Qing. Professor Jacques Gernet has agreed to contribute an introductory essay placing these monographic studies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²²

A third conference of this project was held in 1983, taking as its central theme the problem of the foundation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The following extracts from the guidelines drafted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convey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s:

"The topic we have chosen for the third conference is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By 'foundations', we mean to evoke in particular the religious and ritual dimensions of the phenomenon, which clearly set off the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in traditional China from that in the modern West. The European approach tends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legitimacy defined in juridical terms...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cosmology, religion and ritual are closely intermingled with the political sphere. The Chinese in imperial times viewed the state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the role of the Son of Heaven in ordering the world, i. e., in placing his mark on space, time,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realm, by means of ritual acts."

"These differences... lead us to pose two basic questions. First of all, when and how did the transition take place from such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to the ideas prevailing today, and are there not in fact significant survivals of the old Chinese perspective ev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secondly, what precisely constituted

22. Stuart Schram, "Introducing the Project 'The State in China: Concepts and Realities'" i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Stockholm 1982), pp. 16-18.

the state in imperial times? Was it the administrative machine, or the social stratum of the *literati*? Was it incarnated above all in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and in the imperial house? Or was it to be found at an even more abstract level, in religious realities linked to the earth and to the harvests?"

"As to the limits of state power, we have in mind problems such a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in China itself fixed in the past (or fixes today) the limits to the scope of its own activity, including studies of the mechanisms for the control of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are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tate in China.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consid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imposed itself, as it did in modern Europe, as one power among others in society. Or was it the case in China that every form of power, from the family unit to the Son of Heaven, was part of a single continuous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authority, in which the state was the ultimate source and guarantor of all powers and all values?"²³

The papers of the first group have been published by now: Stuart S. Schram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as have those of the third conference: Stuart S. Schram (ed.), *The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ibid.*. Apart from the group publication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still under preparation, a fourth volume is planned, containing translation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 (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 by Dr Helen Dunstan of Cambridge.

(to be continued)

23. *ibid.*, pp. 19-20.

近年來大陸對臺灣史的研究

——介紹與評估

許雪姬

一、前 言

在歷史上由於閩臺合治過二百多年（一六八四～一八八四）；在地緣上福建臺灣一水之隔；在史料上福建藏有不少臺灣史料，因此大陸在一九八〇年以廈門大學研究臺灣問題而有較長的歷史和較好的條件為由，在該校成立臺灣研究室^①。該室成立後，大陸有關臺灣史的研究乃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②。本文旨在對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藏大陸出版的期刊雜誌中有關臺灣史的研究論文，做一初步的介紹和評估。

由四十一種雜誌中共找出一百三十八篇論文，其中在福建發行的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建論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三種刊物合起來共有二十六篇，幾乎占了五分之一，不但所占的分量重，研究的水平也較高，可見大陸研究臺灣史的重鎮在福建省。若就研究的性質來看，撰寫人物的論文五十二篇為最多；若就研究的時代來看，以研究清代臺灣史的六十七篇為最多，這和臺灣史學界的博碩士論文亦偏重清代的研究相類似^③。

二、研究主題

在這一百三十八篇論文中，除翦伯贊的「論南明第三個政府的鬪爭」^④、

-
- ① 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八〇・三。臺灣研究室下設臺灣經濟、臺灣政治社會、臺灣歷史民族、臺灣語言文學、臺灣高等教育，五個研究室。
- ② 一九八〇年以前即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海峽兩岸關係最緊張時，曾經出版過政治性較濃的刊物，到一九八〇年則發行較具水準的臺灣史略（施聯朱著）、臺灣地方史（陳碧笙著）。
- ③ 李筱峯，「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歷史研究所中有關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分析」，臺灣風物，三十四卷二期，頁九一。
- ④ 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一・三，頁一一一～二〇。

丘逢甲的「創設嶺東同文學堂緣起」^⑤係舊作外，皆係新作（一九七八～一九八五），所探討的主題為：

(一)臺灣早期的歷史——臺灣有文字紀錄究竟始於何時？大陸學者有提出禹貢的島夷、山海經中的雕題、後漢書中的東鯤都是指臺灣的看法^⑥。持相反態度的陳家麟則認為三者皆不是臺灣^⑦。採折衷看法的則認為島夷、雕題非臺灣，但東鯤則是^⑧。

(二)臺灣山胞與漢族接觸的情況——根據陳碧笙的研究，平埔山胞從未合併成一大部族，反而在漢人進入臺灣後，分別和漢人融合，兩族透過各種管道經長時期的接觸後，和平共存，根本不存在有山胞被趕上山去，或被消滅的事實^⑨。清治臺後，兩者關係更為密切，林爽文事件發生時，曾得山胞臂助^⑩；孔立則反對此議，他舉例證明，清代理番政策為使番向化，再以番攻「賊」，以番招番^⑪。

(三)海禁與倭寇——目前有三種看法，一為禦倭之戰乃海禁與反海禁的鬭爭^⑫；一為禦倭之戰乃抵抗外侮的戰爭^⑬；一為嘉靖三十一年以前的禦倭戰是國內戰，三十一年以後則是與國外局部性的戰爭^⑭。

(四)明鄭政權——探討明鄭政權的篇章極多，因大陸曾在一九六二年、一九八二年，鄭成功「復」臺三百及三百二十週年時在廈門召開有關明鄭的學術討論會，主要探討的主題有四：

1. 鄭成功復臺的動機及意義——復臺的動機係為取得根據地以抗清，也

⑤ 學術月刊，一九八四·三，頁八九～九一。

⑥ 周維衍，「臺灣歷史地理中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一九七八·十，頁七〇～八〇。

⑦ 陳家麟，「也說臺灣歷史地理中的幾個問題」，復旦學報，一九八五·二，頁四四～七。

⑧ 葉國慶、辛城，「住居我國大陸和臺灣的古閩越族」，廈門大學學報，一九八〇·四，頁一四八～五七。

⑨ 陳碧笙，「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平埔族社會經濟及其與漢族的關係初探」，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一·三，頁一六六～七一。

⑩ 劉如仲，「試論林爽文順天政權的性質及意義」，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一九八一·三，頁五一。

⑪ 孔立，「臺灣番族與林爽文起義——兼論清政府對番族的政策」，福建論壇，一九八五·二，頁六十～五。

⑫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一九八〇·四，頁九四～一〇八；陳抗生，「嘉靖倭患探實」，江漢論壇，一九八〇·三。

⑬ 陳學文，「明代的海禁與倭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八三·一，頁三〇～八；「論嘉靖時的倭寇問題」，文史哲（山東大學），一九八三·五，頁七八～八三。

⑭ 王守稼，「試論明代嘉靖時期的倭患」，北京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一·一；田培棟，「明代後期海外貿易研究——兼論倭寇的性質」，北京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五·三，頁四七～五六。

爲了擁護海商集團的利益，並驅逐侵略中國領土的荷蘭人。復臺除了爲漢人拓展了新的空間外，也有限度地阻止西方殖民者的東進，且以臺灣爲基地武裝抗清並發展世界貿易。

2. 鄭成功的抗清——鄭氏的反清，雖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但亦代表海商集團的利益，故抗清既不堅決也不澈底，尤其在清朝統一全國之後，繼續抗清，違背了歷史的潮流。

3. 鄭氏集團的經濟活動——鄭成功的經濟思想可歸結爲農本論、通洋裕國論、工商皆本論，故打破了中國傳統重農輕商的思想。鄭氏的海外貿易因清廷實施遷界令而更爲繁榮，鄭氏以貿易所得來支持抗清的行動。至於鄭氏時代的賦稅，據陳動的研究，應當比荷據、清代及同時期的大陸輕^⑮，如此才能吸引人民紛紛入臺。

4. 關於施琅的評價——由於施琅攻取臺灣，實現了清廷統一臺灣的願望因此大陸學者忽視鄭、施間的恩怨，竟認爲施琅是鄭成功事業不自覺的合作者和繼承者。也有認爲不當過分誇張施琅的功績，因爲施琅的事蹟無法與鄭成功的事業相比；同時要考慮到施琅進剿臺灣是爲了公報私仇，効君恩，顯個人才能的行爲，不能因他平定臺灣就予以美化^⑯。

(五) 天地會創始的問題——天地會創始的年代有明季論、清初論、康熙甲寅（十三年）、雍正甲寅（十二年）、乾隆辛巳（二十六年）、乾隆丁亥（三十二年）論；創始者有言鄭成功，有言洪二和尚。大陸學者主要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天地會和哥老會同出一源，由鄭成功命陳近南創於四川^⑰；一派主張乾隆二十六年由洪二和尚萬提喜創於福建^⑱。

(六) 科技史——有關文章雖僅三篇，但仍值一提。一篇分析臺灣的地震帶，尋求其規律和高潮時期，並以板塊說來解釋臺灣地震的原因^⑲。第二篇闡述我國自古對臺灣的海洋環境、陸地水文氣候，地形與地質等情況已有所了解，因此駁斥 Joseph Needham、James Fairguireve 錯誤的記載

⑮ 孔立、陳在正、鄧孔昭，「鄭成功評價的方法論問題」，廈門大學學報，一九八三·一，頁四九～五六。

⑯ 陳動，「鄭氏時期臺灣農民的田賦負擔」，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八二·三，頁四七～五九。

⑰ 胡珠生，「天地會起源初探——兼評蔡少卿同志『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問題』」，歷史學，一九七九·四，頁六二～七六；赫治清，「天地會起源『乾隆』質疑」，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三·三，頁一四九～五八。

⑱ 秦寶琦，「從檔案史料看天地會的起源」，歷史檔案，一九八二·二，頁九三～八。

⑲ 金計初，「臺灣歷史地震簡述」，復旦學報，一九八一·四，頁五〇～八、三一。

⑳。第三篇提到迄今沒有人研究過的臺灣地區以油煉硫的技術，經由郁永河裨海紀遊所記，做了「臺灣土法煉硫的模擬測驗」，亦即以菜油來煉硫磺，硫的回收率在八成㉑。

(七)福建與臺灣的關係——主要經由族譜中所載閩省人口流向臺灣的資料㉒，對閩省人口東流的背景，來臺的時段，入臺的途徑及定居在臺的地理分布，影響等加以探討㉓。

(八)臺灣的大小租——大陸學者經由研究清代農民的永佃權㉔，進而搜集閩北地區的土地文書㉕；研究福建的永佃權㉖。累積了研究成果後，再探討臺灣大小租的產生和社會條件㉗，並比較大陸和臺灣的大小租契約關係㉘。據大陸學者楊國楨的研究，大陸東南各省和臺灣的土地關係都同樣經歷了永佃權→一田兩主→一田三主的過程，不論在大小租關係的形成，或大小租戶與現耕佃的關係均相彷彿，臺灣比較特殊的一點乃在典賣小租權的發展比內地各省更為普遍。

(九)人物——有關人物的研究，占所有論文的四成，集中在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三個人。研究鄭成功乃因要評估明鄭政權；劉銘傳則因中共視李鴻章為淮系軍閥之首，處理外交事件完全採取妥協投降主義，故對追隨李鴻章的劉銘傳，認為不值得研究，且連劉銘傳三個字都不敢提㉙。在大陸情況有了改變後，史學家才又重拾對劉銘傳的研究。至於研究丘逢甲乃因重新肯定了臺灣民主國的價值㉚，故對主導臺灣民主國的丘逢甲也就格外重視。研究重點有四：詩詞，在抗日戰爭的地位，晚年的政治立場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晚期對教育的貢獻。

㉑ 陳端平，「我國古代對臺灣自然環境的認識」，中國科技史料，一九八二·一，頁七〇～八〇。

㉒ 趙匡華、郭正誼，「臺灣土法煉硫考釋」，中國科技史料，一九八四·三，頁五八～六二。

㉓ 莊為璣、王連茂，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一九八四·八）。

㉔ 林仁川、王蒲華，「福建人口向臺灣的流動」，歷史研究，一九八三·二，頁一三〇～四一。

㉕ 吳量愷，「清代的農民永佃權及其影響」，一九八四·六，頁五九～六四。

㉖ 楊國楨，「清代閩北土地文書選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八二·一、二，頁一一一～二一、一〇二～四。

㉗ 林祥瑞，「福建永佃權成因的初步考察」，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二·四，頁六二～七四。

㉘ 鄧孔昭，「清代臺灣大小租的產生及其社會條件」，廈門大學學報，一九八五·一，頁九六～一〇二。

㉙ 楊國楨，「臺灣與大陸大小租契約關係的比較研究」，歷史研究，一九八三·四，頁一二一～三五。

㉚ 李俊山，「劉銘傳在臺灣的抗法鬥爭」，遼寧大學學報，一九八二·二，頁三三〇。

㉛ 戚其章，「關於臺灣民主國的評價問題」，北方論叢，一九八四·四，頁七九～八五。

(一)日據時期——共有四篇，其中有三篇係探討大陸與臺灣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研究日本殖民地臺灣與日本的關係。陳碧笙指出臺灣二十年代的文化啟蒙運動，乃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如反抗的對象，運動的過程，領導分子及結果都十分相像^①。湯志鈞則指出章太炎在清末因同情康梁，避居臺灣，主筆臺灣日日新報，為文抨擊慈禧，清廷向日方抗議，於一八九九年六月離開臺灣^②。陳民研究臺灣同胞在八年抗戰中與祖國同胞併肩抗日的經過^③。另一篇探討霧社事件的前因後果。^④

(二)光復後——研究光復後臺灣政治情況者只有一篇^⑤，其餘則針對臺灣作家展開研究，其熱衷於此乃因自一九八一年起，大陸的復旦、中山、暨南、蘭州、四川、北京、遼寧等二十多所大學陸續開「臺灣文學」的選修課程；且於一九八二、八四兩年先後在暨南、廈門大學召開過兩次全面性的臺、港文學學術會議有以致之^⑥。

三、評 估

評估大陸學者臺灣史研究的水平，也許可從以下三個角度著手：

(一)與臺灣學者的直接商榷——也許大陸的學者看到臺灣方面有關臺灣史著作的機會較多，故常針對某一論點，向臺灣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鄭成功固守東南未能與李定國會師西南，埋下南京敗因之問題^⑦；明鄭和談究竟誰占上峯^⑧；天地會絕非創於乾隆三十二年^⑨；林謙光的號及「臺灣紀略」是否有單行本^⑩；臺灣農民何時得到永佃權^⑪；明鄭時是否已出現大租^⑫；

① 陳碧笙，「五四與二十年代臺灣文化啟蒙運動」，歷史教學，一九八〇·五，頁三二、三五。

② 湯志鈞，「章太炎在臺灣」，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二·四，頁一四二～五一。

③ 林其泉，「臺灣同胞與祖國的八年抗戰」，學術研究，一九八五·四，頁一三～七〇。

④ 陳民，「一九三〇年的臺灣高山族霧社起義」，歷史教學，一九八二·十一，頁十八～二〇。

⑤ 蔣順興，「臺灣二二八起義」，江海學刊，一九八四·二，頁八一～六。

⑥ 陸士清，「近年來的臺灣文學研究」，復旦學報，一九八四·三，頁一〇～三。

⑦ 陳在正，「評清政府與鄭成功之間和戰的得失——與臺灣歷史學者商榷」，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三·四，頁一二五～三五。

⑧ 同上註。

⑨ 李秉乾，「臺灣早期書志雜考」，廈門大學學報，一九八五·一，頁一一四～七、一五四。

⑩ 赫治清，前引文。

⑪ 楊國楨，「臺灣與大陸大小租契約關係的比較研究」。

⑫ 鄧孔昭，前引文。

「阿美」應當稱「阿眉斯」較正確^④。大陸學者的研究，固然有部分能修正錯誤，但也可以看出大陸方面所能參閱臺灣方面的著作，絕大部分不是最好、最新的文章，故其評論令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二)研究的闕失——

1. 政治性強烈——大陸方面對臺灣史的研究，常因充滿政治意識，而忽略了史實，舉一例言之：邵秦在「臺灣名稱由來考」稱：「某些人以臺灣名稱之由來，採用荷蘭人來後才如此稱謂的說法，妄圖割斷臺灣與大陸近兩千年來的歷史聯繫，從而為帝國主義分離臺灣製造藉口。^④」以臺灣的名稱來自荷蘭據臺後，只是眾多說法之一，實不必措詞如此強烈。

2. 對基本史實的錯誤認識——此類錯誤不少，如福建巡撫丁日昌欲在臺灣築鐵路，曾向板橋林家勸捐，林氏昆仲認捐五十萬元，於光緒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全部交清。陳梅龍卻稱，「林氏兄弟富於田產，並非雄於資財，只認捐了五十萬元，實際上連這一點也未交足。^⑤」

3. 沒有充分利用臺灣已有的研究成果——如陳柯云在談到清初海禁時，引用黃叔瓚的臺灣使槎錄，卻說「作者黃叔瓚，生卒年不詳。^⑥」周維樑引陳第東番記時，不引自閩海贈言、閩書而引杜臻的澎湖臺灣紀略^⑦；夏寧也談及未曾見方氏慎思堂本的「閩海贈言」^⑧……不勝枚舉，事實上臺灣學界都已在這方面做過研究。

(三)幾個值得商榷的基本觀念——首先要提出來的是明鄭以前臺澎是否可以併稱的問題。大陸學者往往認為宋元在澎湖設官治理就表示臺灣已入中國版圖，實則不然。在明鄭以前臺灣是臺灣，澎湖是澎湖一定要分開來。其次早期漢番關係不和諧，一直到清末仍然如此，因此才需開山「撫」（剿）番，大陸學者既忽略了郭懷一事件時二千山胞助荷蘭人的史實，也漠視了清廷定律不准漢番通婚的事實，一味美化漢番關係，實昧於史實。

^④ 曾思奇，「阿眉斯名稱沿革及譯法淺說」，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四·一，頁六四～七。

^⑤ 邵秦，「臺灣名稱由來考略」，歷史研究，一九八二·二，頁一〇五～一一。

^⑥ 陳梅龍，「我國最早鐵路之一——臺灣鐵路」，河南師大學報，一九八四·一，頁六七～七。

^⑦ 陳柯云，「論清初海禁與資本主義萌芽」，北京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三·二，頁五八～六五。

^⑧ 周維樑，前引文。

^⑨ 夏寧，「陳第與東番記」，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三·三，頁四五～七。

四、主要貢獻

(一)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如陸續出版有關林爽文的檔案^④，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⑤、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⑥、清代臺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⑦、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⑧；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等。此外劉銘傳宗譜的發現糾正了許多史料，如劉銘傳的生卒年月、墓葬；辦團練的時間為一八五九年；為父受辱而殺土豪應改為係為伯父劉殷受辱而殺人^⑨；鄭成功宗譜的發現其貢獻也不小於劉氏宗譜，鄭氏宗譜可以糾「石井本鄭氏宗譜」之誤，並補其欠缺的鄭家先祖一至六世；也知芝龍父不名紹祖，而名士表字象廷；芝龍兄弟五人，芝豹是異母所出^⑩。清代臺灣第一部府志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在上海圖書館，可惜臺灣沒有此書，根據大陸學者的報導和研究，我們已很清楚本書的內容，及與高志優劣的比較^⑪。曾任道光朝鹿港、淡水同知的曹士桂，在其故鄉雲南蒙自發現手寫的「渡海日記」，及其墓葬，該書主要談及水沙連設治的經緯^⑫。

(二)史實的考訂，如陳在正考訂了十二則鄭成功有關事蹟的日期^⑬，可以補目前鄭成功大事年表的不足；又如考訂江日昇的籍貫為福建惠安籍，因科考而入同安籍，本姓林；其父名林兆麟，江美鰲或為化名；臺灣外記雖成書於康熙四十三年，但至少在康熙四十六、五十四、甚至江日昇去世後都還有

④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天地會(一)~(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⑤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一九八二年三月）。

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一九八三）。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一九八三·十一。

⑧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一九八二·十。

⑨ 姚永森，「劉銘傳身世及家世諸問題考辨」，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四·三，頁一七四~七；
____，「新發現的劉氏宗譜中有關劉銘傳的史料」，歷史檔案，一九八五·三，頁一〇一~四。

⑩ 張宗洽，「鄭成功家世考」，福建論壇，一九八四·四，頁六九~七一；

____，「鄭成功家世資料鄭氏宗譜和鄭氏家譜的發現」，中國史研究，一九八四·五，頁一五三~六〇。

⑪ 李致忠，「略談臺灣府志」，文獻，一九八〇·十，頁二〇〇~三；潘君祥，「蔣毓英修臺灣府志略述」，社會科學，一九八二·二，頁五九~六〇；李秉乾，「臺灣早期志書雜考」，廈門大學學報，一九八五·一，頁一一四~七、一五四。臺灣府志已於一九八五年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室重新刊行。

⑫ 關勇，「臺灣鹿港淡水同知曹士桂及其渡海日記」，文物，一九八四·十二，頁八七~九〇。

⑬ 陳在正，「據清代檔案考訂鄭成功史事十二則」，歷史檔案，一九八三·二，頁八二~八。

增補之處^⑨。

五、結 語

以這一百三十八篇大陸近七年來臺灣史研究的篇章來加以評估，也許未能涵括大陸學者對臺灣史研究的全豹，但一葉知秋，由一部分篇章應可以看出大陸目前研究的主題及時段。若要對大陸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評估，可以引大陸學者孔立對於鄭成功學術討論會的評價來說明，因他所指出的毛病，也正是目前大陸學者研究臺灣史的通病：

(一)缺乏思想深度，提不出比較深刻的新鮮見解。

(二)有些論文只是引用幾種常見的史料，未能搜集和發掘更加豐富的史料，以致內容貧乏，研究水平無法提高。

(三)還有一些作者不能廣泛了解研究動態，更多同志不了解外國和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因而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高一步，或是未能超過前人^⑩。

這樣的批評極為中肯。

大陸學者目前對臺灣史的研究，距離臺灣學者還有一大段距離，不過他們的研究和努力也並非沒有成效，如發現一些少為人知的史料，也考訂了一些謬誤的史事。

如果拿大陸和臺灣學者處理臺灣史的角度來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陸學者通常將臺灣視為和內地並無二致的地方，臺灣不論在那一方面都和大陸相同，並以臺灣的情況和東南各省做比較來證明這種看法；臺灣的學者則將臺灣視為中國疆域中一塊比較特殊的地域來處理，因此常要指出臺灣的各種情況雖有源於大陸者，但和大陸仍多少有相異之處。

臺灣學者所長在能廣泛地運用史料、口碑，對臺灣史的各個層面做深入的探討；不過大陸學者的研究也不容許忽視，一定要能參閱他們的研究，適時提出反證或吸收其長處，所謂知己知彼，在研究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使臺灣史的研究成為大陸方面無可抗衡的學術領域。

^⑨ 鄭克晟、傅同欽，「關於臺灣外記的作者江日昇」，南開學報，一九八二·五，頁四七～五二。

^⑩ 孔立，「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述評」，歷史研究，一九八二·六，頁一一〇～三〇。



英國「國家檔案館」

朱 滋 源

(Public Record Office)

收藏有關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

Public Record Office 是英國的政府機關之一，簡稱 P. R. O.；以藏有十三世紀至今英國中央政府主要部門的檔案而名聞於世。在難以計數的龐大檔案裏頭，有某一部分與我國有直接而且密切的關係。這些與我國有關的檔案，大部分集中在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五二年之間，因為在這段時間之中，英國與中國的關係極為密切，而英國政府亦對我國當時的內政、外交、軍事、財經、社會、文教各面極為留意，其在華機構對其上級機關須作定期或非定期的報告或通信。由於這些資料，在採證方面尚稱嚴謹，在接觸面上亦稱廣泛周詳，再加上英國人善於保存檔案，並定期開放，使得 P. R. O. 所藏有關中國檔案，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必須參考的重要史料之一。

本文的目的，即在簡單介紹 P. R. O. 以及所藏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資料。爰分為四節加以說明：

一、定 名

想把英國中央政府所轄的 Public Record Office 譯為中文，一時之間也找不到既恰當又順口的名稱。

如果依照我國的習慣，則 P. R. O. 幾乎就等於我們的國史館，特別是 P. R. O. 和國史館相同，都在收集中央政府的檔案，加以整理、編排、裝釘，甚至出版。但因 P. R. O. 的重點在 'Record' 一字，國史館的重點在「史」一字，兩個機關基本功能的不同，就在這個地方。重點是 'Record' 時，不必做詮釋的工作；重點是「史」時，就須加上理論性的導引。因此，若想保留 'Record' 的意味，就不能譯之為「史」，我們的「國史館」一詞，因而無法用作 P. R. O. 的中文譯名。

那麼，究竟如何才好呢？

我們認為應該要把它譯成「國家檔案館」。

但是爲什麼把 'Public' 譯作「國家」不譯作「公共的」、「官方的」呢？爲何不把 'Record' 直接譯爲「紀錄」而反譯成「檔案」呢？而又爲何不將 'Office' 譯爲「部」或「局」，而譯爲「館」呢？

我們先從第三個字 Office 說起。

'Office' 的原意，的確與「館」有大不同。它原是政府行政機關之一，而它的層次亦高，接近中央政府的權力核心，像外交部，內政部，在英國的名稱是 Foreign Office 與 Home Office，用的也是 Office 這個字眼。可是，「部」與「局」在中國人的印象中是行政單位，而 P.R.O. 的存在，主要並不是爲了行政業務，而是在將過去關於各類行政業務的文件，加以系統整編以成檔。這種機關，在中文字眼中，不應該是「部」，不應該是「局」，而應爲「館」。

其次說第二個字這個字 Record。Record 這個字眼作爲普通名詞時，通常不祇一件，而應屬複數，應稱 Records。

Records 是 P.R.O. 之所以存在的關鍵因素。自古以來，英國人對於前人的言行以及所曾使用的物品，都喜歡加以保存。因此，'Record' 的觀念，在英人心目中，打十三世紀開始，即具有極高的重要性。英國的學者及政府人員，均曾就其意義爲何，做過許多的討論。這項定範的工作，到了一八三八年才算確定^①。

所謂 'Records'，依據一八三八年的法案來看，指的並不單是狹義的所謂「紀錄」。該項法案指出：

...all Rolls, Records, Writs, Books, Proceedings, Papers, and Documents whatsoever of a public Nature belonging to Her Majesty^②, or now deposited in any of the Offices or Places of Custody before mentioned.^③

上述摘錄，正指出狹義的 records (紀錄) 不過只是廣義的 records 中之一

① 關於國家檔案的立法工作，除了一八三八年之外，爲因應新時代新情況，英國國會又通過了 Public Record Act 1958 與 Public Record Act 1967，而爲今天國家檔案館作業的根據。

② 本法案制於一八三八年，當時由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當政 (一八三七～一九〇一)，故稱 Her Majesty。

③ Public Record Office, *Guide to the Public Records: Part I: Introductory*,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簡稱 HMSO), 1949, p. 17.

種。其他，如名簿 (rolls)、令狀 (writs)、書籍 (books)、議事錄 (proceedings)、文書 (papers) 以及文件 (documents) 等等，任何屬於王室，或存於辦公及儲藏處所的官方書類，均列入 records 的範圍。

根據這個解釋，所謂的 records，實際上應該是一個範圍極鬆散的字眼，而其意義，則正等於 archives。用 archives (檔案) 的觀念來了解它，無疑更為恰當。誠如由 P. R. O. 編輯出版刊物所言：④

‘Archives’ would have been the more convenient, as it is the more accurate, title.

由於 archives 一詞實際上更適切，譯為「檔案」較之「紀錄」自然更加恰當。因此，本文即採意譯方法，將 Record 一詞作廣義解釋譯為「檔案」。

將 Public 一詞譯為「國家」，也一樣，是根據它的實際功能來翻譯的。若將 Public 譯為「公共的」、「官方的」等等，亦不甚妥切。因為 P. R. O. 並不包有全部的政府檔案，它所藏有的，祇及於中央政府的部分，而不及於地方政府⑤。中央政府的檔案，譯為「國家檔案」，似乎尚稱妥切。

基於以上考慮，本文決定將英國政府所屬，廣羅中央政府各部門檔案於其內的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譯成爲「國家檔案館」。

二、國家檔案館簡介

若要介紹國家檔案館，必須另寫一文，才能說得明白，本文重點在其所收藏之中國檔案，因此，祇根據這個目的，作以下兩點介紹。

(一) 國家檔案的種類

十九世紀末，英人將國家檔案主要分爲七大類：⑥

1. 皇室檔案 (Records of the Superior Courts of Law)
2. 司法檔案 (Records of Special & Abolished Jurisdictions)
3. 內廷檔案 (Records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
4. 德翰領地檔案 (Records of the Palatinate of Durham)

④ *Ibid.*, p. 1.

⑤ *Ibid.*, 原文稱：‘The Public Records’, then, are the Archiv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is country Ancient & Modern.

⑥ S. R. Scargill-Bird, *A Guide to the Principal Classes of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簡稱：A Guide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891, pp. IV-V. 以下譯名，均依其典藏檔案之特色，非直譯。

5. 蘭加斯特領地檔案 (Records of the Palatinate of Lancaster)
6. 威爾斯檔案 (Records of the Principality of Wales)
7. 國家文書及機關檔案 (State Papers and Departmental Records)

這七類之中，以第一、二及七類為最重要。就第七類來說，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它包含的計有：海軍檔、稽核 (Audit office) 檔、殖民 (暨貿易) 檔、外交檔、內務檔、主計 (Lord Chamberlain's Department) 檔、財務檔、國防 (War Office) 檔。

從上面非常扼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本文所關切的，祇是七大類中的第七類——國家文書及機關檔案。但因時間的限制及以研究興趣僅在有關中國的部分，本文所將涉及的，又祇是第七類之中的某兩個部分：一個是外交檔，一個是殖民檔。(當然，英國國家檔案裏頭涉及中國的部分，決不僅止於外交與殖民兩檔案，其他如內務檔、海軍檔、國防檔，以及不包括在這七小類之中的其他檔案，都可能有關。)

(二) 檔案分類編號的方法

國家檔案館各種檔案分類與編號的原則都是相同，而分為以下三級^⑦。

1. 第一級為「組」，原文為 Archive Groups 或 Groups。如在「國家文書與機關檔案」類中，有外交檔、殖民檔、海軍檔……等七組。第七組的每一組都用縮寫，以方便登錄。如本文所將介紹的外交 (Foreign Office) 檔，即縮成 F.O.；殖民 (Colonial Office) 檔，即縮寫為 C.O.。

2. 第二級為「類」，原文為 Classes。在外交檔中，各個國家均自成一類，如中國、日本、法國、美國等，均自成一類。「組」與「類」通常合併在一起，並且加上編號，如中國 F.O. 17 編號之內的所有檔案均屬與中國有關。

可是，由於行政作業的複雜性，使得在外交檔中，單用某一號碼來代表某一國的檔案並不可行。如中國，除了 F.O. 17 以外，還有另外許多號碼來代表。而且，更糟的是，由於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單以國家為單位來分類，到後來也無法辦到。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各國事務更加密切相連，以國家作為分類的單元，到了這個階段之後即幾乎沒有辦法繼續了。換句話說，在外交檔中，以國為單元，來嚴格區分「組」「類」的，是一九〇六年之前的作法。一九〇六以後，「組」「類」的區分就沒有往日那種必定與國家相結合的情形，混亂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⑦ 同註③，頁三八。

我們再以有關中國的檔案來舉例。除 F. O. 17 外，F. O. 228、229、230、231、232、233、385、386、387、405、415、436、483、523、562、563、564、656、663、664……等等，總共有五十個左右的組類均係關於中國的。這些組類，在涵蓋的時間以及檔案內容的性質上，也互不相同。如 F. O. 17 爲一九〇六年以前的一般通信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 China); F. O. 228 爲一八三四年至一九三〇年的使領館檔案「中國」部分裏頭的第一集通信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hina Correspondence, Series I); F. O. 229 爲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五三年的使領館檔案「中國通信」的「複本」(原文爲: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hina Correspondence, Duplicates); F. O. 230 爲一八三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中國信件」類 (China Letter Books); F. O. 231 爲一八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國通信登記簿」類 (China Registers of Correspondence); F. O. 232 爲一八四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國通信索引」類 (China Indexes to Correspondence); F. O. 233 爲一七二七至一九五一的「中國雜項」類 (China Miscellanea), ……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從上面舉例，不難明白兩件事：第一，英人當年處理其檔案，在分類過程上礙於前人的各種不同分類方式，而無法十分嚴謹。從這一現象，似可判斷英人當年的外交工作，在分工方面並不嚴格，而傾向於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彈性手法。這種作法，正與英人至今仍採不成文法習慣，無法將其全套法令規章予以明白釐定，俾成系統的現象不謀而合。

第二，鑑於分類的方法因時而異，再加以所收藏檔案的數量極爲龐大，使得索引的製作，至今仍付之厥如。今人在今天想查考與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英國國家檔案，也祇好投下較多的時間去搜尋了。

3. 第三級稱爲「宗」，原文稱爲 piece，指的是一個完整的單元，可能是一卷(volume)，可能是一捲(roll)，也可能是一捆(bundle) 文件或名簿。

前面的「組」加上「類」，已使情形十分混亂無章，組、類之下分「宗」，也是大小不等，而且也不一定用「宗」(piece)這個字眼。如 F. O. 17 有一、七六八「卷」(volumes); F. O. 228 有四、三七二「卷」。這兩個類(class) 都可以說是巨無霸型的。又如 F. O. 386，有八卷；F. O. 668 有三卷；F. O. 673 則够不上「卷」的程度而僅有十一份文件，稱爲 file(本文把 file 譯爲「件」)。這兩個類與前面兩個類相比，不但是小巫見大巫，簡直是天淵之別。

由此可知，外交檔中的分類方式，不論在性質上，或在時間上，或在件

數上，都不能找到足以作為原理原則的特徵。外交檔如此，其他的檔案自然也發生類似的現象。但是，雖然在分類上沒有辦法找到共同點，英國國家檔案館仍為全世界歷史學界所矚目的一大目標。它之所以能有這種成就，能在不太成系統的編目之下，每天仍能吸引全世界各地學者百數千人，不惜巨資前來，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因為它庋藏之富之久，舉世恐難尋匹。遠從十三世紀之初英王亨利第三（一二二六～一二五七）即開始注意紀錄的保存工作^⑧。從此英人開始對環繞在皇室週遭的事務，開始養成將有關文件加以保留的習慣。時間的久遠，是使英國國家檔案傲視於全世界。而由於科學的發明與發現，在英國進入啟蒙以及工業革命的時期之後，更使其檔案，因國家的興盛而快速增加。演變到了二十世紀，其政府各部門的有關檔案，自然更較過去為多。時間既長，數量又多，種類又細，無疑是其最大的優點。

在這種數量龐大、種類又細，分類不頂規則的狀況下，想要找到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文件，以前後二十個工作天是不可能辦到的。因此，本文祇能把注意力限制在外交檔與殖民檔。但是，即便是只看這兩種檔案，在有限的時間內，也無法確定掌握所有的項目。以下，擬就目前接觸所及，分別簡單介紹外交、殖民兩檔之中與我國有關的部分。

三、外交檔中有關資料

(一) 概括性說明

根據國家檔案館所編撰的“The Records of the Foreign Office, 1782-1939” (London: HMSO, 1969) 頁七十二所言，外交檔在一九〇六年以後，依「性質」將文件分為十一類^⑨，其實並沒有這麼單純。就與中國有關的部

⑧ 從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修訂出版的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之 24—*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的目錄上，可以看到，單是十三世紀的檔案，就有十二本之多。

⑨ 這十一類依字母順序分別是：(隨後舉例)

Africa, New Series	(F. O. 367)
Commercial	(F. O. 368)
Communications	(F. O. 850)
Consular	(F. O. 369)
Contraband	(F. O. 382)
Dominions Information	(F. O. 627)
Library	(F. O. 370)
News	(F. O. 395)
Political	(F. O. 371)
Prisoners of War & Aliens	(F. O. 383)
Treaty	(F. O. 372)

分來說，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在第一種類之中，包含的是以國家來區分的一般性通信，而且時間限在一八一五到一九〇五年之間。這一種類中與中國有關的，只有一個 Class，那就是 F.O. 17。

第二種類包含的是既依國家，又依性質所做分類的檔案。這一類的檔案相當之多，其號碼依次是（為簡便起見，已將“F.O.”省略）：228, 229, 230, 231, 232, 233, 385, 386, 387, 405, 415, 436, 523, 563, 564, 656,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92, 693, 694, 735, 851, 914, 917, 931, 932, 965, 1080。這一種類，大部分都屬於「使領館檔案」(Embassy & Consular Archives China)。

第三種類有三種標準被綜合採用，即首先依性質，其次分區域（如北方、南方、遠東等區），再次才在各區之中以國家為單位做進一步的分類，F.O. 371 就是佳例。F.O. 371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數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七）的外交檔中通信類的政治類，英人名之曰：General Correspondence: Political。這是超級巨大的一個 Class，它所包含的文件，超過千萬頁。其中關於我國的，一九三九年有一四四宗、一九四〇年有五十九宗、一九四一年有一六八宗、一九四二年有一一〇宗，一九四三年有二九七宗、一九四四年有一六五宗、一九四五年有一七四宗、一九四六年有二二九宗、一九四七年有一六七宗。九年相加，大約就有一千五百宗。一千五百宗究竟有多少呢？憑空實在很難想像。我想在這裏舉一個較為人所關切的例子——國共爭端。一九四五年英領事政治通信有一七四件，其中幾件即為國共問題之報導，頁數約在五千之下；一九四六年對這個問題的報告，也附在幾件通信中，頁數約為七千；一九四七年，光是報導 Marshall 如何終於放棄協調，即寫了一萬七千頁的報告。

以上對這三類的介紹，自然是相當籠統的。但唯有先做概括介紹，才容易先抓住其特點。以下則將化整為零，逐一加以扼要說明，使國內讀者有機會循線追索。

(二)逐「類」(Class) 介紹

為求明晰濃縮，宜以統一格式處理。本欄的格式要項如次：

1. 「組」，即「外交」，以 F.O. 為代號，保留原狀。
2. 「類」，即 Class，每一類檔案均有號碼。錄其號碼。
3. 「檔案名稱」通常分為兩部分，有時分為三部分，也有統一只有一

種的。

4. 檔案涵蓋「年限」，如 1842-1886。
5. 檔案「數量」。如：多少卷 (volumes)，或多少件 (files)
6. 內容大要。

F.O. 17：一九〇六年以前一般通信——中國

一八一五～一九〇五，一七六八卷

北京、廈門(Amoy)、煙臺(Chefoo)、鎮江(Chin-Kiang,或Ching Kiang, King-chiang)、福州(Foochow,或Foochow foo)、宜昌(Ichang)、漢口(Hankow)、成都(Chengt'u)、九江(Kewkiang或Kiukiang)、瓊州(Kiungchow)、寧波(Ningpo)、北海(Pakoi,或Pakhoi 廣東省廉江口)、汕頭(Swatow)、騰衝(Tengyueh)、昆明(Yunnan Fu)、重慶(Chungking)、南京、上海、廣州(Canton)、臺南(Taiwan或Tainan)、淡水(Tamsuy或Tamsui)、蕪湖(Wuhu)、溫州(Wenchow)、牛莊(Newchwang)、天津(Tientsin)、澳門(Macao)、漢城(Soul或Seoul或Corea)、黃埔(Whampoa)、江華島(Chemulpo)^⑩、猛梭(Mankow)^⑪、南着島(Pagocla Island)^⑫、沙市(Shashih)、思茅(Ssumao)、梧州(Wuchow)、杭州(Hangchow)、蘇州(Soochow)、喀什喀爾(Kashgar)、江門(Kongmoon)^⑬、濟南(Chinanfu)、威海衛(Weihaiwei)等地的使館、領館、法院、商務監督等等各級人員對中國之內政、外交、邊疆、社會、治安、經濟、交通、礦冶、工業，以及對英國在華各類機關本身的領務、僑務、郵務、醫務等等事件所做的報告、以及英國政府的指示、雙邊的協議。報告與指示、協議的形式，或為電報，或為信件，或為紀錄，不一。另外，在上面提及的城市中，包含漢城。其內容為駐漢城總領事在一八九〇到一九〇五年間，與駐華人員之間的函件。

^⑩ 見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24: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頁五七。第一宗至第一三〇七宗涵蓋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的事務，所拍成膠捲共五六八部，售價一五、五四〇英鎊。

^⑪ Chemulpo 一地，經查係漢城西方臨海之一城市。根據：E. Stanfo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8.

^⑫ Mankow 一地，在上列 Stanford 的地圖上無法尋獲，疑係 Manhao 一地。Manhao 應即滇越邊界上的城市——猛梭。根據：Stanford, *Ibid.* 丁文江等編：中華民國新地圖，上海：申報館，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⑬ Pagoda Island 依 Stanford 之圖，為閩江口上的一個大島，在福州南方。丁文江的地圖上，稱之為南臺島。

^⑭ Kongmoon 為粵語音譯而成者。依丁文江的地圖，應即江門。江門位處西江之口，故名之。江門在新會東北方。

F.O. 17: 自第一宗至一三〇七宗部分業經拍成膠捲，公開售賣^⑮：

F.O. 228: 使領館檔案——中國：通信：第一集。

一八三四～一九三〇，四三七二卷

這一「類」的內容，其性質與 F.O. 17 大致相同，但因時值清朝末葉以及民初的二十年，其報告的項目及內容又較過去增加，自然更有可觀之處。

在通信的單位方面，則較 F.O. 17 增加數處，而以長沙 (Changsha)、大連 (Dairen)、哈爾濱 (Harbin) 與瀋陽 (Mukden) 等地為最著。其通信機關的層次亦高，即英政府外交部與我總理衙門（以及後來的外務部、外交部）之間的往返信函與訂定之協議，各殖民地（特別是印度總督）與英國駐華使節之連繫等等。我國與印度、泰國、新加坡、韓國、日本間之關係，亦在搜羅之列。當然，各地領館對我政、經、社、文、軍事等之報導以及其相互之間的往返連繫，自為本類檔案的主要部分。

另外，與 F.O. 17 相同，本類之內包含與韓國有關的通信，自一八九六開始。就這方面而言，請參閱 F.O. 676 與 677。

F.O. 229: 使領館檔案——中國：通信，複本。

一八三六～一八五三 十二卷

主為來自英國外務部的專函 (dispatches) 的複本。這些資料均可在 F.O. 228 中找到。

F.O. 230: 中國：信函集 (China Letter Books)

一八三四～一九一七 一八五卷

F.O. 231: 中國：通信登記簿 (China Registers of Correspondence)

一八三六～一九四五 一一七卷

(但不包含一八九七至一九二七期間的資料。)

F.O. 232: 中國：通信索引

一八四三～一九三七 五十四卷

其中以一九二八以後之部較為詳盡，包含對信件內容的簡單描述。

^⑮ 按：英國的檔案，每一卷上面均有某些註記。其中一種就是保密期限之說明。有些較機密者，即在文件上之註明 "Closed until XXXX"。如果是一九五四年的文件，要保留五〇年，即寫上 "Closed until 2004"。但，通常在未列年限之前即可在檔案館中閱讀了。

F.O. 233: 雜項 (China Miscellanea)

一七二七~一九五一 三〇六卷

包含以下諸類：

使館檔案目錄(一七二七~一八五九之部)；外貿與情報訊息(trade & intelligence reports)；司法案件議事錄(records of legal proceedings)；(使館內部) 中文秘書處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各類文件；東印度公司駐華辦事處關係文件登錄簿；中、日衝突案件 (一九二七~一九四〇) (Claims arising from Sino-Japanese hostilities)；會計出納 (accounts)；傳閱文件 (circulars)。

(請參考 F.O. 682)

F.O. 371: (請參考前面「概括性說明」中關於本類的描述。)

F.O. 385: 使、領館檔案——中國：鎮江通信

一八七一~一九二五 十九卷

(其間有一中斷時期：一八七六~一八八八)

F.O. 386: 使、領館檔案——中國：鎮江通信登記簿

一八七一~一九二七 八卷

F.O. 387: 使、領館檔案——中國：鎮江雜項^{①⑥}

?~一九二七 十一卷

英國人民、船隻、婚姻登記簿；結婚通知；以及委任書 (copies of powers of attorney)

F.O. 405: 機密文件 (Confidential Print)——中國

一八四八~一九五七 二八八卷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間，包含臺灣之部。出中某些部分五十年之後才解禁。

F.O. 415: 機密文件鴉片：(Confidential Print Opium)

一九一〇~一九四一 三一一卷

F.O. 435: 機密文件——遠東事務

一九三七~一九五六 二五卷

^{①⑥} 本類之中，原藏有英人在鎮江組織的市議會的檔案，今已銷燬，其原因不明。

本類所藏係法及中國、日本、尼泊爾、泰國（Siam——暹羅）與東南亞地區的通信。其中在一九四七年以後之部，則只屬一般通信。這類之中，有些案件的解禁期限是五十年。

F.O. 483: 機密文件——朝鮮

一九四七~一九五六 十卷

時值大陸撤守至韓戰以及冷戰的開端，本類之內，亦應有可觀之處。

F.O. 523: 使、領館檔案——朝鮮：漢城

一八九一~一九〇九 十三卷

F.O. 562: 使、領館檔案——中國：北京：通信

一九〇二~一九五〇 十八卷·二件 (files)

F.O. 563: 使、領館檔案——中國：北京：雜項

一九〇五~一九三一 八箱 (boxes) 及其他

其中包含 Free Cash Books，軍事登記文件 (military registration papers) 以及護照申請案件。

F.O. 564 使、領館檔案——中國：北京：雜項登錄冊及其他

一八七四~一九二六 十四卷及其他

出生登記簿、死亡登記簿、結婚登記簿、各式宣誓文、英國人民及護照登記簿等等。^①

F.O. 656: 使、領館檔案——中國：上海：最高法院通信

一八六二~一九三九 二七一卷

主含涉及法庭事務的領事通信以及其他通信。另外，本類之內，亦括有皇家律師之一般通信、日記、聽訟記錄、處理案件等，以及領事館財務參事處理國際清償案件的文書。

F.O. 663: 使、領館檔案——中國：廈門

一八三四~一九五一 九五卷

包含領事館與貿易總監的往來文書；一般通信文書；通信登記簿；死亡、出生、婚

① 所謂：出生、死亡、結婚登記，僅限於外籍西方人士，其中以英國人為主，但不單限於英人，其他如加拿大人等，也包括在內。

姻以及通信登記簿。

F. O. 664: 使、領檔案——中國：成都

一九〇二~一九四八 五卷及其他

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¹⁸領事館舍租賃契約。

F. O. 665: 使、領館檔案——中國：福州

一八四六~一九四六 十卷及其他

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英國人民名冊。

F. O. 666: 使、領館檔案——中國：漢口與杭州

一八六五~一九五一 九十二卷及其他

一八六五以及一八六九~一九二一之通信；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

F. O. 667: 使、領館檔案——中國：宜昌

一八七九~一九四一 六卷及其他

一九二六年的通信以及一八七九~一九四一的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

F. O. 668: 使、領館檔案——中國：昆明

一九四五~一九五一 三卷及其他

領事館舍租賃契約、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

F. O. 669: 使、領館檔案——中國：營口 (Newchwang)

一八六五~一八六八 一箱

通信。

F. O. 670: 使、領館檔案——中國：寧波

一八四三~一九三三 二五六卷及其他

¹⁸ 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科，登錄的純是外國在華人士的事務，乍看似與中國無關，其實不然。蓋從這些記錄，就很容易確切明瞭當時究竟有多少外國人在該領事館的轄區之內。由於登記簿上項目詳細，如出生簿上，除出生之人以外，自應錄其父母姓名。父母的資料中，以父親的部份最為詳盡，因為還錄有其在華之職業。如果是傳教士（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外籍父親是傳教士），還需進一步指出係屬何一教派。傳教士多屬知識份子，這麼大批的人員（如成都一帶，在一九〇五到一九二七年間，至少有兩百名的傳教士在此活動）居住在中國各主要都市或區域，自能在多方面產生相當的作用。詳見：F. O. 664 3: Register of Births (1905-1927)—His Britannic Consular General, Chengtu.

通信；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英國人民名冊；商務監督通信。

F.O. 671: 使、領館檔案——中國：上海

一八四五～一九五三 五七八卷及其他

通信：英國人民名冊。

F.O. 672: 使、領館檔案——中國：上海：雜項

一八五一～一八六四 三卷

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

F.O. 673: 使、領館檔案——中國：大沽

一八六二～一八七六 十一件 (files) 及其他

通信；出生、死亡登記簿；最高法庭記錄。

F.O. 674: 使、領館檔案——中國：天津

一八六〇～一九五〇 三五一件及其他

通信；出生、婚姻、死亡登記簿；最高法庭記錄。

F.O. 675: 使、領館檔案——中國：青島

一九一一～一九五一 十九件及其他

通信；通信登記簿；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檔案(一九三六～一九三九)清冊。

F.O. 676: 使、領館檔案——中國：通信，第二集 (接續 F.O. 228)

一八七五～一九四八 四六九件

包含：北京公使館 (一八七五～一九四七)、南京大使館 (一九二九～一九四八)、上海大使館 (一九三七～一九四〇)、重慶大使館 (一九三八～一九四五) 的通信資料。就一九三九年以前的通信資料，可以說是 F.O. 228 所收藏之部的補遺。這類檔案之中，有一部分要五十年後解禁。

F.O. 677: 使、領館檔案——中國：商務監督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一七五九～一八七四 二六箱及其他

本類檔案係於一九五六年自大陸運英之部，為 F.O. 228 中有關商務監督部分的補遺。

商務監督——制始自一八三七年。本類檔案包含：一七五九至一八三二之間的通信與日記 (其中有繼自印東度公司者)；鴉片戰爭期間以及戰後，與英國海、陸軍官

以及印度殖民政府之間的通信；以及一八五九年領事裁判案件之決議乙卷。

F.O. 678: 使、領館檔案：各種領事館契據

一八三七~一九五九 二九九八件及其他

個人及公司的名銜證書；政府財產契據；信託、協議、遺囑、委任狀等證書；各類法律文書。

以上這些契據分別來自下述的使領館：廈門、廣州、煙台、晉江、重慶、福州、漢口、天津、濟南、青島、威海衛、長沙、成都、昆明、南京、營口(牛莊)、北京、瀋陽、汕頭、宜昌、寧波、廬化、溫州、上海等。

F.O. 679: 使、領館檔案——中國：各地使領館契據登記簿

一八五三~一九五三 二十卷

來自廈門、煙台、重慶、福州、南京、晉江、天津。

F.O. 680: 使、領館檔案——中國：領事館各種土地登記簿

一八五四~一八四二 五十卷

來自：北京、廈門、長沙、煙台、成都、晉江、秦皇島、重慶、福州、漢口、宜昌、九江、南京、天津、威海衛、蕪湖、昆明等館。

F.O. 681: 使、領館檔案——中國：各地領事館所藏出生、死亡、婚姻登記簿

一八六一~一九五一 八一卷

來自：廣州、長沙、煙台、濟南、重慶、大連、九江、桂林、瀋陽、南京、汕頭、臺南、淡水、騰衝、威海衛、黃埔與昆明等館。

F.O. 682: 使、領館檔案——中國：中文書類

一七六五~一九五一 一九七一件

英國駐華北京大使館中文秘書處所收藏之檔案。包含外交與商務通信、官方中文文件、契據。另有許多資料，涉及各地叛亂及叛亂之平定等等。

這些文書，有一部分已移到大英博物館中。其登記簿，放在 F.O. 932 項下。

F.O. 692: 使、領館檔案——中國：北京：通信登記簿

一九〇一~一九四七 九卷

一九二〇以前為領事的通信登記簿，一九二〇以後為商務秘書的登記簿。

F.O. 693: 使、領館檔案——中國：濟南

一九〇七~一九三七 一卷
法院裁決、公證及徵信紀錄簿。

F.O. 694: 使、領館檔案——中國：廣州
一八四四~一八五一 二件
英國人民名冊；中國官方簽署之證狀等等。

F.O. 735: 使、領館檔案——中國：煙台
一八六〇~一九四一 七箱及其他
檔案清冊、財產清冊、與中國海關通信複本。

F.O. 763: 使、領館檔案——日本：淡水
一八九七~一九三九 二十五件及其他
通信及通信登記簿。

F.O. 851: 使、領館檔案——中國：溫州
一八七八~一九〇六 六卷
通信類。

F.O. 914: 使、領館檔案——中國：上海：公司登記
一九一四~一九四九 五十四件
英國人民所開公司向上海「公司登記處」(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申辦註冊之文件。

F.O. 917: 使、領館檔案——中國：上海最高法庭，公證記錄
一八五七~一九四一 三九九八件
包含不動產之登記、遺囑之認定等文件。本類文件均按年分類。每年之中各件，又依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F.O. 931: 使領館檔案——中國：廣東省中國官方檔案
一七六五~一八五七 一九五四件 (documents)
本類檔案括有英國軍隊於第二次中英戰爭(亞羅船事件~一八五七)中，自總督府劫去中國行政當局的檔案。中涉鴉片貿易、鴉片戰爭、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外關係、內部之叛亂案件，以及亞羅船事件的有關文書。¹⁹

¹⁹ 本類檔案十分珍貴。業由 David Pong 所發現並予整理，於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ited at the P.R.O. of London* (清代廣東省檔案指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一書中有清晰的說明與介紹。

- F.O. 932: 使、領館檔案——中國：(英使館內) 中文秘書處中文通信登記簿
一八四〇~一九三八 五十三本
即 F.O. 682 所藏通信資料之清冊，其中包含北京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年間使節團團長的名冊。
- F.O. 965: 使、領館檔案——中國：臺灣：淡水
一九四七~一九五三 十二件
- F.O. 1048: 使、領館檔案：東印度公司：中文文件 (本類文件尚在外務部未能送至國家檔案館，數量及涵蓋年限均不明。)
- F.O. 1054: 使、領館檔案：韓國：通信
一九五二 二件
這兩件涉及韓國一九五二年的政治危機，與中國的關係亦極密切。
- F.O. 1080: 使、領館檔案：中國：(英使館內) 中文秘書處：雜項
(本類文件疑與第一〇四八類相同。)

以上，從外交檔第十七號到外交檔第一〇八〇號，我們不難發現許多資料，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或者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當然，近年來由於我國人民與英國之間的往來，比起與美國，可以說是過於稀少的。也因為這個緣故，這麼大宗的，關係全世界歷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之認識與詮釋的資料，除了少數赴英留學或進修研究的學者外，至今仍未能為國人所熟知。

事實上，不祇是外交檔如此，其他各檔之中，恐仍有許多可觀之處。底下，擬再以殖民檔來說明。

四、殖民檔中有關資料

所謂「殖民檔」，指的自然是 大英帝國當其盛世，號稱日不落國時代，有關所轄殖民地事務的檔案。這部檔案在國家檔案館中，被稱為 Colonial Office Records，簡稱 C.O. 其所涉事務，在時間與空間上，都較外交檔為小，數量上自然也較有限。其中直接關係中國的，也只有香港與威海衛兩

地。由於較外交檔小，且該檔之分類又較容易，這裏不作概括性說明，而且按介紹檔案內容。首先介紹香港，其次是威海衛。

(一) 殖民檔——香港之部

C.O. 129：香港：原始通信文件

一九四一～一九五一 六二九卷（或件）

所謂「原始通信文件」(original correspondence)指的自然是英國殖民部 (Colonial Office) 與殖民地之間的往來文書。在最初的階段，收集的是來自殖民部的文書，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才將發出去的信件也列入收集的範圍。

在這六百多單位的文件之內，^②有時一個單位有一宗文件，有時則較多，通常每單位都有數十件。文件性質括及所有事務，凡與香港殖民政府當局有關者，都在蒐羅之列，其中除公文外，也包含私人的文件。^③本類之內，有些文件的解禁期限為五十年。而 C.O. 1023 則為本類的延續，宜合而觀之。

C.O. 130：香港：各式法案

一八四四～一八六一 二十二卷

為香港殖民政府致殖民當局的原稿或印刷文件，內容泛及法務官員、貿易委員、殖民局法律顧問等的報告，以及樞密院的許可狀等等。

C.O. 131：香港：會議文件 (Sessional Papers)

一八四四～一九六〇 一六一卷（或件）

立法及行政會議議事錄，殖民政府各部門行政報告。本類檔案，除行政會議記錄外均可公開。

C.O. 132：香港：政府公報

一八四六～一九六〇 一四六卷

本類文件均可公開。

C.O. 133：香港：雜項

② 對於 C.O. 129 類之檔案，由 HMSO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所出版的 *List of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當中，指出 C.O. 129 包含文件五九五單位，涵蓋時間為一八四二～一九四六，與本文所列者不同。其所以不同，主因解禁年限所致。因為在該奏目錄出版之後，國家檔案館殖民檔所藏文件仍持續增加。故而原為一八四二～一九四六的文件五九五單位，今為一八四二～一九五一的文件六二九單位。

③ 相關的文件舉不勝舉，諸如：Admiralty, Crown Agents, Foreign, Air, Colonial, War, Home, India, Treasury 等部會，Board of Trade, House of Commons, Law Officer 等機構或官員，以及雜項等均在內。

一八四四~一九四〇 一一一卷

統計、貿易及船隻回航之藍皮書，是自一八四四以來的逐年統計報告，有時一年兩卷。

C.O. 323：一般殖民事務：原始通信

一八八九~一九五二 一九三一卷（或件）

本類似針對所有殖民地的檔案，內容最稱廣泛，括及殖民地憲法、政府、各地情勢、選舉、貿易、戰爭、戰後重建、法規、種族歧視、國籍、外交特權、財政控制、鴉片等等。其中自有多卷涉及香港，更有一些文件報導一九三二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情形^②。

C.O. 349：香港：通信登記簿

一八四九~一九五二 四十三卷

C.O. 403：香港：收文簿

一八四三、四、六~一八七二、二、二十八 二十一卷

為殖民部部長之來文，中分專函、公文以及私人函件之類。^③

C.O. 489：香港：發文簿

一八七二~一九二六 十五卷

發文簿上，把專函歸一類，公文與私人文件歸一類。

C.O. 714：通信及索引

一七九五~一八七四 一七一卷

其中三卷與香港有關：

1. 第八二卷：一八四三~一八五七之通信；2. 第八三卷：一八五八~一八六六的通信；3. 第八四卷：一八四三~一八六九的索引。索引係依字母順序排列。

C.O. 1023：香港及太平洋區域：原始通信

一九四六~一九五五 二四二件

^② 見 Noulens Reports。

^③ 其“letters”通常分為 dispatches, offices 與 individual 三類。為何如此分類？經由 P. R. O. (Kew) Reference Room 服務人員討論結果，所謂 dispatch，為一特殊類別，舉凡在英國外務大臣——殖民地總督——大使——公使館之公使——總領館之總領事——領事館之領事之間的官方通信，別立一類，稱為「快郵」，其餘信件則端視以機關名義或以私人名義來函，而分為 official 以及 individual letters。

包含香港、廣州、斐濟、索羅門羣島、甚至摩里西斯 (Mauritius 在印度洋) 等十二個地區。其通信內容涉及整個十二地區的問題，殖民地的發展與福利計畫、以及南太平洋委員會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西太平洋高級委員會 (Western Pacific High Commission) 等機構。

(二) 殖民檔——威海衛之部

C.O. 521: 威海衛: 原始通信文件

一八九八·六~一九三三 八六卷 (或件)

範圍廣及會計報告、估價、治安、學校、國民黨活動、公共設施、財政、人事、交通等等。其中有些檔案的解禁期限為五十年。

C.O. 744: 威海衛: 政府公報

一九〇八~一九三〇 三卷

C.O. 770: 威海衛: 通信登記簿

一八九八~一九三一 四卷

C.O. 771: 威海衛: 發文簿

一九〇一~一九二六 四卷

C.O. 841: 威海衛: 法規

一九〇三~一九三〇 一卷

C.O. 873: 威海衛: 專門委員檔 (commissioner's files)

一八九九~一九三〇 七七九件及其他。

舉凡政治、經濟、議會、交通、租稅、鴉片、貪污、礦產、林業、治安、醫療、災荒、移民、建設等等地方性的紀錄，都在囊括之列，均為殖民政府所接收。

五、結 語

英國國家檔案館由於成立得早，而且英人有保留資料、古蹟的習慣，加上分類細緻，使得英國國家檔案之館藏數量以及品類均極龐大，極富參閱價值。由於其分類細緻，有關中國的檔案，就不可能祇涵蓋在上述的外交與殖民兩檔之中。這兩種檔案，不過是直接有關的兩個大類罷了。除了這兩個大

類之外，其他還有幾類可能也有密切關係，諸如：內閣(Cabinet Office)、戰爭擄獲文件(Captured Enemy Documents)，王座巡迴使(Crown Agents for Overseas Governments and Administration)，關稅委員會(Board of Customs & Excise)、海外拓展部(Ministry of Overseas Development)、首相辦公室(Prime Minister's Office)、作戰部(War Office)等^②。當然，由於係初步接觸，且上述諸類中有關資料之數量，在比例上自然少於外交檔與殖民檔，因此仍未展開查訪工作。惟我們也明白，英人在數次對華戰爭中，曾擄去文件極眾，在「戰爭擄獲文件」一檔之中，也必有許多令人注目的項目，這些東西，惟有在最近的將來再前往查看了。

另外，國家檔案館中所收藏關於中國的地圖也極可觀而珍貴。如單是威海衛，即有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三年編製的地圖十多張。作者在隨意翻閱其地圖集卡片時，即發現在數百件地圖中，有兩件極引起我的注意：一件為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時，英軍在 Sir Hugh Gough 中將指揮下進攻長江鎮江府(Chin Kiang Fu)的兵備佈置及行進計畫；一件為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自北塘(Pehtang)登陸到攻克大沽口砲臺的行動圖。^③再如 F.O. 925，整類裏頭包含有一七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全世界各地地圖四、六五二張(或套、或本)。筆者隨意調出第二、三八六宗，是英人所繪中英文對照的長江地圖，全套共十二張。在十二張之中，又將長江分為十九「節」，逐節詳細描繪。此外，更對江上重要港口，逐一再予放大說明。

面對英人對我國工作所做為數驚人的檔案，作為一個近史所的成員，只有欣喜的感覺，以為如入寶山，矢志不能空手而回。但面對的這些檔案之中，又多有古人敗仗敗事之紀錄，觸目而污顏，則又是另外一種感受。二者相加，而成一雜亂之情緒，就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附錄一、皮藏在倫敦西南郊 Kew Gardens 的檔案 (RECORDS AT KEW)

Admiralty (ADM)

Advisory Conciliation & Arbitration Service (CW)

^② 檢附國家檔案館皮藏檔案最多的兩處的檔案分類全表，見附錄一、二。

^③ 英法聯軍北塘登陸攻克大沽圖原即作戰部的檔案，檔案號碼為 W.O. 94/72/32.W.O. 即 War Office 的簡稱。

-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od, Ministry of (MAF)
- Air Ministry (AIR)
- Aviation, Ministry of (AVIA)
- British Council (BW)
- British Railways Board (AN)
- British Transport Docks Board (BR)
- British Transport Historical Records (RAIL)
- Cabinet Office (CAB)
- Captured Enemy Documents (GFM)
- Certification Office for Trades Unions and Employers Associations (CL)
- Channel Tunnel Advisory Groups (BS1)
-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CSC)
- Civil Service Department (BA)
- Civil Service Pay Research Unit (CSPR)
- Coal Industry Social Welfare Organisation (BX)
- Colonial Office (CO)
-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DO)
- Copyright Office (COPY)
- Countryside Commission (COU)
- Crown Agents for Overseas Governments and Administration (CAOG)
- Customs & Excise, Board of (CUST)
- Defence, Ministry of (DEFE)
- Development Commission (D)
- Distribution of Income & Wealth, Royal Commission on (BS7)
- Education & Science, Department of (ED)
- 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 Hospital (CF)
- Environment, Department of the (AT)
-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oyal Commission on (CY)
- Exchequer and Audit Department (AO)
- Export Credits Guarantee Department (ECG)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mmittee to review the functioning of (BS9)
- Foreign Office (FO)
- Forestry Commission (F)
- Forfeited Estates, Commissioners of (FEC)
- Friendly Societies, Registry of (FS)

Gambling, Royal Commission on (BS3)
General Register Office (RG) except Census Returns (RG9-RG10), Non-Parochial Registers and records (RG4-RG8) and certain other registers and associated papers (RG 18, 19, 27, 30-37, 43)
Government Actuary's Department (ACT)
Health &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of (BN)
Health, Ministry of (MH)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HMC)
Home Office (HO)
(except Census Returns (HO 107))
Housing &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of (HLG)
Hudson's Bay Company (BH) Microfilm.
Access by permission of the Company only
Information, Central Office of (INF)
Inland Revenue, Board of (IR) except Estat Duty Registers (IR 26 and IR 27)
Irish Sailors' & Soldiers' Land Trust (AP)
Iron and Steel Board (BE)
Labour, Ministry of (LAB)
Land Registry (LAR)
Lands Tribunal (LT)
Law Commission (BC)
Local Government Boundary Commission for England (AX)
Location of Offices Bureau (AH)
Lord Chancellor's Office (LCO)
Meteorological Office (BJ)
Metropolitan Police Force (MEPO)
Monuments, Ancient & Historic in Wales and Monmouthshire, Royal Commission on (MONW)
Monuments, Historic (England), Royal Commission on (AE)
Munitions, Ministry of (MUN)
National Assistance Board (AST)
National Coal Board (COAL)
National Debt Office (NDO)
National Dock Labour Board (BK)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Royal Commission on (BS6)
National Incomes Commission (NICO)
National Insurance Audit Department (NIA)
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CT)
National Savings Department for (NSC)
National Service, Ministry of (NATS)
Operators' Licensing, Committee of enquiry into (BS4)
Ordnance Survey Department (OS)
Overseas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OD)
Parliamentary Boundary Commission (AF)
Parole Board (BV)
Paymaster General's Office (PMG)
Pensions & National Insurance, Ministry of (PIN)
Pensions Appeal Tribunal (BF)
Power, Ministry of (POWE)
Press, Royal Commission the (BS2)
Price Commission on (CX)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REM)
Prison Commission (PCOM)
Public Building & Works, Ministry of (WORK)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all classes [except transcripts (PRO 31) and
certain classes of gifts and deposits (PRO 30)]
Public Trustee Office (PT)
Public Works Loan Board (PWLB)
Reconstruction, Ministry of (RECO)
Remploy Ltd (BM)
Research Institutes (AY)
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 (BP)
Royal Mint (MINT)
Scientific & Industri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DSIR)
Stationery Office (STAT)
Supply, Ministry of (SUPP)
Tithe Redemption Commission (TITH)
Trade, Board of (BT)
Transport, Ministry of (MT)

Treasury (T)
Tribunals, Council on (BL)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AB)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Value Added Tax Tribunals (CV)
Wallace Collection (AR)
War Office (WO)
Welsh Office (B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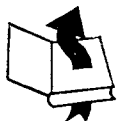
二、度藏在 PRO 總部的檔案 (RECORDS AT CHANCERY LANE)

Admiralty, High Court of (HCA)
Alienation Office (A)
Assize, Clerks of (ASSI)
Bankruptcy, Court of (B)
Central Criminal Court (CRIM)
Chancery (C)
Chester, Palatinate of (CHES)
Common Pleas, Court of (CP)
County Courts (AK)
Crown Estate Commissioners (CRES)
Delegates, Court of (DEL)
Durham, Palatinate of (DURH)
Exchequer (E; LR)
General Register Office (RG) Only Census Returns (RG9-RG10), Non-Parochial Registers and records (RG4-RG8) and certain other registers and associated papers (RG 18, 19, 27, 30-37, 43)
Home Office. Only Census Returns 1841 and 1851 (Ho 107)
Inland Revenue, Board of. Only Estate Duty Registers (IR 26 and IR 27)
Judicature, Supreme Court of (J)
Justices Itinerant (JUST)
King's Bench, Court of (KB)
King's Bench Prison (PRIS)
Lancaster, Duchy of (DL)

Lancaster, Palatinate of (PL)
Land Revenue Record Office (LRRO)
Law Officers' Department (LO)
Lord Chamberlain's Department (LC)
Lord Steward's Office (LS)
Palace Court (PALA)
Peveril, Court of the Honour of (PEV)
Prerogative Court of Canterbury (PROB)
Privy Council,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CAP)
Privy Council Office (PC)
Privy Purse Office (PP)
Privy Seal Office (PSO)
Public Prosecutions, Director of (DPP)
Public Record Office (Transcripts) (PRO 31) and certain classes of gifts
and deposits (PRO 30)
Queen Anne's Bounty (QAB)
Requests, Court of (REQ)
Signet Office (SO)
Special Collections (SC)
Star Chamber, Court of (STAC)
State Paper Office (SP)
Treasury Solicitor (TS)
Wales, Principality of (WALE)
Wards & Liveries, Court of (WARD)

「抗戰前大學教育研究」計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最近通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之「抗戰前大學教育研究」計劃，該項計劃預定自七十五年六月展開，為期一年，目的在研究北大、清華、中山三校在抗戰前政治、社會激變衝擊下教育目標、課程、師資、學生等方面之變遷及其特殊的教育與學術成就，以供當前大學政策之參考。負責此計劃者為近代史研究所蘇雲峯、黃福慶、楊翠華等三位研究人員。



書 評

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評析

□□ 蔣 永 敬

書名：民國初年的政黨

著者：張玉法

出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四九），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初版。

頁數：正文：四五九頁，附錄、書目、索引：一二四頁。

一

張玉法先生（以下簡稱著者）近著之「民國初年的政黨」，是其二十年來進行民初政黨研究計畫的結果。爲了奠定此一研究的基礎，著者在民國六十年及六十四年先後完成「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的研究。著者過去兩大著作，享譽士林，評價至高。再經過十年的磨琢，而完成此一著作，自是值得注視的一項成就。

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全書分爲六章，依次爲：民初對政黨移植問題的爭論、民初政黨的勃興及其派別、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比較、政黨競爭與國會政治、政黨對內閣及制憲問題的態度、結論。每章各分二至五節不等，各有重點。結論係前述各章的綜合分析與論斷。全書結構嚴密，體系清楚。內容豐富而不繁瑣，細緻而不零碎。這雖是著者對問題處理的一貫作法，但對民初政黨問題，卻不單純。因爲民初的政黨不但紛亂與龐雜，而且變化無常，瞬間萬變，要想把這許多政黨的變化，處理得有條不紊，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而本書卻對民初各政黨派別的演變與分合，及其對國會、內閣與制憲等問題的關係，卻處理得井然有序。這實在是著者對民初政黨的研究，一大貢獻。使一般對民初政黨的認識，由表面的常識性的了解，進爲有系統的學術性的知識。這是本人讀完此書後，所獲得的初步印象。

二

關於民初對政黨移植問題的爭論，為探討民初國人對政黨制度的認識與評價，從而了解民初政黨發展的思想因素。著者從四方面來探討這項問題的爭論：一為民主先進國家的政黨制度，如英、美、法、德、日本等國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久為國人政黨知識的主要來源。此類知識移植的結果，著者認為有其缺失，亦有其收穫。缺失方面，是介紹和移植的人，大都知識有限，未盡了解西方政黨制度的精神和發展過程，甚或忽視中國對政黨制度的準備程度。收穫方面，對移植問題有過激烈的討論，不僅增進國人的政黨觀念，且對中國政黨制的建立有影響力，民初政黨之組合，有了脈絡可尋。

二為清末民初國人的政黨觀念，著者依據資料，分為政黨之「有無」、「目的」以及「種類」三個問題。「有無」問題，又分三派意見，即政黨不能有，政黨不可有，政黨為憲政之子。「目的」問題，分為四派意見，即對抗政府，政黨政治，統一輿論，指導國民。「種類」問題，分為三派意見，即民、吏兩黨，南、北兩黨，保守、激進兩黨。

三為民初對政黨移植之反對與贊成論。反對移植論者有四種論調，即無黨論、不黨論、反黨論、毀黨論。贊成移植論者亦有四種論調，即改良論、毀黨造黨論、調和息爭論、反調和論。以上各種論調的由來、理由，及其代表人物，著者均有列舉。

四為贊成移植論者努力的方向，分為三方面，即闡釋政黨的定義及作用；剖析政黨內部的組織；標舉兩黨制度的優點。

以上為著者處理民初國人對政黨移植問題爭論的要點。從多方面的探討，而歸結到兩黨制度，作為以下各章探討政黨問題的基礎。

著者認為兩黨制度之被接納，是在政黨此伏彼起、政局動盪不安的情況下，政黨領袖及政論家為謀政黨政治的常軌，多主張建立兩黨制度。實際的發展亦有此趨向。此種理論與實際相應合的歷史現象，乃基於兩種背景：一為清季的革命派與立憲派在民初仍為政治運動中的兩大勢力，立憲派大抵依附舊官僚，而革命派尚能獨樹一幟；一為南京臨時政府形同同盟會一黨專政，南京臨時參議院中亦惟同盟會佔絕對優勢，激起反同盟會派的結合。

但另一歷史現象永不容忽視的，即清季的革命派與立憲派，都曾企圖利用或拉攏清廷的權力中心人物袁世凱，反為袁氏所制。民初政黨的起伏與變

化，亦何嘗不是圍繞著袁氏的問題。著者對此雖未特別強調，但涉及袁氏問題者，在著者的敘述中，仍是隨處可見。

三

關於民初政黨的勃興及其派別，著者爲了全盤了解民初政黨的狀況，對於具有政治性的黨會，作了全盤的調查。就調查所得的三一二個政治性的黨會，就其分佈的地區、成員、主張加以統計分析，所得的重要現象之一，是「紛亂與龐雜」。分析其政治因素，約有兩方面，一爲假政黨爲爭奪權利之具；二爲政治樹立對抗力。

在許多政黨中，著者把民初國會（含臨時參議院）中的一些政黨，大體區分爲激進與保守兩派。區分的標準，各有三項。所謂激進派的政黨，意義有三：一、它是與政府對立的；二、政綱超越政治傳統，但切實易行；三、其運動力是引起社會的廣泛關切。保守派政黨的意義是：一、擁護或依附政府；二、政綱精神不脫離政治傳統；三、運動方向以官界和上層社會爲主。

依據以上標準，著者把臨時參議院中的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稍後的國民黨，以及正式國會中的國民黨和民憲黨等，列爲激進派的政黨。臨時參議院中的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以及正式國會中的進步黨、公民黨、大中黨等，列爲保守派的政黨。

經過分派的各個政黨，著者依次就每一政黨的歷史、成員、組織、政綱等，作了清楚的交待。

著者把國會中的政黨，大體區分爲激進、保守兩大派，所取標準，顯然是依據一般民主國家政黨制度的觀念。實際上，著者所採取的區分標準，一爲對政府的態度；二爲政綱；三爲運動力或運動方向。以這三項標準來劃分民初國會中政黨的激進與保守之別，似有格格不入之嫌，即以對政府態度而言，與政府對立者被列爲激進派的政黨，擁護或依附政府者被列爲保守派的政黨，這就有商榷之餘地了。按民初（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北京政府的制度，在形式上，是依據臨時約法而建立的，即所謂「內閣制」，從唐紹儀內閣而至熊希齡內閣，無論其實質如何，而這些所謂「內閣」，在形式上或法定上，都應是政府的主體。都與國會（含臨時參議院）中的政黨有密切之關係。如以「內閣」爲政府的主體或一部份，來看政黨對其反對或擁護的態度，區分其激進或保守，便不恰當了。如唐紹儀內閣是受激進派同盟會的擁

護，卻受到保守派政黨的反對；趙秉鈞內閣亦是受激進派國民黨的擁護而成立的。縱是保守派進步黨所擁護的熊希齡內閣，也是受激進派國民黨的支持。至於以政綱來區分激進或保守，也容易模糊不清，即以著者所舉臨時參議院中的激進派同盟會和保守派統一黨的兩黨政綱來比較，「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為同盟會之「主張男女平權」而未見統一黨提倡的，到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亦予放棄。至於第三項的運動力或運動方向的區分標準，似更難以捉摸。

四

民初國會一度形成國民和進步兩大政黨。雖然維持不久，卻是民初政黨發展最有生氣的一個階段。著者以政黨袖領、組織與運動、地方勢力三大要項來對國民黨與進步黨作一比較，頗有意義。以政黨領袖看，國民黨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為代表；進步黨以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為代表。雙方代表領袖人物均甚恰當，一望而知雙方即有顯著的差異，前者為現代型，後者屬傳統型。組織與運動，則從黨綱、宣傳、組織、黨員、黨費等項來加以比較。其比較的方式，是按照上列各項採取兩黨分別敘述的方式。不易看出兩黨各項的相同或相異之處。如果各項採取兩黨混合敘述的方式，兩黨異同的表現，可能較為顯著，而不致有重複敘述之嫌。

地方勢力的比較，最為精彩。以省區為比較的單位，以都督（軍政權）和國會選舉的結果作為勢力比較的標準。經過比較及分析，所得的現象是：以都督政治傾向分，廣東、江西、安徽、福建、湖南五省屬國民黨；雲南、貴州、湖北三省屬進步黨；廣西、江蘇、浙江、四川、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十四省屬袁世凱。因進步黨擁袁，故擁袁者有十七省，國民黨（反袁者）五省。就國會選舉結果分，國民黨佔優勢的省區，有廣東、廣西、雲南、江西、安徽、浙江、湖南、陝西、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十一省。其中有廣西、雲南、浙江、陝西、奉天、吉林、黑龍江等七省的軍政權屬於擁袁派；進步黨（擁袁派）佔優勢的省區，有貴州、江蘇、福建、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甘肅、河南、新疆等十一省，其中有福建一省的軍政權屬於反袁派。

國民黨在進步黨及袁系省份中議員選舉獲勝的原因，著者認為一是國民黨的組織力和運動力較統一、共和、民主黨為強；一是選舉時，為國民黨拉

擁舊官僚及袁氏之時，擁袁派對國民黨尚無敵意。但反袁派的建福省爲何被擁袁派的民主黨佔取優勢，著者沒有說明原因。

五

政黨競爭與國會政治，是全書的重要部份，篇幅亦多。內容分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時期，臨時參議院時期，正式國會選舉與議員背景分析，正式國會組織與政黨對峙大勢，及正式國會停閉及其善後。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爲武昌起義後獨立各省所派代表之集議機構，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漢口首次集會到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正式成立爲止。代表的集會活動，分赴鄂、留滬及到南京，主要成就有議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漢口），推舉大元帥、副元帥（上海），選舉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及代行臨時參議院職權（南京）。時間雖短，代表的更迭至爲頻繁。

臨時參議院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八日成立到次年四月八日正式國會集會爲止。元年四月五日以前在南京，四月八日以後遷至北京。在南京時期的參議員皆同盟會員，無黨爭可言，地域之爭則時有所見。地域之爭則有兩方面，一爲南北之爭，一爲寧漢之爭。參議院北遷後，係依據新頒之臨時約法行使職權，議員亦多新選。故議員成份與職權，與南京時期不同。重要政黨亦次第形成。初期同盟會，共和黨勢力最盛，統一共和黨則立於第三黨之地位，三黨競爭亦烈。但自元年八月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並支持袁之親信趙秉鈞的「內閣」，而共和、民主、統一各黨亦以擁袁的關係，黨爭趨於緩和。

正式國會自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四月八日開幕至次年一月十日被宣佈解散，只有九個月的壽命。但其實際活動，不過七個月。正式國會含參、眾兩院。兩院議員選舉經過合法律的依據，議員產生的名額，選民的資格與人數，選舉的方法與選舉的實況等，著者均有說明。對選出兩院議員背景的分析，分年齡、學歷、經歷、黨籍四方面。所得結果，著者認爲兩院議員在年齡上、學歲上、經歷上和黨籍結構上，均無很大的差異。在年齡上，眾院議員平均年齡較輕，但與參院議員相差不足一歲。在學歷上，參眾兩院議員所受的新式教育各約佔三分之二，所受傳統教育各約佔三分之一。在經歷上，眾院來自議員者較參院多百分之六，來自官僚者較參院少百分之六，來

自教育行業者比參院多百分之三。但兩院議員的職業背景皆以議員、官僚和教育行業為主。在黨籍上，國民黨在兩院均居優勢。

正式國會組織與政黨對峙大勢，是本章重點所在。著者從三方面來探討之：一為議長及委員會選舉中的政黨競爭，參議院議長、副議長的競選，採取記名法，便在監督黨員。結果議長為張繼、副議長為王正廷所得，均屬國民黨。眾議院議長、副議長的競選，採取無記名法，便在收買他黨黨員，結果議長為民主黨湯化龍、副議長為共和黨陳國強所得。著者認為：國會選舉結果，國民黨勝利。眾議院內民主、共和、統一三黨聯合，與國民黨勢力相若；參議院內雖三黨聯合，國民黨仍佔優勢。著者此一說法，尚待商榷。眾院中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聯合亦不過一四四席，與國民黨之二六九席相差尚遠。且湯、陳之得票數，分別為二七九及二六九票，超出三黨聯合的票數，將近一倍。顯然是採取無記名選舉法得自收買他黨選票的結果。

次為政黨與眾議院議事的關係，其爭議最烈者為宋教仁被刺案、奧國借款案、大借款案、俄蒙協約案、國民黨起兵案、預算案。該院中的重要黨派衝突，多發生在國會成立之初至國民黨二次革命期間。二次革命失敗後，進步、國民兩黨有轉趨聯合共同立法之趨勢。三為政黨與參議院議事的關係，以大借款及與二次革命有關者諸案爭執最烈。二次革命的爭執，眾議院擁袁黨派所提的征討案，和參議院國民黨所提的袁氏退位案，皆因敵黨的杯葛而不能成立。黨派利益左右其間，實甚明顯。

正式國會停閉及其善後，是一向被忽略探討的問題。著者從袁氏下令追繳國民黨籍議員證書、徽章到正式宣佈解散國會的過程，作了清楚的交待。並分析殘留議員挽救國會之法，分維持說與改組說，而維持與改組之說又各分三派。然袁對國會早有謀算，即不維持、不解散、不改組，只製造並利用輿論，處理殘餘議員，遂為御用的工具。

六

政黨對內閣及制憲問題的態度，分為兩大部份，一為政黨態度與內閣演變，一為政黨對制憲問題的爭論。

民初依照臨時約法所建立的「內閣」有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熊希齡等四任「內閣」。這些「內閣」，都不是「純」政黨內閣，也都談不上是責任內閣。唐內閣是同盟會與袁合作下所建立的「混合內閣」，受到擁袁派

共和黨的攻擊與袁的不合作而瓦解。陸內閣是所謂「超然總理混合內閣」，在任期間，正當同盟會、共和黨競爭激烈時期，大部時間在解決組閣問題。趙內閣是在國民黨與袁妥協下所產生的「內閣政黨」，維持一個穩定時期。迨宋案發生，趙失國民黨信任，其內閣亦呈不穩之勢。熊內閣為進步黨與袁合作下所產生的「混合內閣」。由於二次革命之後，國民黨勢孤，亦轉而支持之。迨國民黨被解散，國會停頓，熊內閣失去監督作用。

政黨將制憲問題的爭論，一為程序問題之爭，一為憲法內容之爭。關於制憲的程序，國民黨主張憲法之起草，由國會產生起草委員會，而由兩院議決；擁袁派反對由國會起草，主張另設起草機關。國會開議後，以國民黨佔優勢，通過憲法應由國會制定。另一程序問題為先定憲法抑先選總統？國民黨主張先定憲法；擁袁派的共和、統一、民主三黨主張先選總統。前者據法理，後者據事勢，本案國民黨的主張失敗，因事在二次革命之後。關於憲法內容之爭，國民黨主張擁護國會的權力；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及其他擁袁勢力主張擁護總統的權力。在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問題上，國民黨與進步黨（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併）皆主內閣制，袁主總統制。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爭，以及國權與民權問題之爭方面，擁袁黨派主張前者，國民黨主張後者。著者以為此類爭論，部分仍是清末君主立憲派與民主立憲派爭論的延續。

政黨對制憲問題的爭論，在二次革命後有所改變，國民、進步二黨為合力完成憲草，立場大體一致。袁派攻擊憲草受國民黨操縱，著者認為並不符合事實。袁之下令解散國民黨，主要目的在破壞不利於己之憲草。

七

結論，係就政黨觀念、政黨派別、國會、內閣、制憲等方面，論述民初政黨政治的性質與意義。實為全書重點的綜合總檢討，頗多精闢之見。儘管著者對民初激進、保守兩派政黨分類的標準與意義是依據西方民主國家政黨制度的觀念，但對實際掌權的中心人物袁氏而言，仍有其特定的意義。講到激進、保守兩派政黨在民初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著者就指出：「就激進派政黨本身而論，在袁世凱權傾一時仍能繼續發展，雖在受武力彈壓之後亦能再接再厲，證明自一八九〇年代以後所興起的革命勢力和改革勢力，並不因為政治環境有利而懈怠，也不因為政治環境不利而退縮。」至於講到激進、

保守兩派政黨在政府中的地位及對政府的態度問題，著者認為：「除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由同盟會執政外，民國初建的時期並無執政黨，當時無論激進黨派、保守黨派均屬在野。但對政府的態度而論，激進黨派是監督政府，並時思由政府手中取得政權；保守黨派是依附政府，或冀為政府所用以申黨見於一、二。」因為著者以總統為政府的實體，故作是論。不過在法令上及形式上，北京政府是「內閣制」，組閣的政黨，或參加內閣的政黨，甚或某一黨魁出任國家的副元首，如果列為「在野」，或分為「激進」、「保守」之類，便有點障礙了。

此外，本書既名「民國初年的政黨」，而書中利用年號概用公元，極少見到民初年號，易使讀者缺乏「民初」感。

近史所新出專刊

④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

定價精500元
平450元

本書對民初各政黨派別的演變與分合，及其對國會、內閣與制憲等問題的關係，處理得井然有序。這實在是著者對民初政黨的研究一大貢獻，使一般對民初政黨的認識，由表面的常識性的了解，進為有系統的學術性的知識。

——蔣永敬

⑤朱滋源著：同盟會的革命理論

定價精350元
平300元

今天回顧辛亥史事，其於帝政既倒，民國甫肇之時，無法立即完成穩定的政治與社會民主，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基本的，似仍在政治文化的轉型無法立竿見影上面……本書的核心關懷，就在系統描繪同盟會革命理論的結構與內涵，以了解偏差所在，並且試著提出一些檢討性的意見。

——作者自序

⑥魏秀梅著：陶澍在江南

定價精300元
平250元

本書搜集有關陶澍的材料極為豐富。史事分析，至為明確……全書論斷至為允洽。我希望凡研究現代化歷史的學者，都一讀此書。許多有關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想都要以本書提供的事實為基礎，才能進一步綜合討論。

——劉廣京

※直接購買照定價七折出售，請利用郵政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號劃撥。

評介胡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

趙中孚

作者：胡平生

書名：民國初期的復辟派

出版時間：民國七十四年七月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頁數：六二七頁

民國成立以後，有兩股本質相同但形式略異的政治逆流，爲民主共和的發展帶來相當程度的挫折。這兩股政治逆流，一爲清室復辟，一爲袁氏稱帝。在本質上，二者同爲反民主共和制度，妄圖抗拒歷史發展定則的開倒車作爲。在形式上，前者希冀恢復滿清皇統，重拾愛新覺羅萬世一系的美夢；後者則企圖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用另一個王朝取代新生的中華民國。這兩股政治逆流，在民國史上都造成巨大影響。

從表面上看，所謂「清室復辟」事件似乎僅是曇花一現的鬧劇，並未動搖民國根本。但實際上，發生於民國六年的宣統復位事件，只是一個廣義的反動政治復辟運動的表徵，而非全部內涵。這一運動有它源起的背景和複雜的醞釀過程，也預伏了深遠的後遺症。參與這一運動的，也不僅限於少數皇室成員、遜清遺老、和野心政客軍閥，以日本爲主的帝國主義國家，也在背後推波助瀾。從民國元年清帝退位，到民國二十年遜清廢帝溥儀擔任僞「滿洲國」的所謂執政（其後改爲「滿洲帝國」的皇帝），這一運動始終在中國政治動盪不安的情況下賡續發展，最後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支配利用。

如果把復辟運動作爲一個單純的反動政治逆流來看，可能還不够周延。它不但代表了一部分社會成員對傳統價值與秩序的執着情緒，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在新舊交替時的矛盾本質。爲了掌握復辟運動的意識型態和瞭解它的歷史意義，對參與復辟運動的人物、組織乃至於活動加以分析是必要的。胡平生教授這本「民國初期的復辟派」（下簡稱胡著復辟派），爲讀者提供了民

初以來復辟運動背景和影響的深入探討。在同類著作中，本書的份量應該是最重的。

胡著復辟派全書共六二七頁，由臺灣學生書局於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出版。內容方面，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五章，涵蓋時間概略起自民國元年，迄於民國二十一年。全書處理方式，也大致循編年軌迹，以民國元年至四年、民國六年、民國十三年、民國十七年、及民國二十一年為述析重點。換言之，從復辟派的產生背景，到與復辟活動有關的重大事件，乃至後來偽滿洲國的出現，均為本書處理範圍。就時序及內涵言，本書題日用「民初復辟派」，顯然略嫌狹窄。

作者對「復辟」及「復辟派」首先作了界說，所謂「復辟派」，凡參與復辟策劃與行動，或曾以文字言論宣達此項意圖的人士均屬之。在這一前題之下，所謂復辟派的涵蓋面是相當廣的。作者在第一章中，對復辟派的形成和背景有詳盡的敘述。概略畫分，所謂復辟派包括了宗社黨，保皇會份子，遜清遺老，舊官僚羣等四大類。作者就以上四類復辟派人士，分別作了或繁或簡的分析。其中對宗社黨的成員活動及其地理分佈所用篇幅最多，也同時探討了宗社黨與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的關係。遜清遺老部分，作者除述析他們的活動方式，並詳列有關人士姓名及居處外，也描述了他們投老悲吟、不能自己的末世心態。保皇會分子的處理略嫌簡略，以康有為晚年在海內外的奔走聯絡來說，可資敘述者尚多，若併同康有為本人對復辟運動的感受和參與心態，可寫的尤其不祇三五頁篇幅。至於舊官僚羣部份，作者僅以張勳、馮國璋、徐世昌三人為取樣代表，稍嫌偏枯。若能輔以具有代表性人士的名單或分類統計，則更具參考價值。

第二章敘析的重點，為討袁護國前後復辟派的活動情形。袁世凱僭制稱帝前後，復辟派的立場反覆曖昧，本章除對部份復辟派人士冀藉討袁為名，實現復辟美夢有重點探討外，對民國五年的流產復辟及所謂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也作了詳盡述析。第三章及第四章處理的主題為「丁巳復辟」始末，可以說是本書的重點所在。第三章第一節對張勳在四次徐州會議的角色有詳細評述；第二節則討論復辟派為實現復辟陰謀，先後與德日帝國主義接頭尋求外援經過。第三節則敘述張勳率軍北上經過。第四章除以大篇幅敘述丁巳復辟鬧劇的詳細始末外，也對段祺瑞一手導演下的「討逆」行動作了適切的描述和評論。復辟鬧劇落幕後的善後種切，以及丁巳復辟失敗的原因，本章中亦有所說明。作者認為復辟的失敗，其原因不外：輿論不容，內部不合，皖

段的聲討，以及日本暗助討逆軍。在第七節「民國重光」第四小節「復辟佚聞」中，節載當時報章新聞報導若干則。其中不乏饒富追溯真相價值之傳聞，而作者未予考證，僅以「佚聞」處理，似有未當。

第五章「復辟派的沒落與變質」，重點在檢討民國六年復辟失敗後復辟派心態的轉變，民國十三年馮玉祥發動所謂「首都革命」後驅逐遜帝溥儀出宮，民國十七年又發生東陵盜掘事件，在在均使以溥儀為中心的宮廷復辟派份子感到曲屈失望。在不斷累積的挫折情緒下，復辟派遂把希望轉寄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先是，在日本軍部特務的安排下，廢帝溥儀於十三年出宮後寄居天津張園。民國二十年瀋陽事變後，溥儀又在日本軍部特務掩護下，由天津問道赴大連，轉身一變成為日本卵翼下的東北偽政權「滿洲國」攝政。一年以後，溥儀終於一了「復辟」心願，登上「滿洲帝國皇帝」的傀儡寶座，為民國以來的所謂復辟運動，作了悲劇性的總結。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復辟活動只是一特定團體少數人奔走的活動。它不像清末的革命運動，能得到全民性的迴響。加以復辟的本質在於恢復舊制，是消極而退守的；革命的本質在開創新局，是積極而進取的。在氣勢方面，復辟派遠遜於革命派。民國成立以後二十年間，復辟派屢遭挫敗，未能有成，本不足為奇。不過部份復辟派份子雖然冥頑不靈，但卻始終如一，至死不渝。其心可悲，其情可憫，自不宜過份苛責，以失公平。」從單一的、平面的歷史發展模式看，民初以來的復辟運動的確是一股開倒車的政治逆流。它的源起和發展，反映了傳統政治倫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力。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推波助瀾和利用，這一「運動」注定會在新潮流中無疾而終。不幸的是，當復辟迴光返照之際，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推行侵略滿蒙計畫之時。因此，大作復辟美夢的復辟派積極份子，竟然走火入魔，作了帝國主義的馬前卒，也作了萬劫不復的民族罪人。說這些人「其情可憫，其心可誅」，似乎更為恰當。

胡平生教授這本五十萬言的大作，有以次的幾個特點：第一，全書雖然以復辟派的人物、組織、活動為探討重點，但對與復辟運動有關的史實也作了詳盡的交代。因此，把本書視為以復辟運動為軌線的「民國初期歷史」也不為過。事實上，本書不僅是一部高水準的專題研究著作，也是一份研習民國初期歷史的參考教材。

第二，本書參考及引用資料相當豐富。據書後所附書目及文內所附註文，本書引用之史料、公報、報紙、雜誌、專書、論文，暨英、日文專書論

文等計三百零八種，雖經參考但未引用之中、日、英文專書論文等計三百零七種，兩共六百一十五種。引用資料部份，頗有海內不易覓致但卻為研究復辟運動不可或缺的自敘及日記手抄本等文獻。公報及報紙雜誌的蒐集參閱，尤稱詳盡。作者在緒言中雖說明可資利用的復辟檔案資料過少，但就全書註文查證，作者在數百種中外文資料中爬梳排比所得，已可補復辟檔案文獻之不足。

第三，全書採夾敘夾議方式撰述，每遇相關重要事件，則從記事本末體例處理，如「甲子溥儀出宮事件」、「戊辰東陵盜寶案」、「滿洲國的成立」等。循此一體裁著述，在結構上雖略嫌臃腫繁瑣，但史實交代清晰。若併同文字簡潔雋永，則適足增加全書的可讀性。

除了前面所提及各章的細微值得商榷之處外，本書可能在研究和撰寫方式上引發不同看法。晚近歷史研究有趣向於科際整合之勢。如果從這一角度看，胡著「復辟派」在理論架構和資料選用、史實與價值、方法論與資料處理等方面，均不出傳統敘述和結構主義的制度分析兩個範疇。熱衷於結構功能或行為科學論的學者可能對本書稍感失望。相反地，對具有傳統史學訓練，崇尚治史務實的學者，對本書或有深得我心之感。東西方史家治史本有基本態度的差異，若併同方法論的分歧，任何主觀評判都沒有實質意義。就本書而言，我們最好在傳統治史的範疇中欣賞作者的功力和素養，肯定作者的造詣和貢獻。

胡著「復辟派」是一本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也是一部可讀性極高的民國史參考讀物，我特別向有志治民國史的學者推薦它。

• 會議消息——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 •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預定八月下旬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會期三天，初步約稿結果，將有三十多篇論文提出討論。

柯著：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 張朋園 •

Paul Cohen (柯保安),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3 pp.

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以日本、歐洲、美國最有成就。日本是全面性的研究，著作豐富，是了解中國最深入的國家。歐洲有一個漢學傳統，對中國的文化和語言文字頗有探討。美國姍姍來遲，二次大戰之後才投入大量的金錢和人力，成果亦甚可觀，頗有後來居上之勢，他們的最大成就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柯保安先生這本新著，將美國戰後近四十年的研究成果做一總的評估，扼要敘述，條理分明，值得一讀。

美國人看中國歷史，傳統與近代二分。他們將中國的近代史納入歷史系，將傳統時代納入語言與文化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兩者各不相涉。我始終不太了解為什麼要這麼分法。或許他們認為語言與文化原屬漢學研究的範圍，而近代中國才是世界體系的一環。唯近年這樣的二分法已經維持不住，研究近代史的人為了作全面性的了解，不得不跨越範圍，不得不把界限打破。但由於他們在近代史方面投下的人力與金錢最多，近代史的研究成果相當突出，確實值得作一回顧性的檢討。

柯保安教授用四個主題來歸納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一)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二)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三)帝國主義的真實面貌；(四)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這四個主題簡單而又扼要，同時反映了美國的中國研究發展內涵。西方人研究中國近代史，首先注意到的必然是東西方接觸的問題。西力東漸，為什麼日本應付得那麼成功，而中國則完全失敗？一九五〇年代前後的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這一個問題上。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教授是這一個問題研究的代表人。費氏用「顯著的墮性」(Remarkable inertia)一辭來形容中國之情境，此一情境無法應付西方的挑戰。他的門徒如Mary Wright, Joseph Levenson, Albert Feuerwerker 等人幾乎完全循著費氏的觀點解釋中國的衰弱與不能振作，一致認為儒家思想不足以應付外來的壓力。他們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派。

解釋費正清學派為什麼會有這一個說法。柯保安教授說這是受了十九世紀西方對中國看法的影響。西哲 Johann G. von Herder, Georg W. E. Hegel, John S. Mill 等人一反十六七世紀稱道中國的傳統，改口說中國是停滯的。Ralph W. Emerson 更是把中國比成一個木乃伊，空有三千年悠久的傳統。西方人對中國看法的轉變，是因為西方有工業革命、重商主義，他們用進步的觀念來衡量社會的演進，中國人當然是不夠進步的。所以費正清學派說「中國只是在傳統中小有變遷，」「中國的傳統難於現代化」；面對西方的挑戰，只求保持傳統，沒有突破性的轉變；被西方打敗，簽訂不平等條約，一切咎由自取，怨不得西方。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中國研究氣氛轉變了，尤其是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之後，年輕一輩的學者對於「西力衝擊」的觀念改變了。原先費正清學派認為非西方社會不足以現代化的說法遭受他們的拒斥，他們進而將「西力衝擊」相等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有一位名不見經傳叫 James Peck 的年輕人寫了一篇提為「話說從頭論美國中國通專家的意識型態」(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正面攻擊費正清的看法完全是帝國主義式的。Peck 描繪帝國主義者的面目猙獰、心狠手辣，同時歎息中國人對帝國主義者沒有正確的估計，一再被打敗，割地賠款，喪失權利；資源被賤價買去，製成品高價賣回。最嚴重的是中國在這種壓力下，形成了心理上的不能競爭，中國幾乎難於生存。

Peck 的發難使美國的中國研究為之一變，類似的著作相繼推出，使費正清學派處於劣勢。到了一九七四年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理論出來，有如火上加油，費正清學派受到更大的壓力。按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內涵係接受了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 的「中心——邊緣」(core-periphery) 說，馬列的帝國主義說、中南美研究所獲致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說綜合而成。所謂的世界體系，是中心剝削邊緣，邊緣依賴中心，已開發的國家壓榨未開發

的國家，也就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發展型態。有一位叫 Frances Moulder 的學者，著「日本、中國及現代世界」(*Japan, China and Modern World*, 1979)，借用 Wallerstein 的理論，說日本因為受外來的牽制小，所以能及時現代化，中國受到的牽制大，所以難於現代化。

美國的研究發展至此，再度面臨轉變的時刻。費正清的應付不當說，帝國主義說，或許都是中國不能及時現代化的原因，但絕不是僅有的兩個原因。中國內部本身的情況如何？應該先了解中國的內在因素，因此走到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時代。Philip Kuhn 一馬當先地推出「清末的叛亂及其敵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0) 一書，指出中國十六七世紀以來，已經有了轉變，如大量的人口增加、物價上漲、金融經濟體系增強，鄉村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競爭……這些顯示中國的內部是有變化的。Kuhn 的研究指出了一個方向，要了解中國的內部才能了解中國現代化遲滯的原因。近十餘年來，這一個趨勢有強勁的發展，許多學者已經放棄他們原先研究的方向，改而研究中國的內部問題，這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之所指。

以上大致是柯教授全書的主題與內涵。綜合起來，費正清是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開山祖師，他在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的「刺激——反應」架構下建立了他解釋中國現代化這一個癥結問題的一套說法，影響他的第一代門生繼續討論儒家傳統，認為儒家思想不足以使中國現代化。費氏的第二三代門生起來，有的反對其師之說，認為中國現代化是受了帝國主義的阻礙。兩種說法爭論不休，許多學者覺悟到中國內部因素的重要性，轉而從事以中國本身為中心的研究。四十年的美國中國研究就是如此的。

讀了柯教授的書，不能不佩服他的炯炯眼光和歸納分析的能力，尤其條理分明，更是難得。下面提出幾點意見與柯先生討論，亦請方家有以指教。第一、費正清學派認為中國傳統停滯不進之說，係受了 Herder, Heger, Mill 等人的影響，此似無可疑。但我認為這只是費派觀念形成的因素之一，或許是一個次要的因素。任何一種學說的建立，常常與流行的學術時尚密切有關。現代化的研究，在一九五〇年代大行其道，最先的理論家大都認為非西方社會的傳統不足以發生現代化的動力；不僅不能發生動力，往往產生阻力。我認為費派的理論基礎係建築在當時美國的社會學理論上面。一九六〇年代下半以來，現代化理論家漸漸改變，認為傳統不僅不會阻礙現代化，往往有助於現代化的發展，美國的中國研究趨勢又隨著改變。今天已少見指責

儒家思想阻碍現代化的人。這種發展實與社會科學的潮流有關。

美國人有自由主義的傳統，然而一九五〇年代卻是極端的反馬克斯主義，此從麥加錫主義（McCarthyism）的升起，可以得到明證。到了一九六〇年代，美國人得到了研究馬克斯的自由，許多學者，趨之若鶩，以馬克斯的理論解釋歷史現象，流風所至，也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研究。故左派歷史學家的興起，不完全是反越戰情緒的影響，或者應該說反越戰的情緒本來就受了馬列主義的影響，反越戰的情緒助長了左派中國學者的氣焰。今天極大多數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接受一部份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例如「以中國本身為中心的研究」，那些討論叛亂、秘密會社、大眾文化、下層社會等的學者，其理論無不受馬克斯思想的影響和左右。展望未來的研究趨勢，馬克斯的理論還會繼續有其影響力。

柯教授對於美國近四十年的中國研究似乎並不滿意，他指出中國的文字相當困難，要突破這一困難做一個中國專家實非易事。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是相當同情的。但當我看到近十個研究中心都有幾十種專刊出版，哈佛大學更是一枝獨秀，超過了二百餘種，不能不為美國的中國研究慶賀。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大多甚為精細，而且廣泛接受科際知識的輔佐。他們對某些歷史事件的解釋，是我們中國人所不能做到的。但柯教授沒有提及在美國的華裔學者所扮演的角色。一九四九年中國大變動之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流亡美國，在那兒定居下來，著作中國歷史，有一些作品極有水準，可以藏之名山，傳之久遠。他們提昇美國的中國研究水平，似乎有一定的作用。

再者，中國本土歷史學家的著作對於美國學者有什麼影響？中國的歷史學家喜歡閱讀西方學者的著作，同樣的西方學者也閱讀中文的著作，柯教授大著中的中心議題，如西力衝擊、帝國主義、現代化……也都是中國學者所密切注意的，兩國間學者的互動如何，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希望柯教授將來能加以評估。

我最後的一個感想，美國近四十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絕非後來的就比前面的好，或者後來的就能推翻前面的。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自然不是「刺激——反應」架構所能全面涵蓋，但忽略了西力東漸的影響，亦無從解釋中國近代變遷的由來。帝國主義當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阻力。儒家思想是否具備應變的能力，目前尚難獲得答案，有待關心的學者繼續努力。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1953~1986)

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博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何烈	清咸同時期的財政(一八五一~一八七四)	夏德儀	六十二年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樂炳南	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李守孔	六十五年	
張永堂	方以智的生平與思想	方豪	六十六年	
林能士	辛亥革命時期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	李守孔	六十六年	
陳華	清代咸同年間山東地區的動亂——咸豐三年至同治三年(一八五三~一八六四年)	李守孔	七十一年	
許雪姬	清代臺灣武備制度的研究——臺灣的綠營	楊友濂	七十二年五月	
胡平生	復辟派在民國	李守孔	七十三年	學生書局，書名易為民國初期的復辟派，七十四年七月

(二)碩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陳大端	清乾嘉時代的中琉關係		四十二年	
任長正	清太宗時代明清和戰考	李宗侗	四十五年	
張存武	清太宗時代的滿鮮關係	李宗侗	四十六年	
陶天翼	甲午之戰		四十六年	

吳衛平	八旗制度之研究	李宗侗	四十七年	
施璧倫	出島荷蘭商館日記	陳荆和	四十七年	
黃培	雍正朝的政治與軍機處		四十八年	
杜維運	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	李宗侗	四十八年	臺大文史叢刊
陳捷先	滿洲叢考	李宗侗 廣祿	四十九年	臺大文史叢刊
劉家駒	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	李宗侗	五十二年	臺大文史叢刊
王家儉	魏源對西方認識及其海防思想	李宗侗	五十二年	臺大文史叢刊
孫會文	梁啓超的民權與君權思想	夏德儀 李定一	五十四年	臺大文史叢刊
石錦	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		五十五年	
劉翠溶	清初順治康熙年間的國用與收入	李宗侗	五十五年	嘉新文化基金會
查時傑	從越縵堂日記看晚清的清議	夏德儀	五十五年	
劉景輝	滿洲法律制度的演變	李宗侗	五十五年	
龔忠武	近代中國之變遷及其分析（一九〇五～一九一四）	許倬雲	五十五年	環宇、百傑出版社
黃富三	劉銘傳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研究	楊雲萍	五十六年	
張哲郎	清代的漕運	夏德儀	五十七年	嘉新文化基金會
花俊雄	民國元年至十四年的中國勞工運動	李守孔	五十七年	
張秀蓉	光緒初由歐返國人物的研究	方豪	五十七年	
何烈	清厘金制度之研究	李守孔	五十八年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莊吉發	京師大學堂	李守孔	五十八年	臺大文史叢刊
陳永發	清政府從海禁到護僑之演變	陳捷先	五十八年	
徐泓	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	夏德儀	五十九年	嘉新文化基金會
吳劍雄	馬歇爾使華的研究（一九四五～一九四七）	劉崇鉉	五十九年	

彭先進	段祺瑞與中國參加歐戰的研究	李守孔	五十九年六月	
曾祥鐸	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一九一九~一九二四)	李守孔	五十九年六月	
林能士	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一八九四~一八九八)	李守孔	五十九年六月	臺大文史叢刊
寇偉義	川黔滇軍政之中央化		五十九年九月	
劉元珠	華興會(一九〇三~一九一一)	李守孔	五十九年	
辛勝夏	甲午戰前中國朝野對朝鮮問題的看法	陳捷先	五十九年	
具良根	韓國東學黨亂事之研究	李守孔	六十年	
張勝彥	臺灣建省之研究	李守孔	六十年六月	
朱志騫	張謇的實業主張	李守孔	六十一年	
梁惠錦	光復會(一九〇二~一九一一)	李守孔	六十一年六月	
班一魯	拳亂前後袁世凱的處變	李守孔	六十一年六月	
林維紅	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一九〇五~一九一二)	李守孔 鮑家麟	六十二年六月	
趙綺娜	清初東北之駐防八旗	陳捷先	六十二年六月	
張永堂	方以智研究初編	方豪	六十二年六月	
古偉瀛	中國早期的電報經營	李守孔	六十二年六月	
段昌國	恭親王奕訢與咸同之際的外交與政治糾紛(一八五八~一八六五)	李守孔	六十二年六月	
胡平生	梁蔡師生與護國之役	李守孔	六十二年六月	臺大文史叢刊
唐德龍	羅克希爾與中國(Patrick B. Abernathy)	李守孔	六十二年六月	
張炎憲	清代治臺政策之研究	楊雲萍	六十三年六月	
高瑞穗	崔東壁與疑古史學	李守孔 杜維運	六十三年六月	
陳秋坤	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地區的開發	楊雲萍 李守孔 鮑家麟	六十四年六月	
劉石吉	清代江南商品經濟的發	李守孔	六十四年六月	

- 展與市鎮的興起
- 林滿紅 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之經濟社會（一八六〇～一八九五） 楊雲萍 六十五年六月 臺銀
- 陳華 捻亂之研究 李守孔 六十五年六月 臺大文史叢刊
- 胡映芬 傅斯年與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一九〇〇～一九五〇） 李守孔 六十五年六月
- 林瑞明 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 侯健 楊友濂 李守孔 六十六年 臺大文史叢刊
- 溫順天 瑪利諾會在華傳教簡史 方豪 六十六年
- 謝世芬 九江貿易研究（一八六一～一九一一） 李守孔 六十六年六月
- 陳欽國 廣州護法軍政府之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李守孔 六十六年六月
- 許雪姬 明清兩代國人對澎湖羣島的認識及防戍 方豪 六十七年
- 林聖芬 清代臺灣之團練制度 方豪 六十七年
- 黃安雄 山西票號與清代之金融匯兌——光緒二年至民國十三年 陳捷先 六十七年十二月
- 馮明珠 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一八七六～一九二三） 李守孔 六十七年
- 洪美齡 清代臺灣供輸福建米糧之研究（一七二五～一八六〇） 方豪 六十八年
- 張念平 清末的師範教育 李守孔 六十八年
- 李孝悌 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民國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 李守孔 鮑家麟 六十八年六月
- 曾華璧 閩錫山與民初政局 李守孔 臺大文史叢刊
- 周惠民 德國租界膠州灣研究 李守孔 六十九年
- 楊肅獻 晚清的反變法思想（一八九一～一九〇〇）——近代中國保守主義 李守孔 六十九年六月

	的一個分析			
陳國棟	清代前期的粵海關（一 六八三～一八四二）	方 豪 劉翠溶	六十九年	
廖秀真	清末之女子教育	李守孔 鮑家麟	六十九年一月	
徐平國	上海會審公廨探微	李守孔 王曾才	六十九年六月	
何懿玲	日據前漢人在蘭陽地區 的開發	方 豪	六十九年	
張舜華	臺灣官制中「道」的研究	方 豪	六十九年	
蔡慧玉	同治八年中英新約研究 ——一八六七年至一八 七〇年英國對華政策	王曾才	六十九年	
葉其忠	明鄭降清叛清官兵的研 究（一六四六～一六八 三）	方 豪 陳捷先	六十九年	
周婉窈	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之研究（一九 二一～一九三四）	李永熾 黃富三	七十年六月	
楊麗祝	晚清時期的岑春煊—— 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三 年（一九〇〇～一九一 一）	李守孔	七十年六月	
劉素芬	煙臺貿易之研究（一八 六七～一九一九）	劉翠溶	七十一年五月	
張淑雅	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 究	陳捷先	七十一年六月	
方惠芳	曹錕賄選之研究	李守孔	七十一年六月	臺大文史叢刊
藤井志津枝	一八七一～一八七 四年臺灣事件之研究	李守孔	七十一年六月	
赤嶺守	光緒初年琉球與中日兩 國之關係	陳捷先	七十二年五月	
沈松僑	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 新文化運動	侯 健 李守孔	七十二年五月	臺大文史叢刊
王汎森	章太炎的思想之研究	李守孔 李永熾	七十二年五月	時報出版公司，書名易為 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對 儒學傳統的衝擊

牛道慧	日本田中內閣滿洲政策之研究（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李守孔	七十二年五月	
王珮民	中日軍事協定與日本對華侵略之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李守孔	七十二年五月	
林地煥	四川鹽政的改革（一九一五～一九二〇）	徐 泓 劉翠溶	七十三年	
周雲錦	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觀	李守孔	七十三年	
陳淑銖	現代華中六省之農業金融（一九二七～三七）	劉翠溶	七十三年	
孫春在	清末的公羊思想	李永熾	七十三年	商務印書館
許鼎彥	山東的反袁帝制運動	李守孔	七十三年六月	
杜繼平	五四時期的反傳統思想	李守孔	七十三年六月	
李達嘉	民初聯省自治運動之研究	李守孔	七十三年六月	
韓嘉玲	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二九年五月	李守孔 許介麟	七十三年六月	
翁佳音	臺灣武裝抗日史研究（一九一五～一九〇二）	徐先堯 黃富三	七十四年六月	
薛化元	晚清「中體西用」思想研究（一八六一～一九〇〇）	李守孔 李永熾	七十四年六月	
紀欽生	晚清時期的端方——一位改革官僚的研究	李守孔	七十四年六月	

二、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 博士班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呂芳上	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的新思潮	張朋園	七十四年七月	
劉紀曜	梁啓超與儒家傳統	張朋園	七十四年七月	
林滿紅	清末社會流行吸食鴉片研究——供給面之分析（一七七三～一九〇六）	李國祁	七十四年七月	

(一) 碩士班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王文發	近代的墨學復興	王爾敏	六十二年五月	
許弘義	國學保存會研究	呂實強	六十三年六月	
林再復	咸豐年間的鹽政	李國祁	六十三年六月	
周天生	由基層地方官的幾項量化分析及職責看清代地方吏治	李國祁	六十三年七月	
鄭瑞明	清代越南的華僑	朱雲影	六十四年二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一種六十五年五月
劉德美	清代地方學官制度	王爾敏	六十四年六月	
江勇振	張君勱思想評述	王爾敏	六十四年六月	
呂芳上	朱執信與中國革命	李雲漢	六十四年六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三種六十七年六月
何耀彰	滿清治蒙政策之研究	李符桐	六十四年七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二種六十七年一月
蕭人英	譚嗣同的生平與思想	王爾敏	六十四年十二月	
陳炯彰	近代農業改革思想	王爾敏	六十五年六月	
黃秀政	顧炎武與清初經世學風	楊家駱	六十五年六月	商務岫廬文庫五十三號，六十七年十二月
王春美	姚瑩的生平與思想	李國祁	六十五年六月	
魏外揚	沈毓桂之生平與思想	王爾敏	六十五年十二月	
劉汝錫	憲政編查館研究	張玉法	六十六年六月	自行出版未知年月
李慶西	段祺瑞與民初政局(民國五年至九年)	張玉法	六十六年七月	
王 漪	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	李國祁	六十六年七月	
陳豐祥	日本對清廷欽定憲法的影響	林明德	六十七年七月	
溫振華	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	張朋園	六十七年七月	
鄭亦芳	上海錢莊的興衰(一八四三~一九三七)	王樹槐	六十八年六月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七)，書名易為：上海錢莊(一八四三~一九三七)——中國傳統金融業的蛻變，七十年十月
吳文星	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	林明德	六十八年七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

- | | | | | |
|-----|-----------------------------|-----|---------|--------------------|
| | 之研究 | | | 第八種七十二年元月 |
| 劉紀曜 | 預備立憲時期的督撫與仕紳——清季地方主義的再檢討 | 張朋園 | 六十八年七月 | |
| 雷慧兒 | 東北的豆貨貿易 | 王樹槐 | 六十九年一月 |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七種七十年五月 |
| 張瑞德 | 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一九〇五～一九三七） | 張玉法 | 六十九年五月 | |
| 陳銀崑 | 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 | 呂實強 | 六十九年六月 | |
| 張正昌 | 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 | 張朋園 | 六十九年六月 | 自行出版未知年月 |
| 蔡淵梨 | 清代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 | 李國祁 | 六十九年七月 | |
| 范毅軍 | 對外貿易與韓江流域的經濟變遷 | 劉翠溶 | 七十年五月 | |
| 黎華趙 | 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史學 | 李國祁 | 七十年六月 | |
| 唐遠華 | 基督教教會及其傳教方法在近代中國本土之發展 | 李國祁 | 七十年十二月 | |
| 劉妮玲 | 清代臺灣民變研究 | 李國祁 | 七十一年六月 |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九種七十二年九月 |
| 呂仁偉 | 浙江書院之研究 | 蘇雲峰 | 七十一年六月 | |
| 陳能治 | 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 張玉法 | 七十一年六月 | |
| 張淑芬 | 近代四川盆地對外貿易與工商業變遷（一八七三～一九一九） | 呂實強 | 七十一年七月 | |
| 吳志鏗 | 湘軍內部的維繫與分歧——湘軍兵為將有的再檢討 | 張朋園 | 七十一年七月 | |
| 吳映華 | 黑旗軍與中法越南之爭執 | 王樹槐 | 七十二一年一月 | |
| 謝國興 | 黃郛與華北政局（一九 | 張玉法 | 七十二一年六月 |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 |

	三三~一九三五)				第十一種七十三年十月
戴寶村	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 (一八六〇~一八九四)	林明德	七十二年六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二種七十三年六月
金鍾潤	洋務運動時期的兵工業	王樹槐	七十二年六月		
蘇志誠	日併琉球與中日疏案交涉	林明德	七十二年六月		
潘敏德	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 (一六四四~一九三七)	劉翠溶 王業鍵	七十二年六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三種七十四年四月
洪德先	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	張玉法	七十三年六月		
吳學明	「金廣福」墾隘與新東南山區的發展 (一八三四~一八九五)	李國禔	七十三年六月		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四種七十五年二月
江淑玲	盛宣懷與近代中國之經濟現代化	李國禔	七十三年七月		
徐雪霞	近代中國的郵政 (一九一六~一九二八)	王樹槐	七十四年五月		
李筱峯	臺灣光復初期的民意代表 (一九四六~一九五一)	張玉法	七十四年六月		自立晚報社七十五年一月
陳勝崑	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	王樹槐	七十四年六月		
黃克武	〈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	李國禔	七十四年六月		
陳惠芬	民國初年的省議會	張朋園	七十四年六月		
車相協	中日修好條約之研究	林明德	七十四年十一月		

三、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楊翠華	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 (一九二二~一九三〇)	陶英惠	六十七年六月	
郭芳美	居正與中國革命 (一九〇五~一九一六)	蔣永敬	六十八年一月	
郭伶芬	陳其美參與中國革命之	蔣永敬	六十八年六月	

- 經過及其貢獻
- | | | | |
|-----|----------------------------|------------|--------|
| 張力 | 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啓蒙運動 | 陶英惠 | 六十八年六月 |
| 邵銘煌 | 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一九三二~一九三七) | 蔣永敬
閻沁恆 | 六十八年六月 |
| 胡國台 | 早期美國教會在華教育事業之建立(一八三〇~一九〇〇) | 李定一 | 六十八年六月 |
| 李昌華 | 清季四川開民智運動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一一) | 李定一 | 六十九年一月 |
| 莊義芳 | 蔣夢麟與抗戰前之中國教育(一九一七~一九三七) | 李雲漢 | 六十九年六月 |
| 盧育俊 | 歐戰後期中日關係之演變 | 林明德 | 六十九年 |
| 陳立台 | 戴季陶早年的革命言論與活動(一九一〇~一九一五) | 李雲漢
閻沁恆 | 六十九年六月 |
| 毛知礪 | 梁士詒與民初政局(一九一一~一九一六) | 李守孔 | 六十九年六月 |
| 柯惠珠 | 辛亥前湖南地區革命運動之研究(一九〇三~一九一一) | 蔣永敬 | 六十九年六月 |
| 趙慶河 | 梁漱溟與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一九二九~一九三七) | 蘇雲峰 | 六十九年六月 |
| 林德政 | 保定軍官學校之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二四) | 陳三井 | 六十九年六月 |
| 林貞惠 | 馮玉祥與北伐前後之中國政局(民國十三年~十七年) | 張玉法 | 六十九年五月 |
| 王惠姬 | 清末民初的女子留學教育 | 張玉法 | 六十九年 |

陳春美	吳佩孚的崛起與挫敗（民國九年～十三年）	李雲漢	七十年一月	
吳月美	王闓運觀世變	李定一	七十年五月	
劉維開	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	黃季陸	七十年六月	
黃芙蓉	袁世凱與進步黨	蔣永敬	七十年六月	
王正華	廣州時期的國民政府（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五年十二月）	李雲漢	七十年六月	商務印書館七十五年三月出版，書名易為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
林文慧	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	李定一	七十年六月	
井泓瑩	張繼早年革命事業之研究（一八八二～一九二七）	林能士	七十年六月	
彭國亮	西南三省（川滇黔）煙毒與禁煙之研究（一九一一～一九四〇）	蔣永敬	七十年六月	
高純淑	華洋義賑會與民初合作運動	李雲漢	七十一年六月	
張慧中	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	閻沁恆	七十一年六月	
王 玉	文學研究會與新文學運動	張玉法	七十一年六月	
周麗潮	湖南開民智運動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一一）	李定一	七十一年六月	
王紀霏	中國留俄學生之研究（一八九〇～一九四二）	趙洪慈	七十一年六月	
端木琳	李鴻章與琉球問題（一八七七～一八八二）	李定一	七十一年六月	
簡漑勤	日本在華文教活動（公元一八九五年～一九三一年）	黃福慶	七十二年六月	
李盈慧	抗戰前三種刊物對中日問題言論之分析——東方雜誌、國聞週報、獨立評論之比較研究	閻沁恆 蔣永敬	七十二年六月	
吳永芳	國民參政會之研究	蔣永敬	七十二年六月	

- | | | | |
|-----|-----------------------------|------------|--------|
| 陳孝惇 | 唐才常之生平與思想 | 戴玄之 | 七十二年六月 |
| 陳曼玲 | 陳炯明與粵軍（一九一七～一九二五） | 李雲漢 | 七十二年六月 |
| 秦蕙萍 | 民初地方主義之研究——元年至五年間中央與地方權力之衝突 | 胡春惠 | 七十二年六月 |
| 林美玫 | 中國內地會之研究（一八六五～一九二六） | 閻沁恆 | 七十三年六月 |
| 蘇啓明 | 北伐期間之工運 | 蔣永敬 | 七十三年六月 |
| 杜梅生 | 張國燾與早期的中共 | 趙洪慈 | 七十三年六月 |
| 張遵倩 | 民國早期山西教育之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二八） | 蘇雲峰 | 七十三年六月 |
| 孫慈雅 |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教會學校 | 黃福慶 | 七十三年六月 |
| 林桶法 | 徐世昌與南北議和之研究 | 沈雲龍 | 七十三年六月 |
| 陳昭璇 | 幣原喜重郎的對華政策（一九二四～一九二七） | 林明德 | 七十三年六月 |
| 劉河北 | 江蘇省農村金融之調劑（民國元年～二十六年） | 王樹槐 | 七十四年一月 |
| 何思暉 | 清季江蘇省學會運動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一一） | 李定一 | 七十四年六月 |
| 劉祥光 | 西潮下的儒家：熊十力與新儒家（一九二二～一九四九） | 張玉法 | 七十四年六月 |
| 詹璋 | 吳稚暉與國語運動 | 蔣永敬 | 七十四年六月 |
| 金澤中 | 韓民流移東北之研究（一八六〇～一九一〇） | 張存武 | 七十四年六月 |
| 楊同慧 | 孫傳芳與五省聯防 | 劉鳳翰 | 七十四年六月 |
| 莊樹華 | 民國以來田賦附加稅之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三七） | 劉翠溶
張哲郎 | 七十五年一月 |

四、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林宗賢	威爾遜、中國與巴黎和會	孟樹人	六十年六月	
郭武雄	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傳統外交政策之實行	孟樹人	六十一年六月	
徐秀雄	美國在中國東三省之鐵路投資與外交政策(一九〇六~一九一一)	孟樹人	六十二年六月	
秦亞平	中英貿易與鴉片戰爭	王任光	六十四年六月	
汪誕平	馬歇爾使華的探討	柯南希	六十九年六月	
程玉鳳	凱勒布·顧盛與中國——中美「望厦條約」的訂立	柯南希	七十年六月	
張慶琪	紐約時報的對華政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柯南希	七十一年六月	
黃天成	約翰·司徒華·謝偉志對華政策之研究	柯南希	七十二年六月	
盧淑真	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訪華使命之研究	柯南希	七十二年六月	

五、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張守真	清季東三省路權之開放與美國的投資	呂士朋	六十二年	
張水木	歐戰時期中國對德外交關係之轉變	呂士朋	六十二年六月	
陳哲三	中華民國大學院之研究	蔣永敬	六十二年六月	
吳潤禎	清末實業教育之研究	呂士朋	六十三年五月	
陳瓊瑩	清季自強運動時期的新教育	呂士朋	六十三年	
林載爵	譚嗣同評傳	呂士朋	六十四年	
林勝利	清代女權思想的萌芽與發展	呂士朋	六十五年五月	
林珪美	李鴻章與中法戰爭	呂士朋	六十六年四月	
林松友	張之洞在拳亂期間之地位	呂士朋	六十七年四月	
王國維	左宗棠勘定新疆回亂之	楊紹震	六十八年五月	

- 研究
- | | | | |
|-----|--|------------|--------|
| 鄭 梓 | 民國前胡漢民思想研究
(一八七九~一九一一)
——革命的理想與現實 | 呂士朋 | 六十八年五月 |
| 毛 釋 | 清代鴉片戰前(一六四
四~一八四〇)廣州貿
易與中央及地方財政的
關係 | 楊紹震 | 六十九年六月 |
| 林彼得 | 抗日戰爭初期我國家戰
略研究 | 蔣緯國 | 六十九年六月 |
| 劉常山 | 鄒魯研究一八八五~一
九二五 | 李守孔 | 六十九年六月 |
| 王鳳真 | 顧維鈞與巴黎和會 | 陳三井 | 七十年六月 |
| 黃昭沛 | 許景澄與清季洋務運動 | 李守孔 | 七十年五月 |
| 李南海 | 安福國會之研究(民國
六月~民國九年) | 李守孔 | 七十年六月 |
| 陳三郎 | 日據時期臺灣的留日學
生 | 張勝彥 | 七十年六月 |
| 唐啓華 | 明臣仕清及其對清初建
國的影響 | 陳捷先 | 七十一年 |
| 林振賢 | 清朝茶葉專業經營的分
析(一六四四~一九一
一) | 李守孔 | 七十一年 |
| 王心美 | 梁啓超思想之演進與轉
變 | 呂士朋 | 七十一年六月 |
| 李玉瑛 | 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之
發展(一八四二~一九
三〇) | 呂實強 | 七十二年四月 |
| 王仲堯 | 努爾哈齊的治術 | 陳捷先
呂士朋 | 七十二年六月 |
| 黃德銘 | 中國、交通兩銀行之發
展與政府之關係 | 王樹槐 | 七十三年 |
| 洪麗完 | 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一
六八三~一八七四) | 林衡道
張勝彥 | 七十四年 |
| 姜仁圭 | 基督教在中韓兩國發展
史的比較研究 | 查時傑 | 七十四年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一)博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葉龍彥	清末民初之法政學堂	黃季陸 宋 晞	六十四年八月	
郭鳳明	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 (一八九五~一九一六)	黃季陸	六十五年十一月	
王綱領	民初(一九一二~一九 二二)列強對華貸款之 聯合控制——兩次善後 大借款之研究	梁敬錚 吳相湘 宋 晞	六十六年十一月	中華學術獎助委員會 (七十一年八月)
莊焜明	抗戰時期(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我國高等教 育之研究	吳相湘 宋 晞	六十九年一月	
彭濂添	民信局——中國民間的 過訊事業	宋 晞	七十年一月	
賴福順	清高宗「十全武功」軍 需研究	蔣復璁 陳捷先	七十年七月	故宮博物院(七十三年 三月)
陳重光	我國鄉村建設實驗工作 之比較研究	吳相湘	七十年十月	
蔡相輝	明清政權更迭與臺灣民 間信仰關係之研究—— 清初臺灣政治與王爺、 媽祖信仰之關係	程光裕	七十三年一月	

(二)碩士班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出版狀況
王正明	辛亥革命成敗之因果	羅 剛	五十三年五月	
樂炳南	忠王李秀成年譜	蕭一山	五十三年五月	
吳八駿	羅斯福對華政策	杜光墀	五十三年五月	
劉以城	黎元洪與民初政局	宋 晞	五十三年五月	
王 珂	中法戰爭與臺灣	羅 剛	五十五年六月	
李蘊珊	道光朝在世有史部著作 諸學者傳略	楊家駱	五十五年六月	
江樹生	清領以前臺灣之中國移 民	陳紹馨	五十五年六月	
前島浩	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	楊家駱	五十七年六月	

郭鳳明	清帝載活與那拉氏之政爭	李毓澍	五十七年六月
王綱領	民初列強銀行團與善後大借款	李毓澍	五十七年六月
黃博仁	清末中央政府組織之改革	楊家駱	五十八年六月
葉龍彥	湘軍餉源及其運用	宋 晞	五十八年六月
陳洪莊	晚明流寇之成因	宋 晞	五十九年六月
康虹麗	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	杜維運	五十九年六月
董志羣	郭嵩燾洋務思想之研究	李守孔	五十九年六月
李月美	清季之資政院	李守孔	六十年五月
楊緒賢	薛福成之外交識見	李守孔	六十年六月
周宗賢	南明政爭之研究	楊雲萍	六十年六月
莊焜明	國民參政會之初步研究	吳相湘	六十年六月
包奕洪	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政策之研究	冷 欣	六十年六月
陳重光	民國初期婦女地位之演變	吳相湘	六十一年六月
洪水深	中華革命黨與討袁運動	李守孔	六十一年六月
蘇澄基	趙恆惕與湖南省自治（一九二一～一九二六）	李雲漢	六十一年六月
宋建成	清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	王振鵠	六十一年六月
彭瀛添	列強對中華郵權的侵略與中國郵政	宋 晞	六十一年六月
施家順	新生活運動之初步研究	吳相湘	六十二年五月
卓文義	民國初期的國語運動	吳相湘	六十二年五月
趙啓祥	抗戰前中國大學教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吳相湘	六十二年五月
蔡行濤	瀋陽事變後（一九三一～一九三五）的東北郵政	宋 晞	六十二年五月
樊信源	清代臺灣民間械鬪之研究	張炳楠	六十二年五月
凌林煌	清代內閣制度	蔣復璁	六十二年六月
千檀一仁	關東軍對察綏省區的侵略	程光裕	六十二年六月

栗國成	中國抗戰前的學生運動 (一九三一~一九三六)	吳相湘	六十三年六月
郭黛琮	民報的始末及其言論的 分析	李雲漢	六十三年六月
陳大明	國父孫中山先生護法始 末	郭榮趙	六十四年六月
李淑智	章炳麟與辛亥革命	宋 晞	六十五年五月
吳水吉	從乙未臺灣抗日運動看 臺灣民族運動之性質	程光裕	六十五年五月
蔡敏崑	民國早期的職業教育運 動	郭榮趙	六十五年六月
方國安	清末民初中國軍國民教 育之研究	瞿立鶴	六十五年六月
黃之台	近三十年來臺灣茶葉產 銷之研究	程光裕	六十五年六月
蔡相輝	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 關係	程光裕	六十五年六月
張達夫	陳其美與中國革命	程光裕	六十六年六月
簡笙篔	粵漢鐵路全線通車與抗 戰的關係	李毓澍	六十六年六月
陳長榮	戴傳賢與中國國民黨改 組	郭榮趙	六十六年六月
賴福順	清初綠營兵制	宋 晞	六十六年六月
安嘉芳	「新世紀」之始末及其 言論之分析	黃季陸	六十六年七月
王震邦	清末民意趨向初探	宋 晞	六十七年七月
韓 華	梁啟超思想由文化主義 轉到國家主義之探討	宋 晞	六十七年七月
劉鵬佛	譚延闓與民國政局	程光裕	六十八年六月
熊秉純	王韜研究	李守孔	六十八年六月
周雪玉	施琅之研究	程光裕	六十八年六月
林清芬	庚子拳亂後(西元一九 〇一~一九一一)清廷 教育政策研究	宋 晞	六十八年七月
范光淡	李鴻章之海防運動及其 後果	梁嘉彬	六十八年七月

- | | | | |
|-----|---|------------|--------|
| 張建隆 | 革命的歧見：一八九六
～一九一一 | 李守孔 | 六十九年六月 |
| 謝敏聰 | 明清北京的城垣與宮闕
之研究 | 李守孔 | 六十九年六月 |
| 黃珣玲 | 清末新教士在中國的社
會事業探討 | 王聿均 | 六十九年六月 |
| 孔令謹 | 左宗棠與清季邊疆交涉 | 梁嘉彬 | 六十九年七月 |
| 郭崇武 | 清代海關關務與中央政
府財政關係之研究 | 宋 晞 | 六十九年七月 |
| 周綢艷 | 張之洞的洋務思想 | 程光裕 | 六十九年七月 |
| 何培夫 | 楊廷理臺灣治績考 | 黃典權 | 六十九年七月 |
| 曹中平 | 清季直隸教務與拳亂 | 李守孔 | 六十九年七月 |
| 王婷婷 | 清末女子教育思想 | 李雲漢 | 七十年一月 |
| 簡復振 | 清末新式教育經費的籌
措及其來源 | 宋 晞
莊吉發 | 七十年七月 |
| 劉臺平 | 晚清督撫同城分析 | 繆全吉 | 七十年七月 |
| 張家昀 | 上海商團的研究 | 李毓澍 | 七十一年一月 |
| 楊濬津 | 沈葆楨與晚清自強運動 | 李守孔 | 七十一年七月 |
| 謝政憲 | 晚清經營新疆之研究 | 李守孔 | 七十一年七月 |
| 林清華 | 袁同禮先生與近代中國
的圖書館事業之研究 | 王振鶴 | 七十二年六月 |
| 張火木 | 蔡元培與國立北京大學
(一九一二～一九二七) | 宋 晞 | 七十二年六月 |
| 陳立文 | 居里兩度使華與戰時中
美外交關係之研究 | 李守孔 | 七十二年六月 |
| 張慧安 | 陳誠與臺灣土地改革 | 閻沁恆 | 七十二年六月 |
| 卓克華 | 清代臺灣行郊之研究 | 程光裕 | 七十二年六月 |
| 尚世昌 | 中共南昌暴動之研究 | 宋 晞 | 七十二年六月 |
| 林柏維 | 臺灣文化協會之研究 (一
九二一～一九二七) | 程光裕 | 七十三年六月 |
| 黃煥堯 | 清代臺灣番人與地方治
安之關係——義番與番
患研究 | 程光裕 | 七十四年六月 |
| 盧胡彬 | 清代臺灣方志之研究 | 程光裕 | 七十四年六月 |
| 盧孝齊 | 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
動——以華北地區為例
(一九二二～一九三七) | 楊懋春 | 七十四年六月 |

※以上各項資料承蒙各校歷史研究所提供，特此致謝。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一九八五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史料及工具書部分

- 王德毅編 清人別名字號索引 編者印行 一九八五、三 一千頁
- 王德毅編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臺北 漢學資料及服務中心印行 一九八五、三 三二四頁 (收錄公藏方志四千六百餘種)
-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 遵義會議文獻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 一三七頁
- 中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五卅運動與省港罷工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四 二二四頁
-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 胡適的日記(上、下) 北平 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一 六〇八頁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國父全集補編 臺北 該會印行 一九八五、六 六四〇頁, (另附英文著述六二頁, 索引四七頁)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 四冊 臺北 該會印行 一九八五、一〇 二千餘頁
- 沈雲龍訪問 林泉記錄 王鐵漢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7)) 臺北 該所印行 一九八五、六 二一八頁
- 李惠銓編 清實錄有關雲南史料彙編(卷一、二)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各為七〇四頁、四二八頁
- 李毓澍、林明德主編 中日關係史料——廿一條交涉(民四~五年) 二冊 臺北 中研院近史所印行 一九八五、七 九七〇頁
- 洪桂已編 日本在華暴行錄 臺北 國史館印行 一九八五、一〇 一〇二三頁
- 故宮博物院、聯合報國學文獻館合作影印 清代起居注冊(道光朝) 一百

- 册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一九八五、一一
- 郭廷以校閱 沈雲龍訪問 陳存恭記錄 王奉瑞先生訪問記錄 (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8)) 臺北 該所印行 一九八五、六一八八頁
- 郭廷以校閱 李毓澍訪問 陳存恭記錄 戢翼翹先生訪問記錄 (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6)) 臺北 該所印行 一九八五、四 一四〇頁
- 郭廷以編著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册 (民國二十七——三十八年) 臺北 中研院近史所印行 一九八五、五 九二六頁
- 張玉法編 清末民初期刊彙編 二十六册 臺北 經世書局出版 一九八五、九
- 國史館編印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 一至六月份 臺北 該館印行 一九八五、六 六五一頁
- 國史館編印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十八年 (一九二九) 一至四月份 臺北 該館印行 一九八五、六 一二八八頁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中美軍事合作抗日紀要 臺北 該局出版 一九八五、九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 上下册 臺北 該局出版 一九八五、九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日本大東亞戰爭史——中國之部節譯本 臺北 該局印行 一九八五、六
- 饒鴻競等編 創造社資料 (上、下) (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刊)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 六五二頁
- 龔 蔭編著 明清雲南土司通纂 雲南 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五、七 三五 一頁
- アジア經濟研究所圖書資料部編 中國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文獻解題 (一九七八——八三) (文獻解題 No. 32) アジア經濟研究室 一九八五、二 九〇頁)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編印 東洋學文獻目錄 (一九八二年度) 一九八五、三 一〇二五頁
- 滿鐵調查月報四八卷 別册一卷 東京不二出版社重印
- 紅旗週報七卷 (六四期, 一九三一、三、九——一九三四、三一) 東京不二出版社重印 一九八五、一〇
- Bianco, Lucien & Yves Chevrier.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 Chine. Paris: Les Editions Ouvrieres, 1985, 845 pp.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of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676 pp.

二、史學部分

- 中研院近史所編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上、下） 臺北 該所印行
一九八五、一二 一一四八頁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第二至九輯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八五、八（第十輯 一九八五、一一出版）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四冊 臺北 該
會印行 一九八五、一二、三一 一八〇〇頁
- 朱滋源著 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 臺北 中研院近史所印
行 一九八五、六 四一六頁
- 阮芳紀等 洋務運動史論文選（中國歷史研究叢書）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
五、二 六四八頁
- 胡平生著 民國初期的復辟派 臺北 學生書局 一九八五、七 六二七頁
- 孫常煒著 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上） 臺北 國史館印行 一九八五、六
四八六頁
- 孫春在著 清末的公羊思想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八五、一〇 二
九六頁
- 張玉法著 民初的政黨 臺北 中研院近史所印行 一九八五、五 五八四
頁
- 張蓬舟著 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一卷，一九三二——一九三四）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六（第二卷，一九三五，——一九三 七
一九八五、八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編 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 二冊 臺北 該校印行
一九八五 一八二九頁
- 黃麗鏞編著 魏源年譜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 三一三頁
- 嚴耕望等撰 方志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漢學研究三卷二期） 臺北漢學
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一九八五、一 九二〇頁

- 小野勝年博士頌壽紀念會編 小野勝年博士頌壽紀念——東方學論集 京都
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會印行 一九八五 五九三頁 相關文章：①林傳
芳「『勸世良言』授受年代に關する——梁發と洪秀全の接點を求めて」；
②波多野善大「辛亥革命の南北議和と汪兆銘——汽が議和會議に参加し
た日附について」。
- 大塚勝美著 中國家族法論——歴史と現状 東京 御茶の水書房 一九八
五、一 三七二頁
- 草野文男著 現代中國經濟史研究 東京 御茶の水書房 一九八五、二
七一七頁
- 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 西と東と——前嶋信次先生追悼論文集東京
汲古書院 一九八五 四六八頁 相關文章：①淺井紀「清代青蓮教の道
教について」；②山本英史「清初華北における丁稅科派についての一見
解——黃六鴻の『編審論』をめぐって」
- 辛亥革命研究會編 中國近現代史論集——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 東京
汲古書院 一九八五、九（田中正美、野沢豐、中村義等二十二人執筆）
- 竹内實等著 五四運動の研究 第三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
究報告） 同朋舎 一九八五、一 五四七頁
- 狹間直樹、森時彦合編 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辛亥革命研究について
東京 霞山會 一九八五、二 二八六頁
- 坂野正高著 中國近代化と馬建忠 東京 東大出版會 一九八五、二 二
〇七頁
- Barnett, Suzanne Wilson & John King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Brugger, Bill ed. *Chinese Marxism in Flux: Essays on Epistemology,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5,
218 pp.
- Fewsmith, Josep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
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275 pp.
- Hanley, Susan B. & Arthur P. Wolf, ed.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60 pp.

-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Jones, P & Kevill S. comp.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Harlow, Essex: Longman 1985, 200 pp.
- Kinkley, Jeffrey C.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45 pp.
- Lary, Diana, *Warlord Soliders: Chinese Common Soliders, 1911-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77 pp.
- Parish, William L.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Inc., 1985.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August, 1981)
- Shaw, Yu-ming 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rist Sino-Europea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 1985, 451 pp.
- Solinger, Dorthy J.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1949-80*.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68pp.
- Young, Graham ed. *China Dilemmas of Modernization*.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5, 279pp.

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 (1860-1916)

專刊五種

- | | |
|---------------|--------------------|
| (41)蘇雲峯：湖北省地區 | 定價 精 400 元 平 350 元 |
| (42)張玉法：山東省地區 | 定價 精 600 元 平 500 元 |
| (44)李國祁：閩浙臺地區 | 定價 精 450 元 平 400 元 |
| (46)張朋園：湖南省地區 | 定價 精 350 元 平 300 元 |
| (48)王樹槐：江蘇省地區 | 定價 精 500 元 平 450 元 |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本大事紀要記載內容以一九八五年國內外有關近代中國史之研究活動為主，包括：學術會議、學術講演、學人動態、學術交流、出版消息，以及與近代中國史研究有關之其他消息。因資料不足，掛一漏萬之處，尚祈補充指正。

1984. 12. 26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在臺北南港中研院舉行，會期九天（1985. 1. 3止）。會中宣讀十四篇論文，並討論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G. William Skinner 的理論。相關論文如下：①劉錚雲：清代江西與湖南的秘密社會；②費景漢：由地域經濟觀點研究清代田賦制度之合理性；③章英華、范毅軍、陳淑銖：清代與民初中國鄉村社會的村際關係與農民的社會關係網絡——以華北地區為探討的對象；④林滿紅：清末鴉片流行中國的一個經濟解釋（十八世紀末葉至一九〇六年）——由鴉片問題看「現代世界體系與晚清社會」；⑤張瑞德：鐵路與東北的經濟發展；⑥劉石吉：清末民初城市工人抗議型態；⑦梁其姿：清初揚州府的普濟堂。

1984. 12 西德西柏林大學 Hans Kühner 博士到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為期兩個月（一九八五、二月止）。

1985. 1.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中研院近史所「國民政府時期的精英分子：黨政軍領導階層結構分析」研究計畫，由該所研究員張朋園先生主持，沈懷玉小姐助理，為期一年。

1. 10 湯志鈞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術研討會中講演「關於康有為與戊戌變法諸問題」。

1. 11 中共經濟史家傅築夫逝於北平，年八十四歲。傅係河北永年人，

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著有「中國經濟史論叢」（上、下冊）、「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等書。

1.13 中共在貴州遵義舉行「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為期五天（1.17止），一〇五人參加，論文八十一篇。

一月中旬 中共在江西瑞金舉行「十省區（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四川、廣東、廣西、浙江、貴州）蘇區教育史編寫會議」，並成立「蘇區教育史編審委員會」和「編寫小組」。

1.17 第二十四屆亞洲學會東南區分會年會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舉行，會期三天。相關論文：① Douglas Reynolds, "Training Young China Hands: Japan's Tōa Dōbun Shoin in Shanghai, 1900-45"; ② Robert Cooper, "A United States Army Doctor in China, 1913;" ③ Gordon Pickler, "A Quintessential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41-42".

1.23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一一〇次學術討論會，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趙中孚先生主講「東三省易幟對全國統一的歷史意義」。

1.24 澳洲墨爾本大學高級講師金承藝先生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從一件有關慈禧太后的記載談史料的運用」。

二月 韓國漢城誠信女子大學李炫熙教授到中研院近史所蒐集有關韓國獨立運動志士在中國活動的資料，為期二個月。

二月 澳洲墨爾本 La Trobe 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費思堂（Thomas S. Fisher）到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訪問研究，主題為「呂留良的思想」，為期一個月。

2.1 中研院近史所為慶祝成立三十週年（1955.2.1~），發行專書二冊：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至七十四年一月），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

2.11 Joseph Esherick (University of Oregon) 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東亞所講演 "Social Origins of the Boxer Movement."

2.12 印尼史政局長蘇亞第先生 (Mr. Gatot Suryadi) 訪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13 James Wats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講演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nti-Japanese Guerrillas in the Canton Delta, 1941-1945."

2.14 日本早稻田大學依田熹宗教授在上海歷史學會舉辦的學術會議上主講「日中兩國的近代化」。

2.26 中研院近史所為慶祝該所成立三十週年，命名該所圖書館為「郭廷以圖書館」，並闢「郭廷以先生紀念室」，以紀念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同日，並在該館舉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由所長呂實強先生主持，並由沈雲龍、王聿均、李國祁、王樹槐四位先生任引言人，提出許多檢討和建議。

3.9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t Charlottesville) 易社強 (John Israel) 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主講「本世紀中葉中國高等教育之危機」。

3.21 中共「華南師範大學」、「廣東教育學會」和「廣東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舉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學術討論會」，會期二天，五十餘人參加。

3.22 第三十七屆亞洲學會年會 (一九八五年) 在費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召開，會期三天，相關論文：① Lynda Bell,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e on Local Elite Development: Merchants and Peasants in the Wuxi County Silk Industry"; ② Helen Chauncey, "State-building from Below: Local Elit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③ Bradley Gesisert, "From Conflict to Quiescence: The Guomindang and Local Elites, 1927-1937"; ④ Yong-tsu Wang, "Zhang Binglin and Women"; ⑤ Vera Schwarcz, "Libertine' or Liberationist: Zhang Shenfu's Views of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⑥ William Rowe, "Labor Gangs in Late Qing China"; ⑦ Winston Hsieh,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the 1924 Merchant Corps Uprising in Kwangtung"; ⑧ Ming Chan, "Labor Versus Labor: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Workers in 1920s Canton"; ⑨ David Strand, "Feuds, Fights and Factions: Group Politics in 1920s Peking". ⑩ Chang-tai Hung, "Folk Literature as History: The Case of Gu Jiegang."; ⑪ Preston Torbert, "The Family and Real Property Righ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⑫ Michael Finegan, "Family Structure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China."; ⑬ Chen-main Wang,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Ch'ing Times: The Case of Hung Ch'eng-Ch'ou (1593-1665).";

⑭ Lutao Sophia Wang, "Objective Reporting and Its Effects on the Norm of Interest Articulation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1902-1937." 又該會第二十一次討論會主題爲：“The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allenging Old Interpretations”，有關文章不贅敘。

3.22 中共「孫中山研究學會」在河北涿縣召開「孫中山研究評述國際學術討論會」，會期七天（至3.28），中外學者四十九人參加，宣讀論文四十二篇，包括四大主題：①孫中山先生的早期思想，②孫中山先生對民國初年國民黨的態度，③對中華革命黨的評價，④關於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評價。

3.23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在臺中召開「中西史學史研討會」，會期兩天。相關論文有胡昌智「由鑒戒式的歷史思想到演化式的歷史思想：一個中國近代史學史的初步觀察」（陸寶千講評）等。

3.30 法國科學院研究主任、社會科學院教授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在中研院近史所主講「福州船政局的科技轉移」。

4.1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和國立中央圖書館在臺北召開「方志學國際研討會」，會期四天（至四、四），海內外學者百人參加，提出論文三十篇。主題爲：①方志理論；②方志利用；③方志編藏；④臺灣方志。相關論文：①石錦：明清時代桐鄉縣社會精華分子的社會組成和變化稿；②章英華：明清以迄民國中國城市的擴張模式——以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爲例；③吳倫霓霞：廣州對外通商港埠地區之演變；④呂實強：從方志記載看近代四川的宗教與禮俗；⑤Ramon Myers & Fu-mei Chang Chen: "Rur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4.2 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青山學院教授衛藤藩吉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戰後日本之國際關係（特別是與中共的關係）」。

4.3 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現任東京女子大學教授山根幸夫訪問中研院近史所，並以日語講演「袁世凱與日本顧問——以坂西利八郎爲中心」，由該所研究員林明德先生擔任翻譯。

4.8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朋園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之邀，至該校訪問一週（四、十五止），並講演「近代中國的政治領導階層」（刊於該院聯合校刊第四十一期）。

4.10 中共「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主編、「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副

所長楊國楨赴日，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為期三個月（7.9 止）。

4.13 中華民國第九屆比較文學會議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舉行，相關論文有：①張素貞：五十年代臺灣的新文學運動；②林明德：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

4.14 中國民族學會和思與言雜誌社在臺北師範大學召開「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曹永和、黃富三、許雪姬、黃秀政、張炎憲、蔡淵潔、石萬壽等七人發表論文。

4.20 中共六省市（北平、天津、成都、重慶、山東、貴州等）的二十個學術單位聯合發起的「近代中國教案學術討論會」在四川成都舉行，會期五天（4.24 止），一百五十餘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近八十篇。

4.24 國史館前館長黃季陸逝世（1899.3.2~）。

4.25 Dr. Pierre-Etienne Will 在中研院經濟所講演：“The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Civilian Granaries in Ch'ing China”。

4.27 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在該所召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會中提出十二篇論文。蔣永敬、李雲漢、李守孔、鄭彥霖等人參加，並發表論文。

5.1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王萍女士應成功大學歷史系之邀，至該校講演「利瑪竇、徐光啟與中西文化交流」。

5.19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主辦的「中韓文化關係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召開，會期五天（5.23 止），國內外學者百餘位參加，宣讀論文六十九篇。中文相關論文如下：①查時傑：早期韓國基督教與中國基督教的關係；②王聿均：朱家驊與韓國獨立運動；③張存武：中韓關係史研究課題。

5.21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資料中心主辦的「第四次中國研討會」在巴黎召開，會期二天，提出八篇論文。相關論文有（日）東京大學 T. Hamashita（濱下武志）「西方與日本在中國的投資策略（一八九五——一九八五）」等。

5.23 美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裴士單（Daniel Bays）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主講「民初基督教本土化運動」。

5.26 中共北平市「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成立，該會亦為「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平分會」。

5.26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實強先生應中國歷史學會之邀，在該會年會

上講演「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5.27 中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五卅運動六十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會期五天（5.31止），中外學者一〇四人參加。會議主題為：①如何評價五卅運動的歷史地位問題；②五卅運動中的共產黨指導問題；③五卅運動中的勞動階級問題；④知識分子與五卅運動；⑤資本家階級與五卅運動。

五月 中共「中國哲學史學會」、「華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聯合主辦的「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討論會」，五月底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召開，有一百二十餘人參加，提出六十餘篇論文。

5.30 日本東方學會主辦的「第三十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在東京和京都召開，會期三天（5.30~5.31, 6.8）相關論文有：①William Skinner, "The Revival of Rural Marketing in China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② Susan Mann, "The State-Merchant Relationship in Republica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odernization."

6.5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一一二次學術討論會，由黨史會副主任委員林徵祁先生主講「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情形的分析」，近百位學者參加。

6.6 中研院三民所主辦「『臺灣地區之現代化及其問題』研討會」（第四次社會科學會議），在臺北南港該所舉行，會期三天，宣讀十八篇論文。相關論文有張炎憲「臺灣資本主義化之過程（一八九五——一九〇五）」等。

6.12 中共上海市「華僑歷史學會」舉行關於華僑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學術討論會。

6.14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赴美，訪問舊金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就中國現代史研究與有關人士交換意見。歸途並訪問日本，全部行程共兩週（6.26止）。

6.19 「美國婦女研究學會」第七屆年會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舉行，會期五天（六、二十三止），中研院近史所熊秉真女士在「國際組」宣讀論文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Early Modern China"（中國近代婦女與兒童的關係）。

六月下旬，中共雲南省「華僑歷史學會」在昆明成立。

6.20 日本慶應大學川本邦衛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梁啟超與孫文

在東京活動之側面」。

六月 James Le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和 Charlotte Furth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 Beach) 由六月起擔任「清史問題」(*Ch'ing shih wen-t'i*) 編輯。為方便圖書館工作，該雜誌並決定更名為 *Late Imperial China*。

7.1 國科會補助「清末民初中國鄉村社會的村際關係與農民的社會網絡：以華北地區為探討的對象」研究計畫。由中研院民族所章英華先生主持，研究助理為陳淑銖小姐，為期二年。

7.1 國科會補助中研院近史所「抗戰前經濟檔案整理編目」研究計畫，主持人熊秉真女士，協同主持人謝國興先生，為期一年。

7.3 易社強教授 (John Israel, University of Virginia)、裴士單教授 (Daniel Bays, University of Kansas)、蕭邦齊教授 (Keith Schoppa, Valparaiso University, Indiana) 三人訪問中研院近史所，與所長呂實強等十人討論學術交流事宜。

7.6 輔仁大學主辦的「近現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聯勤外事俱樂部舉行，中日學者多人參加。八篇論文分別由戴國輝、許介鱗、蔣永敬、李雲漢、姬田光義、栗屋憲太郎、石島紀之、森正孝提出。

7.20 第一回中國近現代經濟史シンポジウム在日本沼津駿海莊召開，會期三天。共四十九人參加，提出論文七篇(四篇主報告，三篇副報告)，會議主題為中國近現代蠶絲業史的研究。

7.28 中共在山東泰安召開「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一百二十餘位學者和抗戰親歷者參加。

8.1 國科會補助中研院三民所「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中國城鎮工人抗議運動的型態」研究計畫，由該所劉石吉先生主持，研究助理顏文琳小姐，為期一年。

8.1 國科會補助中研院民族所「張之洞思想中的官商關係」研究計畫，由該所徐正光先生主持，研究助理由兩位臺大研究生擔任，為期一年。

8.1 國科會補助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三輯整理補充與出版計畫」，由研究員王萍女士主持，研究助理為龐桂芬小姐和林香瑟小姐，為期一年。

8.2 中研院近史所主辦的「抗戰建國史研討會」，在臺北該所圖書館三樓會議室召開。召集人為呂實強先生，執行人為陳三井先生，會期三天。

國內學者百餘人參加，宣讀論文二十九篇。

8.5 中研院近史所張存武先生、王璽先生應邀赴琉球訪問研究。張先生九日即返臺，王先生則前往琉球大學等研究機構蒐集中琉關係史料，為期一個月。

8.5 中共在北平召開「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第一屆學術年會」會期三天，中外學者一百八十多人參加，提出五十七篇論文。

8.6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行「中國大陸近況研討會」，主題為中共黨政、地方政治、中共經濟、中共外交。西德薩爾大學杜勉教授、美佛蘭克林學院政治系主任凌淦郎博士和美胡佛研究所吳元黎博士等學者與會。

8.7 中共「廣西社會科學院」為紀念鎮南關大捷一百周年，在廣西欽州、憑祥兩市召開「中法戰爭史學術討論會」，會期七天（8.13止）。

8.9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在該校召開「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會期兩天，提出論文十六篇。

8.13 韓國漢城大學亞洲系系主任閔斗基教授、該系李成奎教授及歷史教育系尹世哲教授訪問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8.16 中研院近史所原任所長呂實強先生任滿，由該所副所長張玉法先生接任所長。

8.19 中共在北平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期六天（八、二十四止），六百多人參加提出論文四百三十餘篇。

8.20 中共「民國檔案」雜誌（季刊）創刊，該刊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行，主要是選刊該館和各檔案館以及其他有關單位的民國檔案資料，其餘則用以刊載民國檔案研究和民國史研究的論文。

8.20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亞洲研究中心和紐堡大學（University of New Castle Upon Tyne）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中歐學術會議」在牛津大學召開，會期四天，提出二十篇論文。會議主題為二十世紀中國與歐洲關係。相關論文如下：①沈清松：互動典範之探索——中國如何求取歐洲科技（一九〇〇——一九三〇）；②詹火生：二十世紀在中國的歐洲人；③A. Saich：馬林和國共第一次聯合戰線（一九二四——二七）緣起。

8.20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明德先生赴日訪問，並至外務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處蒐集資料，行程共兩週（9.3止）。

8.26 中共「遼寧省史學會」等單位在遼寧丹東市召開「紀念抗日戰爭

四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會期三天，主題為東北抗日問題，提出論文二十二篇。

八月下旬 中共「歷史研究」編輯部、「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和蘭州大學歷史系合辦的「全國第三次洋務運動學術討論會」在甘肅蘭州召開。會議主題為：①洋務運動的內容；②洋務運動的性質、作用及其歷史地位；③洋務運動的評價標準和研究方法。

9.5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孫毓棠逝於北平。孫氏專治中國古代史、中外關係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編有「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一九五七），並著有「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一九五五）和「抗戈集」（一九八一）等書。

9.5 中共在北平成立「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中國陶行知基金會」，目的在研究陶行知的哲學、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論。

9.5 日本明治大學副教授橫山宏章訪問中研院近史所，就①對孫中山先生晚年評價；②惠州起義與兒玉源太郎的援助兩主題，與該所人員交換意見。

9.11 美楊格鎮（Youngstown）州立大學黃培博士訪問中研院近史所。

9.11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一一四次學術討論會由中研院近史所楊翠華女士主講「東西方對近代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趨勢」。

9.14 由聯合報國學文獻館主辦的「臺灣地區開關史料學術座談會」在臺北文苑舉行，為期兩天，提出十七篇論文。

9.18 美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訪問中研院近史所，並講演：“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9.20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舉行馬超俊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學政界二十餘人參加。

9.26 美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李歐梵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泛論五四到抗戰時期的文學與歷史」。

9.28 中共社會科學界近三百人在北平舉行慶祝陳翰笙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集會。

九月 中共「上海市檔案館」定本月初創刊「檔案與歷史」雜誌（季刊）。

9.30 美國學者擬創刊的中國教會史研究通訊(*Christianity in China: Historical Studies*) 訂本日截稿，第一期內容為研究中國教會史有關人士的指引。

10.1 西德慕尼黑大學吳素樂博士 (Ursula Richter)，由國科會補助至中研院近史所研究「顧頡剛與古史辨」，為期一年。

10.7 中共在北平召開「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討論會」，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辦，一百六十餘位中外檔案學家、歷史學家參加，發表論文八十篇，其中國外學者佔十二篇。

10.9 由清華同學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和中研院近史所合辦的「蔣廷黻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演講會」在臺北市清大月涵堂舉行。會中由王聿均先生、黃俊傑先生分別主講「蔣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蔣廷黻先生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歷史地位」。

10.9 中共在北平召開「抗戰時期上海學生運動史料徵集工作座談會」，會期兩天，當年上海學生運動有關人士共四十多人參加。

10.11 美國亞洲學會一九八五年西區年會在加州大學長堤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 Beach) 舉行，會期兩天，相關論文如下：① Judith Whitbeck, "Kung Tzu-chen (1792-1841)"; ② San-pao Li, "Káng Yu-wei (1858-1927)"; ③ Don Price, "Sung Chiao-jen (1882-1912)"; ④ John Nicolson, "Emperor Jiaqing: Imperial Predicaments, Acknowledgement and Solutions, 1800-1810"; ⑤ Edward Rhoads, "Manchu Aristocratic Resurgenc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The Case of the New Imperial Guards (Jinwei-jun)"; ⑥ Arlie T. Golkin, "The Medical and Nutritional Aspects of Famin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⑦ Jeffrey Wasserstrom, "The Boxers and Luddites as Heroes and Villains"。

10.11 美費正清教授 (John K. Fairbank,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Harvard University) 在王安研究所 (Wang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講演 "Industry, Philanthropy and Chinese Studies"

10.13 中共在福建舉行「林則徐誕辰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由「中國史學會」等單位主辦，會期六天 (10.18 止)，一百六十多位中外學者參加。

10.18 中共在新疆烏魯木齊成立「魯迅研究會」。

10.20 中共在南京召開「黃侃學術討論會」，會期五天（10.24止）。

10.16 日本宮崎大學市川信愛教授訪問中研院三民所，就其研究計畫「長崎華商『泰益號』之研究」，與該所「歷史與思想組」研究人員舉行座談。

10.22 黃堅立在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遠東歷史系舉辦的「漢學研究討論會」主講：“China Under Guomindang Rule: Policy on Stud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927-1945”。

10.25 美國亞洲學會中大西洋區第十四屆年會在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舉行，會期三天。相關論文如下：①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② Howard Spindel,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Issue of China's Neutrality”; ③ Gu Chang-sheng, “Chinese Protestant Studen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in the 1930s and 1940s”。

10.26 日本在廣島召開「一九八五年度廣島史學研究會大會」會期兩天。二十六日笹川裕史主講：一九二〇年代の湖南省政權と地方議會。

11.2 由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和中研院近史所合辦的「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高雄中山大學召開，會期四天（11.5止），中外學者專家一百四十人參加。會議分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華民國開國史、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抗戰勝利及臺灣光復史四組，各舉行十次討論，論文共五十九篇。

11.4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及社會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在該校祖堯堂召開，會期五天，中外學者四十一人參加。會議主題為「中國家庭及其變遷」，宣讀三十一篇論文。

11.8 美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並講演「國民政府對西安事件之反應：派系衝突抑政策配合」。

11.9 香港珠海書院主辦的「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會議」在香港中國文化協會和九龍怡安閣舉行，會期兩天，中外學者六十三人參加，發表三十四篇論文。

11.9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第八十三屆史學會大會在該校舉行，會期兩天，相關論文如下：①太田美香：製作經過から見た「皇輿全覽圖」の性

格；②クリスチヤン・ダニエルス：近代中國製糖業の歴史的 성격。

11.10 由韓國西江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協辦的「第六屆中韓學術會議」在韓國漢城召開，會期七天（11.16止），會議主題為「中共與北韓的開放政策」，提出八篇論文。

11.14 外交元老顧維鈞逝於紐約（1888.1.29～），生前完成的「顧維鈞回憶錄」，嘉惠近代中國史學研究至大。

11.22 全美中國研究協會第二十七屆年會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舉行，會期三天。宣讀論文除多篇涉及中國大陸的改革外，另有相關論文如下：① Chun-tu Hsueh,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del Against Traditionalism: 1911-1976”；② Leo Ou-fan Lee, “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30s”；③ Tsu-yu Chen, “Wuhsi Silk Industry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1.23 中共在長沙召開紀念左宗棠逝世一百周年的「左宗棠學術討論會」，會期五天。

12.11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和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合辦的「臺灣史研究及史料發掘研討會」在臺北政大公企中心舉行，共發表五篇論文、四篇史料發掘報告。

12.12 香港大學主辦的「國際明清史研究討論會」在香港召開，會期共五天（12.15止）。中外史學界一百餘人參加，論文七十餘篇。

12.14 由東海大學歷史系主辦的「臺灣開發史研究會」在臺中東海大學召開，會期兩天。學術界五十餘人參加，提出十篇論文。

12.17 中共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合辦的「華僑、華人歷史研討會」在廣州舉行，會期三天，中外學者一百二十餘人參加，發表論文四十四篇。會議主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化；海外華裔、華人與祖籍僑鄉關係的歷史和現狀；當前研究華僑、華人問題的現狀等。

本欄有關資料，敬希國內外各大學、各研究
機構及有關學者專家隨時提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口述歷史叢書十一種

口述歷史的訪問計畫，係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廷以教授所擬訂，其目的在廣泛搜集當代人物的有關史料，為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將來之研究。現已出版訪問紀錄計有：

①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50 元	平 200 元
②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00 元	平 150 元
③徐啟明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00 元	平 150 元
④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550 元	平 500 元
⑤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00 元	平 150 元
⑥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00 元	平 150 元
⑦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50 元	平 200 元
⑧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50 元	平 200 元
⑨于潤生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250 元	平 200 元
⑩石覺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500 元	平 450 元
⑪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 300 元	平 250 元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 目錄

七十四年六月出版，四六〇頁，定價（精）500元，（平）450元。

熊秉真：從唐甄看個人經驗對經世思想衍生之影響

黃嘉謨：清季的廣西邊防

張存武：清季中韓關係之變通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

羅久蓉：康有為的歷史觀及其對時局與傳統的看法

王樹槐：江蘇淮南鹽墾公司的墾殖事業（1901~1937）

陳三井：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1921~1924）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王聿均：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

Samuel C. Chu: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rom U. S. A*

王爾敏：一八五四年上海「泥城之戰」原圖（史料介紹）

張朋園：周著「胡適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書評）

李健民：評介 Clifford 著「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中國的城市民族主義與外人特權的維護」（書評）

K. S. Liew: *Ch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書評）

沈雲龍、李國祁、王聿均、王樹槐：「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發言紀錄

雲林縣、屏東縣、苗栗縣有關臺灣史料史蹟初步調查報告

※口述歷史叢書及第十四期集刊，均按定價七折發售，請利用郵局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劃撥購買。



畢生倡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
蔣廷黻先生



研究中國近代史卓有成就的
吳相湘先生

本期要目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記「台灣開發史研究會」

蔣廷黻先生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倡導

學人簡介——郭廷以、韋慕庭、吳相湘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I)

近年來大陸對台灣史的研究

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關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

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評析

評介胡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

柯著：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國內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

新書出版消息

一九八五年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